

綠
樹
成
蔭



www.duxiu.com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2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25,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frac{1}{16}$ 插頁 10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冊

序

李半黎

“新民主史”是一本記实的史書。

四川省七千多万人民中的六千万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解放十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然后由千百万互助组，到十六万多个农业社，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一跃而为五千零九十六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一千三百八十万多万户农民，占了全省总农户的99%以上。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惊天动地的变革，阶级斗争的变革，可歌可泣的变革，也是在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中劳动人民创造新世界的变革。

如果说“一颗水晶珠能够反映太阳”，那末，你可以从生动的“新民主史”中，窥见我省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六千万农民是怎样勇敢机智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新民主史”的口述者——现在的新民公社的骨干和先进分子们，以亲身的体验具体地告诉我们，从1949年底开始解放，到1952年春天土改结束之前，地主阶级在末日临头的时候，依然作着重垂死的挣扎，有的公开造谣言，有的施用美人计。而当时以贫雇农为首的农协会主席罗世发同志，妇女武装队长黄静仙同志等等农民代表方面，在中共新繁县委的领导下，

又是多么机智勇敢地向封建剥削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平息叛乱，镇压恶霸，清算地主，土改分田……，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阶段中，“新民主史”用活的事实，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在农村中所坚决贯彻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阶级路线。从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推倒了，农民胜利了，心情愉快了，生产得到了必然的发展。

之后，摆在农民面前的两条道路的问题又出现了。是停留在单干户、互助组阶段发展个体经济？还是组织起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合作化的道路呢？是跟着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跟随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不少的农民站在“十字路口”上，考虑着自己的命运。“新民主史”把这一时期的不同思想叙述得十分生动。富农在勾引，中农在动摇，中农中的新下中农（土改前的老贫农）是一种态度，老上中农又是一种态度，甚至连个别觉悟不高的贫农也无所适从了。他们既想发展生产，又看不到集体的力量；既想过富裕的生活，又舍不得私有制度。有的进组又退组，有的进社又退社，有的闹忘本退坡，有的闹自发势力，宁走独木桥，不走阳关道。唐兴发就是这一类人中的典型人物。这又怨谁呢？除了阶级敌人的勾引之外，那就是被千百年来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桎梏把他们害“惨”了。

但是，农民毕竟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毕竟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者，毕竟知道共产党是他们的大救星。新民主的农民，同全省各地的农民一样，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共四川省委和新繁县委的关怀与负责同志的耐心帮助

下，他們的眼睛亮了，再也不“步行三五又回头”了，他們堅定地迈步前进——1952年11月，他們建立了初級社，川西壩子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第一面旗帜出現了；1954年元旦，全省第一个大社也在这里扎根了；1956年元旦，这里又飘起了高級社的全省第一面紅旗，直到大跃进的1958年10月，他們又高高举起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奋勇前进了。正是十年树木，“綠树成蔭”！

“新民主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党对农民的領導是如何的堅定和充滿信心。当你看到新民主的农民由互助組到联組，由联組到小社，由小社到大社，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这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你就可以深信，党对农民的領導又是多么慎重，多么耐心。

“新民主史”又告訴我們，党在启发誘导农民的时候，一方面針對着小农經濟的、半消費性的、商品生产量很少的經濟弱点进行工作，一方面又掌握了农民的“耳听为虛、眼見为实”的特点，因此，必須通过发展生产，通过步步升高，叫农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合作化优越性的实际，使他們感到既能得到眼前利益，又要看到长远利益，用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循循善誘，自願而行。这既不是盲目冒进，也不是右傾爬行，而是真正地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伟大的毛澤东思想的正确性。

讀了“新民主史”，不仅可以看到在土改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党对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口号，在不同的經濟基础上，是如何的发展和具体的运用，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我

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社史叙述到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斗争虽然是少量的，但是对地、富、反、坏各种分子的活动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鼓足干劲与右倾保守的斗争却是非常复杂的。这一切都能够提醒读者：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比较曲折的斗争，克服种种困难，甚至经过失败，把教训变成经验，把坏事变成好事，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起来。正如毛主席在纵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所说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新民公社的大旗在新民大楼的上空迎风招展着。我国人民公社化的光辉，就象初升的太阳，普照着整个大地，鼓舞着全体人民。但是，也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就象“蜀犬吠日”一样，看不惯灿烂的阳光。让他们狂吠吧，马克思早就对酷爱光明的人说过：“一心循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让人们随便怎样去说吧。”

1959年8月21日

目 次

序	李半黎 (1)
惊天动地鬧翻身	罗世发口述 (2)
一面旗帜	张守福口述 (10)
“挂羊头卖狗肉”	馮恩云口述 (16)
提高一步	楊万明口述 (24)
比一比	廖焯华口述 (30)
一場风波	史良成口述 (37)
此路不通	黃正清口述 (44)
綠树成蔭	黃靜仙口述 (49)
家庭糾紛	刘芝秀口述 (56)
順水推舟	徐繼英口述 (66)
我当了新式农具手	曾玉清口述 (71) 龔星蕙记录
亲人的关怀	任慎容口述 (78)
第一个幼兒園	任淑仪口述 (84)
上北京	刘玉芳口述 (91) 式 琮记录
搬开絆脚石	刘元光口述 (98) 江 河记录
大放光明	蔡德福口述 (106)
光荣的事业	賀国智口述 (114)

乌云遮不住太阳 刘发栋口述 (123)

一面镜子 曾庆祥、石鑑玉 (133)

叫河水搬家 胡宗礼 (142)

制伏三岔河 周远智口述 (147)

验收 周宗礼记录 (147)

食堂饭菜香 马佩璠口述 (160)

冯恩云老汉 黄纪芬口述 (168)

步步高升 王世全口述 (173)

收获 陈犀 (178)

编后记 (188)

新民人民公社在四川省新繁县的禾登乡。共有三千〇五十二户，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耕地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多亩。它是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罗世发互助组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水有源，树有根。这部社史得从解放时谈起。我们先请罗世发同志介绍一下解放初期的情况。

惊天动地闹翻身

罗世发口述

人家都说我们四川是“天府之国”，川西壩子又是“天府之国”里的大粮仓。这话一点不假。不过，在解放前，这个大粮仓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那些恶霸、地主霸占着的。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流汗流血，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些人还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差不多每个农民都有一本伤心的血泪史，说也说不完。我还是从解放以后谈起吧。

1949年底，川西壩子解放了。在解放军还没有到达我们新繁县禾登乡的那几天，连更宵夜过了几批国民党的滥仗队伍。抢东家的猪，牵西家的羊，硬把农民打劫惨了。国民党的

敗兵一过，地方上的一些恶霸、地主、袍哥大爷就勾结了一批土匪、团匪、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反动武装，叫做什么“两路军”，说是专门对抗八路军的。他们到处造谣，说啥“八路军逮到老百姓就穿鼻子、割耳朵，一个也不放过，”等等。他们一天到晚，东一趟，西一趟，从东林寺到万家巷子，从殷家湾到山洪庵，见人抢人，见货抢货，把个禾登乡闹得乌烟瘴气。当时，农民对共产党、解放军虽然还不了解，但是都晓得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听老年人说，前十多年，红军长征从四川经过，四川军阀的垮杆队伍和蒋介石的“遭殃军”，都抵挡不住，仗火一直打到江油、彰明等县，离新繁只有二百里远了。把城里的财主，吓得屁滚尿淋，忙把粮食扫仓卖尽，夹起尾巴就往成都搬家。那时候，就听说红军是专门“打富济贫”的，要分田、分粮食给老百姓。所以，农民当时对地主恶霸制造的谎言，根本就不相信，心想：“世上还有比你们更坏的人？”大家都还是巴心不得解放军赶快来。

腊月二十几头（阳历1950年初），解放军来了。只听见机关枪象风簸机一样，打得砰砰碰碰，子弹呼呼直飞。“两路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沿路跑沿路喊：“打崩啦，快跑呀！”他们活象一群丧家狗，横冲直撞，把场上撞得人仰马翻，菜担子不知压坏了多少。

暴乱平息了。“两路军”被打垮了。解放军在乡上驻扎下来以后，立刻展开了宣传活动，说明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又帮农民做活路，讲革命翻身的道理，教大家唱歌、跳秧歌舞，很快就和群众搞得象一家人似的了。

就在这时候，我認識了項宝同志（他現在是新繁县县长）。那陣我还在碾房里做工。他天天到碾子上来帮我碾米、打油。一边做活路，一边和我摆談。我看他那么和藹可亲，再加上他又善于启发誘导，我就越談越起劲。我告訴他：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媽因为养不活我，从小就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放牛；我又为啥跑回来做庄稼；怎么去学理发；怎么到碾子上来打柴，混了几年才当上正式工人；以及我們如何暗地里整地主、帮助穷人；等等。后来搞熟了，連我怎么把黄正清背过河、自由結婚的那些事，也都告訴了他。談到伤心的时候，他就安慰我，給我講解放翻身的道理，启发我积极参加斗争；談到得意的时候，他也为我高兴，說我干得好、做得对，鼓励我永远也不要向恶势力、坏习惯屈服，不要向困难低头。就这样，他对我越来越了解，我对他越来越亲近了。他問我啥，我就談啥，比方：村里哪些人受苦最多，最恨恶霸財主；哪些人最肯为大家办事，最跳得起；还有哪些人最歪，最会压迫穷人，哪些人有枪，参加过暴乱；……有时候不等他問，我就向他談开了。这时候，他就动员我出来当干部，把农民組織起来。其实，我早就有这番心算了。記得当时我就和自己的爱人講过，想去跟項宝同志搞工作，她为我耽心，說：“人家会要你？”是呀，我那时才二十岁，人年輕，会干啥呢？項宝同志却鼓励我說：“年轻人有朝气，干劲大，接受新东西快。好好干吧！”就这样，在征粮工作开始时，我就当了催粮代表，成天跟項宝同志他們一路跑，一起吃飯。

这时候，村里的財主石子异忽然跑来找我了，他先笑嘻嘻地對我說：“罗老么，二天沒米，开声腔。”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湊

到我耳边上說：“解放軍二天要走，你还是要留步后路喲！”我馬上就把这事对項宝同志談了，又問他們是不是要走。項宝同志說：“我們永远也不走了。”第二天，他把石子异叫来，狠狠訓了一頓。事后，石子异又悄悄跑来找我，要我帮他說些好話。我一看財主老爷居然也向我們穷人低了头，心里更高兴，劲头也更大了。沒多久，項宝同志又提議，讓我当催粮代表組长，大家都同意了。以后催粮时，項宝同志他們总是讓我們催粮代表組出面。这一下我們的腰杆就更硬了，工作更大胆，更积极了。一天到晚，早出夜不归地到处奔跑，催收地主欠的公粮。有一次，到石子异家去催粮。肚皮跑餓了，他弄起大酒大肉出来办招待，妄想收买我們。哪知道“穷得新鮮、餓得志气”的农民，早已看清了他的鬼板眼，水都不喝他一口，高矮扭着他交粮。他只好乖乖地照数交齐。

粮食收起来堆在仓里，我們怕地主破坏，不放心，夜夜安崗放哨，我在刘家院子守仓，天天晚上，都在牛圈上和牛作伴。那时候也不覺得辛苦，只是感到工作搞得痛快、带劲。

在解放軍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征粮工作很快就胜利地完成了。接着，我們就成立了农民协会。很多貧苦农民和热情肯干的年輕人，如黃靜仙、史良成、刘发栋……都当了农协会的干部；大家选我当了村农会的主席和乡农会的委員。

下半年搞减租退押，我和黃靜仙等几个干部先到县里去学习了几天，回来后就发动群众，把工作搞开了。

那时候，黃靜仙是妇女武装队长；成天挂起个左輪手枪到处跑。刘芝秀才十三岁，也参加了妇女武装队，整天跟黃靜仙一起东奔西跑，活象她的小警卫員。开始，很多地主不肯退

押，到处疏散、隱藏財物。我們就发动群众調查、检举。黃靜仙过去經常替恶霸地主黃楷生家做活路，对他家的情况当然清楚。当时黃楷生已經偷跑了，还有两个兒媳妇在家。黃靜仙就帶起武装隊員去，先找黃楷生的二兒媳妇楊培芬。楊培芬說她家沒得东西来退押。黃靜仙問她：“你过去戴的金箍子呢？”

她說：“卖了。”

“前一向我还看你戴的，卖了？是不是在哪个牆縫头藏到的，快拿出来！”

黃靜仙怎么晓得她藏在牆縫里的呢？那时候，我們很多男女武装隊員、积极分子，每天晚上都要巡更守夜，監視地主的行动。他們的周圍因轉都是我們的群众崗哨，一言一行我們都清清楚楚。楊培芬藏金箍子的事，头天夜里就被发觉了。所以，黃靜仙这么一提，楊培芬就吓坏了。当时她就睡在地上打滾，大哭大鬧。黃靜仙看她要无賴，馬上叫人推个鷄公車来，把她拖到車子上，也不叫別人推，喊她侄兒来，把她推到村办公室去。一到了村办公室，楊培芬就老实一些，不敢再鬧了，但还是死不承認，直到半夜过才坦白。第二天清早，黃靜仙去找她时，她乖乖地从身上摸出了金箍子，抵交一部分押金。黃楷生的么兒媳妇，当时也疏散了很多財物到軍屯乡去。那是我和黃靜仙一路去追回来的。

减租退押，可以說是我們和地主階級打的第一仗。在这場斗争中，大大提高了貧苦农民的階級覺悟。就拿徐繼英來說，她过去是在有錢人家当佣人的。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当兵，到現在二十多年沒有音信。丈夫刚被拉走，兒子就害了病。她当时失魂落魄地，象发了痴一样。有一天担水，不小

心泼了主人家一脚。这就惹了祸，不但被赶了出来，連工資都被扣下了。回家來貧病交迫，兒子就死了。要不是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叔子馮全要她撫养，她早就不想再活在世上受罪了。解放給她带来了希望，她們叔嫂俩都积极地参加了斗争。当时，她們自己并无押可退，但馮全情願倒貼伙食，跑到外县去向地主追押。象这样的事情，多得很。

那时候，硬是搞得热火朝天。我們把地主釘得很紧，每晚上市都要叫他們来开会，自己彙报当天退了好多押金，其余的好久退。不退的，當場就叫武装队看管起来，再派談判組去談判，直到他答应退齐为止。

押金收了一部分，就开始发还给农民。头一次是曹云生县长(現在他是中共新繁县委第一書記)亲自来主持发还的。在大会上，发一个就握一下手。大家好高兴啊！真是世道变了，县长都跟农民握起手来了。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搞好生产，一定要財主退清押金。

这时候，地主們眼看硬幹是不行了，就想另外施些軟套套。黃怀民就用过个美人計，叫他女人和他妹妹，打扮得妖精似的，天天来找男武装队员鬼混。我們晓得这是敌人設的迷魂陣，叫队员不要理她們。这样，地主的詭計又落空了。經過我們繼續催逼，到过年时，押金就退得差不多了。接着，便展开了清匪反霸的斗争。

暴乱平息以后，恶霸匪首都沒有镇压，只是集中到县上管訓。有时候他們还要回来，装得神气活現的(其实是政府叫他們回来号召他們的“兄弟伙”繳枪自新)。群众难免有些怀疑，都去問解放军：“这些人过去残害百姓，解放后又搞暴乱，打解

放軍，現在光是繳了槍，就萬事大吉了嗎？”解放軍給群眾解釋，說以後要按政策處理，叫大家不要焦慮。果然，到了1951年年底，政府根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原則，就分別作了處理。連退押時逃到梓潼去的大惡霸黃楷生，也被逮回來了。

在華嚴寺開公審大會那天，我代表全鄉農民作公訴人。當我讀完了起訴書以後，群眾就一個一個跑上台來控訴，把多年來的深仇大恨全都倒了出來，引得全場血淚滾滾，哭聲震天。我當時心裡就象有一團火，肚皮都要氣爆了，跟着群眾一齊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徹底鎮壓惡霸匪首！”……審判長接受了群眾的要求，當場宣判，槍決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其餘的根據罪惡輕重也分別作了處理。從此以後，群眾再也不提心吊膽的了。

1952年1月，我們進行了土地改革。這是消滅地主階級的最後一戰。

首先是劃成份。在減租退押時，原來也劃過一下，那時候搞得很毛糙。象地主楊俊洲、楊勛林兩弟兄，開頭就錯劃成了中農，楊俊洲還混進村農會當過一陣文書。這次充分發動了群眾，查黑田，算剝削，工作非常細致認真。狐狸的尾巴，就再也藏不住了。儘管這樣，地主都還要狡辯。好吧，那就來算算賬吧。

在訴苦大會上，王大娘算了這樣一筆賬：

她家原來借了二十兩銀子佃了地主六畝地。一家人勤扒苦做，每年收的糧食還是交租子都不夠。實在沒法，丈夫就出去推車子，拚死拚活地干，想掙點錢來還租子，免得利滾利越

滾越大。哪晓得沒有好久就累死了。丈夫一死，剩下了一個六十多歲的公公和一個十來歲的女兒，王大娘一個人咋養得活？地主又逼着要租子，不交租就宰押金。公公不願叫媳婦為難，雖然病歪歪地站都站不穩，還是硬撐着要出去幫工掙錢，走到半路就掉下河淹死了。人死了，欠地主的租子還是要還，押金全部被宰完都沒還清，只好又把女兒賣給地主家裏当了頭。不久，有人帶信回來說，女兒被主人家打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頭髮都被扯光了。王大娘听了，心里象刀絞似的，連忙跑到地主家，自己去當傭人抵債，把女兒換了出來。就這樣，一直幫到土改前不久，地主才把她放回來。這是一筆血賬啊，今天怎麼算呢？而且這樣的血賬又何止一筆！當時群眾又氣又恨，一個個拳頭都捏出水來了。

決不能讓地主狡辯，一定要他們低頭認罪！群眾用血淋淋的事實，拿出真憑實據來和地主進行說理鬥爭。不怕象石子昇這樣狡猾的地主，當他的佃戶們一桩桩、一件件問他，當老雇工楊萬明把他的大斗大秤放到他面前的時候，他也不得不承認：“我是地主。我有罪。”

地主一個一個划定了成份。馬上把他們集中在一邊，這里就派人去查封他們的封建財產。嗨，當時那個勁仗！幹部拿着封條走在前頭，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跟了一長串，一個個眉飛色舞、喜笑顏開。除了給地主家裏留了一部分住房和必要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外，全部封了。封完后才放地主回去。當時也有些地主早有準備了，象石子昇一家人，全都一件重一件，不知穿了多少件衣服，一個個都穿得圓滾滾的象個屯包一樣。石子昇本人光棉褲就穿了三條，腦壳上帽子包得

有斗篷大。

成份划定了，财产清点了，土地丈量了，就把这些没收地主的東西归还给了农民；还征收了富农一部分多余的田地。全村的貧雇农平均每人分到了一亩三到一亩八分田，和其他各項財物。

土地改革結束以后，全村农民为了紀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方家村改成了新民村，并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村政权。

共产党不仅解放了广大农民，而且时时刻刻关心着、领导着农民不断革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罗世发互助组’正是在党的这种关怀下建立起来，成为川西平原互助合作运动中一面旗帜的。

一面旗帜

张守福口述

1952年春天，土改结束以后，农民都有了土地、房屋，生活也比较安定了。大家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搞好，来回答党和政府的关怀，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但是，很多人都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贫农缺少耕牛、农具、肥料、种籽，困难自然是多得很；鳏寡孤独那就更不消说了；就是中农，除了少数富裕户以外，一般的也都有些困难，不是缺这样，就是缺那样。拿史良成来说，他在中农里头也算是富裕的了，但是夫妻两个拖起几个娃娃，他又当了村干部，免不了有些耽擱，平时做庄稼就撵不赢，农忙时节更是恼火。

就在这时候，中共新繁县委派了个工作组到禾登乡来，组长是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项宝同志。项部长一来，就找新民

村村长罗世发了解情况。老罗把大家的困难一五一十地向他彙报了。項部长当时就指出：土改以后就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及时注意，那么大多数有困难的农民就又要逐渐破产，卖田卖房子；少数富裕户就可能买田买房子，再变成新地主。

老罗一听就急了，說：“我們从征粮剿匪鬧到現在，鬧了两三年，好不容易才打垮恶霸地主，好日子还没有过，馬上又有人要当地主，这……这咋行！”

項部长說：“我們工作組正是为了这个来的。”接着，他就向老罗講，要走大家富裕的互助合作道路，第一步要先成立互助組，等等。

这下有了办法，老罗心里就高兴了。当天回来，他就找到他們殷家湾那几个院子的人商量，把互助組的性質、办法給他們詳細細摆了一道。老罗这个人記性最好，接受新事物快，項部长跟他一談，他就懂了。这陣跟他們摆起来，說得头头是道的。說完以后，他問大家願不願意干。这里的农民过去本来也有个别換工的习惯，現在互助組比換工更好了，誰还不願意？大家都說：“干！”当时就有八戶人报了名。这八戶人是：罗世发、史良成、徐繼英、楊万明、唐兴发（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村干部），还有曾炳章、曾繁玉和楊全。以后，項部长又来給他們講解互助組的政策，一戶一戶征求意见。經過三番五次的酝酿，罗世发常年互助組就正式成立了。罗世发是組长，史良成是副組长。

建組以后，正赶上春耕。互助組的优越性馬上就显示出来了。大家都还在抄田的时候，互助組就开始栽秧子了；等到

别个开始栽秧子，他們秧子都栽得差不多了。硬是人多力量大，干啥活路互助組都要走前一步。这还不說，他們还帮村里很多困难戶栽了秧子，象：孤老太婆吳大娘呀，刚从街上搬下乡的廖炯华呀，孤兒张思德呀……。

王大娘的秧子也是互助組帮她栽的。那时候，她求爹爹告奶奶，好不容易才請富裕中农楊瞎子帮她耖了田。因为工錢还没有付，再找楊瞎子栽秧，他就不干了。王大娘只好又請旁人。碰来碰去，不是别个自己都忙不过来，就是先講条件。啥子条件呢？老規矩：工錢在外，一天吃五頓伙食，頓頓还要打牙祭。王大娘連工錢都出不起，哪还有錢打酒割肉？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天她在街上碰到吳大娘。老姊妹到一起就摆談开了。王大娘一說到秧子还没栽上，吳大娘就說：“老妹子，你咋不找罗世发互助組帮忙呢？他們最肯帮助人。我的秧子就是請他們栽的，不但不要一个工錢，連水都不喝我一口。快去找罗世发他們去。”

下午，王大娘到罗世发的院子里，找到老罗一說，老罗就滿口答应了。只有个别組員有意見：“我們自己还有一部分沒有栽完，尽帮别个栽，二天会影响我們的产量。等把我們自己那点栽完，再帮别个。”

老罗就向組員們解釋：“我們成立互助組，就是为了大家都搞好生产。王大娘是我們村里最困难的一戶，田也不多，要是我們不帮助她，二天她生产搞不起走，我們还能看着她挨餓？”

經他这么一講，大家都同意了，当时决定明天就去帮王大娘栽秧子。

第二天一早，罗世发叫組員曾祥成先去給王大娘打潭水。曾祥成刚下田沒多久，楊瞎子出来干涉了：“曾祥成，这田是我种的，你咋个乱来打潭水？”

原来川西壩子有个老規矩：誰种的田誰来打潭水。曾祥成只好說：“对嘛，就讓你来打潭水嘛。”

但是楊瞎子却进一步逼道：“要我打潭水也容易，你把工錢放在田坎坎上，我馬上就打！”

他两个吵起来了。王大娘在一旁急得哭着求楊瞎子。楊瞎子还是不許曾祥成打潭水。

正在这时，罗世发和他們互助組的全班人馬，吃了早飯，来栽秧子了。老罗看見楊瞎子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便心平气和地走过去和他商量：“楊么爸，王大娘的田是你給她种的吧？”

楊瞎子大声武气地說：“不錯，田是我种的，就是还没拿到工錢呢！”

老罗劝解道：“錢的事好办，放在以后再說可以吧？”

楊瞎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以后再說？罗村长，只要你們互助組能帮她給，多等两天也行。”

老罗見楊瞎子一点也不讓步，就說：“我們互助組刚成立，也沒这么多錢帮人給。以后王大娘要真給不起你的牛工錢，我們把互助組的牛牵来，帮你种一块田补起总可以吧？”

楊瞎子見眼看就要到手的錢被互助組挡掉了，很不高兴地說：“我自家有人有牛，为啥要你互助組来帮我种？”

史良成在一边見好說不行，就反問他：“那你說咋办嘛？”

楊瞎子見他們几个一直也沒动气，以为是怕他，就理直气

壯地說：“沒有錢就莫想栽秧子！”

話抵硬了，事情就難辦了。誰知老羅真有辦法，他笑了笑，說：“不栽秧子，好嘛。楊么爸，把你家的米借兩石給王大娘吃。”

這時其他的組員也開了腔。有的說：“對，對，楊么爸家的米多，借五石也不成問題！”

有的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不允許餓死一個人。他不借米，二天王大娘餓死了就找他負責！”

向來一說話就弄得人下不了台的馮全走到楊瞎子面前，對他說：“楊么爸，你不要紮起你那三股筋！莫看現時用不到我們，肯信你二天死了會讓豬來把你拱出去？我們雖然窮，到時候還是可以幫你劈兩枝柏樹極極嘛。”

老羅見馮全說得太尖刻了，忙插嘴道：“楊么爸，讓我們栽吧。天下農民是一家，應該互相幫助。王大娘欠你的工錢，我們負責，以後再說。”

楊瞎子倒還聰明，知道再鬧下去也沒有什麼便宜讓他占，只好借此下台，說：“好，好，只要你們互助組幫助她，我沒得說的，我沒得說的……”他垂頭喪氣地回屋去了。這樣王大娘的秧子才栽成。

互助組的優越性，大家都看到了；再加上王大娘這些人的宣傳，說互助組如何如何好，這就一傳十、十傳百，到處都傳遍了。羅世發互助組成了一面旗幟，吸引着千萬戶農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在縣委工作組的幫助下，不到兩個月，新民村就由一個互助組發展到了十五個互助組；全鄉、全縣也在新民村的影響下，很快地成立了很多互助組。當時，羅世發互助

組开会討論安排生产和推广先进技术时，都請全村其他互助組长来参加；其他互助組評分記工、調配勞力有了問題时，也要找罗世发互助組派人去帮助。

喜事接二連三地来：

这年的9月間，罗世发被調到县委干訓班学习。在学习中，由項宝同志和我介紹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禾登乡的干部和他同时入党的，还有副乡长黄靜仙等几个同志。禾登乡从此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在党支部和罗世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新民村这一年获得了第一次大丰收，粮食增产15%。罗世发互助組被評为全县第一个模范互助組。在賀模大会上，由县委第一書記曹云生同志代表中共新繁县委奖給他們一条大牯牛。

地主、富农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利用个别村干部对組織互助組的意义和作法还不明确这一弱点，組織并操縱了个别的“互助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是阴險毒辣的！

“挂羊头卖狗肉”

馮恩云口述

土改建政以后，我們万家巷子这边的居民組长是馮昌义。他是个貧农，解放后工作也很积极，就是階級覺悟还不怎么高，容易受人欺騙。

他們同院子住的，有个富农叫刘东海。这个人面善心毒，鬼板眼很多。不知道他怎么施了点小“恩”小“惠”，居然跟馮昌义認上了干亲家。

罗世发互助組成立沒多久，就受到群众的拥护和领导的表揚，全村都在紛紛酝酿成立互助組。这时候，刘东海就对馮昌义說了：“亲家，我們也搞个互助組吧。你来承头，我来撐腰，找几戶人强馬壯的一起来干。只要你搞起来，以后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我們給你撑起，包你哥子能打敗罗世发！”

馮昌义被他这碗迷湯一灌，就有点昏头昏腦了，認为这事

情干得。他也不向上級請示，就趕忙召開小組會，說要組織互助組。在會上，首先報名的就是幾個地主、富農。

當時，曾玉清是副居民組長，覺得這樣搞不大對頭。不過，她沒到鄉上去開會，也不知道上級是怎么布置的。只有悄悄地問馮昌義：“地主、富農也能參加互助組嗎？”

馮昌義說：“人家有耕牛、農具、勞動力，你不找他們互助，還能找啥子都沒有的人互助？”

他說得象很有道理似的，曾玉清因為自己也不知道政策，就沒和他再說下去。

馮昌義“互助組”就這樣麻麻雜雜成立起來了。我們居民組最貧苦的黃常銀、劉選榮和我等人，他們一個都不收。大概因為曾玉清是個幹部，才讓她參加；要不然，他們一定也不會要她這個又沒有耕牛農具、又沒有勞動力的人。

下來以後，我們就找曾玉清商量，要求也能參加互助組。她說：“我去問問羅村長。”

當天晚上，曾玉清到羅世發那里，向他談了馮昌義“互助組”的情況，問他：“互助組能不能接收地主、富農？”

羅世發說：“互助組是不許地主、富農參加的。”

曾玉清又告訴他，我們這些貧困戶也要參加互助組，但被他們排斥了。羅世發考慮了一下，說：“開个村幹部會來研究一下吧。”

過了兩天，羅世發在一次村幹部會上批評馮昌義“互助組”成員不純，叫他考慮進行整頓。會後，那些地主、富農知道了，就在馮昌義面前說曾玉清的壞話，什麼“曾玉清吃里扒外，存心破壞我們互助組”啦，“曾玉清想奪馮昌義的組長當”啦，

“曾玉清故意在罗世发面前打击馮昌义”啦，……真是滿城风雨，把馮昌义也吹昏头了，加上他受了批評，正在气头上，所以不但沒有整頓他的“互助組”，反而糊里糊塗地依照地主、富农的主意来整曾玉清了。

这时，正赶上栽秧子，一天馮昌义通知曾玉清說，“二嫂，你准备一下，大家决定明天来帮你家栽秧子。”

准备啥呢？曾玉清屋里啥都沒有。她过去也是个苦命人，說起来真可怜！她結婚才十个月，丈夫就死了，只生下了一个女兒。按成份說，她家倒是个中农。可是，在解放前分家的时候，她东西沒有分到啥，却分得了一笔大債。旧社会有句封建話，叫“寡妇門前是非多”，何况她又欠了一身債呢！所以，好些人都不敢和她接近，只有我們这些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才敢跟她来往。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是苦命人，彼此也帮不到啥子忙。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女兒，吃糠咽菜，好容易拖到解放，这才翻了身。可是，孤兒寡母，缺少劳力，生活还是艰苦。

这时馮昌义通知她，“互助組”明天帮她栽秧子，要她准备。她屋里連一升米还没有呢！想了半天，沒办法，她只有把熬更守夜編出来的一匹土布拿到街上去卖掉，换回来一斗米、八九斤肉。到家也顧不得休息，就忙着到秧田里扯秧子。扯好秧子，已到大半夜了，又把女兒喊起来帮她烧鍋，她自己就忙着淘米洗菜。两娘母一直忙到天亮，累得連腰都直不起来了，才把飯菜做好。她心里还是滿高兴的——忙一点、累一点，沒啥；只要把秧子栽下去，秋后就有指望了。她擦了擦汗，站在門口等馮昌义他們来栽秧子。

等啊，等啊，太阳都快一竹竿高了，小路上連一个人影子

也沒有！她等急了，就去找馮昌義。誰知他正在田頭做自己的活路呢。

曾玉清當時氣得打抖，但是為了能栽下秧子，只得強裝笑臉地問他：“組長，昨晚你不是說好，今天幫我栽秧子嗎？”

“哦，我忘了告訴你了，他們都說自己的秧子還沒栽完，今天不能給你栽。”

一聽這話，曾玉清心裡涼了一半，她着急地說：“我的秧子都扯起來了，……”

馮昌義頭也不抬地回了一句：“扯起來，就泡在田頭嘛。”

“昨天說好給我栽的，……”曾玉清氣得真想和他吵一架，但轉念一想，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只得把話說軟點：“組長，我把飯菜都做好了，……”

“做好了，自家吃嘛。”

“做了那麼多飯，一天也吃不完。”

“一天吃不完，兩天吃嘛。”

“天這麼熱，飯要餿……”曾玉清實在說不下去了。眼淚在眼圈裡打轉，她強忍着不讓它掉下來。

馮昌義聽她的話沒說完就不說了，抬頭看了一眼，心裡也有些過意不去了，低聲說了一句：“他們都要栽自己的，一個也不肯來，我也沒有辦法。”

曾玉清楞楞地在田坎上站了一會，知道事情是沒指望了，只得沒精打彩地往回走。

沒走幾步，富農劉東海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了。他跟在曾玉清身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喲，二嫂，你真積極，一清早就出來檢查生產。”

曾玉清知道他是故意挖苦她的，理也沒理他，一直朝前走。

刘东海就象一只蒼蝇似的，釘在曾玉清后边嗡嗡：“这真是‘栽秧打谷，娘老子死了沒得人哭！’我的秧子眼看栽不下去，互助組也不来給我互助了。二嫂，你大小也是个干部，請帮帮我的忙，給馮昌义說一下……”

这时，正走到小土地出租者周述先門前。他們象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周述先怪声怪气地接着刘东海的話說：“你呀，刘东海，你是富农，人家貧雇农不和你們富农一起互助，該背时！”

院子里还站着一些地主、富农，他們見刘东海这样把曾玉清挖苦了一场，都心滿意足地发出使人噁心的狂笑。

曾玉清气得脸色鉄青，真想一步跨回家去，关上門大哭一場。她加快脚步，一直往家里走去。

后边刘东海还在怪声怪气地吼叫：“去找罗村长嘛，再去我罗村长嘛！……”

这倒把曾玉清崑醒了。对！这事應該找罗村长談一下。她索性不回家了，車轉身来，便大步大步地往罗世发院子跑。

半路上，碰到罗世发和他們互助組的全班人馬在田里栽秧子。曾玉清把罗世发从田里喊上来，剛要向他談話时，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一顆一顆地直往下掉。

罗世发見她这样，也有点詫了，忙說：“二嫂，莫哭，莫哭，有話慢慢說。”

曾玉清这才勉强忍住泪水，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向他談完。

罗世发听了很生气，忙安慰她说：“你放心，二嫂，他们不给你栽秧子，我们互助组给你栽。”

“那，我也参加你们互助组算了。”

罗世发考虑了一会，说：“二嫂，你暂时不忙参加我们互助组，你们那边不是还有几家困难户，要参加互助组吗？我们也研究过，互助组是自愿结合的，也不能硬叫冯昌义互助组非吸收他们不可。原先是指望冯昌义自觉地把他们那个互助组整顿一下，把地主、富农开除出去，把这几户贫雇农吸收进来。看起来暂时还不行。现在你要再把他们丢掉了跑过来，他们就更困难了。你还是回去，把他们团结在一道，干脆另起炉灶，成立一个互助组。将来以你们这个组为基础，再把冯昌义那个组的贫、中农吸收过来。这样办，要好一些。你说呢？”

罗世发这一番话把曾玉清提醒了。她回来连饭也顾不上吃，马上就找我商量。

我听说要组织互助组，高兴得不得了，说：“二嫂，干吧。我坚决参加！”

她怕我有二心，故意说：“干倒可以干，只是我们这几户太穷，连锄头也没有一把，咋行嘞？”

我见她好象拿不定主张，忙说：“不怕，二嫂！只要你领头，我们没有锄头用手挖，没有耕牛用人拉，没有肥料扯草草，天大的困难都不怕！”

⑨当天，我们又找黄常银、刘选荣等贫农一摆谈，他们都热烈赞成。这样，只一天工夫，我们这个有六户人参加的互助组，在罗世发同志的帮助下，就成立起来了。

互助组成立以后，大家都是贫雇农，没有什么农具。我们

开会一研究，决定各户有鸡的卖鸡，有鸭的卖鸭，卖了钱买锄头、镰刀。我把土改分的四万元（旧币）也拿出来买了粪桶等必要的农具。

我们每天天不见亮就下地干活路，冯昌义“互助组”的人到太阳出来一竿子高了，才拖拖拉拉地下田。就这样他们还讥笑我们是“老兵残将”。遇到我这个人老心不老的人，就是不服这口气，找到冯昌义他们说：“莫看我们老兵残将，你们敢不敢和我们比？”

哪晓得他们根本没把我们这个互助组看在眼里，说：“精兵对良将，要比我们也找罗世发互助组比！”好象我们这个穷互助组根本还不配和他们比赛似的。你说气不气人！

哼！你们说不比，我们还是要比。往后来看看吧！

收谷子的时候，冯昌义“互助组”能出十几张拌桶；他们一天五顿伙食，顿顿打牙祭，又是吃大锅饭，一坐下来就是一二十桌，比过年还热闹。我们每天只能出两张拌桶，各吃各，比起他们来好象是差多了。这时，他们又挖苦我们：“一天连三顿伙食都没弄伸抖，也敢和我们比！”

尽管这样，我们互助组的组员们都信心百倍，干劲冲天，坚决要把冯昌义“互助组”比下去！他们休息，我们不休息；他们收工，我们还要再加个夜班。那些地主、富农故意说：“他们还敢休息？不休息，活路都做不起走！”有的还故意喊我们：“休息一下再干嘛！”

就这被冯昌义“互助组”讥讽为“老兵残将”的穷互助组，日夜苦战，提前收完了谷子。而冯昌义“互助组”却因为伙食开支太大，有些人负担不起；那些地主、富农尽干轻巧活路，还

嫌干重活路的人吃得多，所以經常扯筋、吵架。

这一来，問題就更明显了：地主、富农是“挂羊头卖狗肉”，想把互助組的招牌搞烂，使群众不相信互助組，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另外，他們也借互助为名，剝削别人的劳动。

罗世发起先不是叫馮昌义自行整頓的嗎？后来听說这个“互助組”要和他们比賽，他就迟疑了一下。現在問題鬧开了，他不能再不管了，所以才又在村干部会上把这个問題提出来研究，并向乡上作了彙报。最后，当众宣布解散这个“互助組”；而且对地主、富农提出了严重警告，不許他們再破坏互助合作运动。

通过这件事情，馮昌义才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和地主、富农划清了界限。以后，他一直表現得很好。現在你要問他这件事，他自己都肯跟你談。

地主、富农妄想破坏互助合作运动，可是，他们沒有能成功，永远也不能成功！广大农民按照自身的要求和党所指示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罗世发互助組办了不到一年就提高一步，建成了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提高一步

楊万明口述

我們互助組头一年就得了个大丰收，又被評上了全县的模范互助組，不說本組的組員們高兴得不得了，其他組的人哪个又不羡慕？罗世发从县里开了劳模会轉来那天，全村的人就象一鍋开水似的，比过年过节还鬧热。有的人早就跑进城帮罗世发牵大牯牛去了，有的人就在半路上等着。罗世发一回到村里，不用下通知，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挤到罗世发院子里来了。老大爷們在一起品評大牯牛的好坏；老婆婆們都夸奖大紅花扎得比眞花还逗人喜爱；青年人和村干部、互助組长們忙着拍手欢迎罗世发講話。

罗世发紅光滿面地大声說：“我們这次在县里得奖，是因为我們全村十五个互助組都搞得很好。这条大牯牛不是只奖給

我罗世发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奖给我们一个互助组的，这是奖给我们全村十五个互助组的；从现在起，这条牛就是我们十五个互助组公有的牛了，每个互助组都有一份！”

他这么一说，所有到会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巴掌拍得震耳朵。

罗世发等人们稍许静了一点，又提高声音说：“这朵大红花、牯牛脑壳上的红绸子和全部奖品都是我们新民村的公有财产！二天，哪个接媳妇，这大红花、红绸子就借给哪个。”

他这一说，可把小伙子们高兴死了，他们你拥我，我挤你地闹个不停；老大爷和老婆婆们笑得合不拢嘴；姑娘们都捂着脸挤在一堆格格地笑。

罗世发又停了一下，才继续说下去：“县委指示我们，不要骄傲，今后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发扬阶级友爱，加强组与组之间的团结。县委还总结了我們全村十五个互助组的经验，认为我们经常开组长联席会的办法很好，这叫联组互助，值得推广；我们自己也应该更好地把它巩固起来，经常互相帮助，互相交流经验。大家赞不赞成？”

大家一致说：“赞成！”十四个互助组长都抢着发言，表示：坚决办好互助组，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答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正式成立了联组，公推罗世发为联组的组长。

这样一来，各个互助组的生产劲头更大了，而且建立了很多新制度。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吸收经验、了解国家大事，还经常读报。

有一天，我们在田间休息读报的时候，读到了一篇“山西李顺达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这一下引起了大

家的兴趣。当时，就批开了。大家都觉得合作社硬是比互助组又提高了一步，都想把互助组建成合作社。从当天晚上起，罗世发就召集了我们全组的组员和另外十四个互助组的组长，集中在史良成家里学习。那时候，县委正好派来了个戴同志，我们学习中碰到啥问题，就请他帮我们解释。一连学习了几晚上，关于合作社的章程办法都弄清楚了，就谈到建社的问题了。

当时大家劲头真大。特别是曾玉清，高矮要把她们那个互助组跟我们合起来建社。

罗世发和大家商量，还是以我们这个组为基础，先搞个小社，摸些经验，然后再发展、扩大。其他互助组长也同意了，说：“这样也要得，办互助组是你们走前头，搞合作社还是你们走前头，我们跟到来就是了。”但是附近的几个组，却非要和我们一起搞不可。

这件事须要向上级请示决定，因为当时省内还没有普遍建社，只是开始试点。我们把办社申请书送了上去。这个申请书由县委、地委，一直转到省委。最后，省委批准了，指示地委要加强领导，把这个社办好。地委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又反复给大家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交代办社的方针、政策，解释入社的各种具体问题。经过个别报名、充分讨论，最后确定：我们这个组，除了曾繁玉自己不願参加以外，其余七户全部入社；另外，附近的曾玉清互助组和冯昌义参加六户，再加上副村长吴青云、复员军人刘绍清，一共是十五户。这就正式成立了罗世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间是1952年11月。

当时，这十五户人虽然是高高兴兴主动争取入社的，但合

作社終究是件新事情，农民的私有观念很深，現在要把土地拿来入股、集中經營，难免不有些挂牵。因此，吳青云、曾炳章入社时，就在他們的田里，埋下了界石。第二年他們又鬧了一次退社——那是后話，这里暫且不提。

回头再說，曾繁玉当时为啥不参加合作社呢？原来他有他的打算。

他解放前是办大庄稼的，除了自己的十几亩田以外，还佃了地主石子昇一些田。年年都請两个长工。1946年他就买过一回田，沒搞成。解放的头年，他“脫死人褲子”，买了地主二十亩田，租子都還沒收到一季，就解放了。土改时給他留了十八亩田，庄稼虽是办小了，老底子并没伤到，还是照旧人强馬壯的。耕牛农具齐全不說，一年四季圈里面都有六七只大架子猪喂起，屋里头随时都碼起几十餅麻枯。他家的劳力呢？一个兒子、两个媳妇都不弱。曾繁玉就更不消說了，現今都快六十的人了，打谷子时还是挑双挑的挑手。搞互助組时，他虽然也参加了，不过，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一来可以掙进人工牛租；二来互助組还是各种各收，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三来也好亮块招牌。这陣办社，土地要拿来入股，他就不干了。学习办社的时候，我們就算到他不会来的，我們又想：万一把他动员来了，对办社也有好处，所以天天晚上还是通知他来学习。他才懶得給你动步呢！天天晚上都是打发他大兒子曾祥康和媳妇們来。他二兒子曾祥全解放后就参加了工作，在县上統計科。二兒媳妇古万芬人年輕，嘴巴快，晚上来学习了办社后，回去就給曾繁玉摆，想动员他参加。古万芬每回对他講，他都是鼻子里头打哼哼就算了。古万芬也不敢多說。后来，我們学习

得差不多了，曾玉清互助組也積極要求報名參加，我們互助組就只有他一家還沒定下來。古萬芬就急了，有一天就翻三復四地對曾繁玉多說了几句。這老漢開頭不開腔，後來，聽得不耐煩了，陡地一下跳了起來，伸手就要打古萬芬。古萬芬一趨子就跑到羅村長家裏，不肯回去了。老羅見這樣子不是辦法，就給古萬芬出了個主意，叫她帶信到縣上去叫曾祥全回來進行勸解。

星期六那天，曾祥全在街上扯了一丈二尺天馬牌細洋布，又給曾繁玉買了一頂緞子瓜兒皮帽子，一下班，飯碗一擱就騎起自行車從縣上趕回來了。曾祥全攏屋時，他家里剛剛擺起夜飯，曾繁玉才在上八位坐起。

曾祥全一進屋，他兄弟小娃兒眼睛尖，就問他：“盒盒里头买的啥子？”

“給爹买的帽子。”曾祥全邊說邊就把帽子盒子給他爹遞過去。曾繁玉接過帽盒子打開一看，見是緞子帽兒，伸手就把腦壳上的縷帽兒抓來丟在一邊，拿起緞子帽兒就朝腦壳上一罩，大小正好，車來車去都合適。曾繁玉就抿嘴抿嘴地笑了。曾祥全一見如了老漢的意，又把布牽開來給曾繁玉看。曾繁玉見是細洋布，拿在身上比了兩下，就更笑來眯起了。曾祥全一見老漢的樣子，曉得東西投了心，趁機就給他老漢擺工業化的好處，慢慢就往農業合作化上引。

開頭，曾繁玉都還在笑，慢慢臉色就變了。那時候天色已經麻糊麻糊的了，屋里头又沒點亮，曾祥全也沒有察覺。等曾祥全說到勸爹加入農業社時，曾繁玉陡一頭站了起來，伸手把緞子帽抓來往腳下一甩，提起腿就朝帽兒上一踢，罵開了：“媽

哟，你哪里是送帽子回来孝敬老子，明明是回来教训老子！”

曾祥全还想说几句，哪晓他老汉不让他说，两步就到门背后抓了一根棍子，劈头就打过来。曾祥全他妈和古万芬在旁边见势不对，马上参攏去一边一个把曾繁玉的手拉着，曾祥全这才跑出门来。

曾祥全刚跑出门，曾繁玉把老婆跟儿媳甩开，也追出来了，撵得曾祥全围住草堆转。这时，隔壁两个院子都惊动了。史良成和我们都跑了出来，人多，一挡，曾祥全才得个空子，骑上车子，气得连夜就跑回县上去了。

曾繁玉这一闹，办合作社的事情，咋个还能找他喃？不过，一个互助组办社，七户人都来了，甩他一家，话不说明不好。为了团结，临到宣布建社前，罗世发又亲自上门找他。他表面上对罗世发还是客客气气的，还拿烟递茶端板凳。罗世发给他摆了一阵办社的情形，他开头是不开腔，光是一嘴一嘴地接着烟抽，等罗世发问他：“拿个主意，入还是不入？”他才慢吞慢吞地说：“我看，我还是巩固互助组。”

这样，我们十五户人的社成立时，他就没有参加，名义上是到杨勋五互助组去了。

曾繁玉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互助合作过程中，他一直左右摇摆，与合作社明争暗斗。作为一个富裕中农，当然这也不足为奇。我们倒是可以从他身上吸取不少教训。

下面这个故事，是当时的一位非社员所谈的。

比一比

廖焯华口述

1952年11月，罗世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社员的劲头真大。说运肥料，社员们天不亮就起床，天天进城运粪（罗世发的气力大，一趟就要运三百几十斤）。说做庄稼，那硬是顶呱呱。社里的生产指标突破了解放以来的定额：麦子决定亩产二百五十斤。

这消息一传出去，人们议论开了：

“合作社就是比互助组好，人家那股劲头就是做好庄稼的样子。”

“噢，麦子一亩产二百五十斤，不要秤砣怕差不多。”

.....

曾繁玉最不服气，逢人就說：“他們合作社沒有本錢，沒有

肥料，每亩能收那样多，鬼都要笑出尿来。”

过了几天，曾繁玉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要和合作社拼倒干一干，他说：“你们把合作社说齐天，我总要较一下，看哪个硬肘。”

这老头见说干就干。一天，他碰到罗世发合作社的人，就说：“我代表杨勋五互助组，保证小麦每亩收三百斤，向你们挑战。”

“好呀！矮子长不高，高个见变不矮。”社员冯全不甘示弱地说，“我就不信干不赢你。”

曾繁玉这个老头真凶，马上就跑回家，喊起一家大人小孩，把一块甘蔗田七手八脚几下扯完了。跟着就种上小春，施了十挑干粪、二百斤麻枯。

开头，他的庄稼长得硬是好，麦子长得又高又嫩，绿油油的，比合作社的庄稼看起来象还要好些。哪晓得他施肥不当，等到麦子刚刚长穗的时候，一场大风吹来，就倒成一块板，再也直不起来了。曾繁玉走到田边一看，心都冷了半截。

正巧，冯全路过那里，看见曾繁玉愁眉苦脸的样子，便有意取笑他：“曾四爸，你硬是舍得，庄稼都要拿碾子去碾。”

曾繁玉哼了一声，没有答腔。

“曾四爸，你说的‘麦倒一包糠，谷倒零打光’，这下该输了啊？”冯全想起了以前曾繁玉说的两句话，就用来顶他，非要他认输不可。

“你慌啥，现在还不是定输赢的时候。就算我输了，大春又来嘛，搞不赢你们才是怪事！”他额上青筋直冒，根本不服气。“我曾繁玉宁愿输个脑壳，也不愿输个耳朵。”

“你有几个脑壳呀？”馮全还不罢休。

曾繁玉急得再也沒有話說，轉身就走了。

合作社的小春比贏了，麥子平均每畝產二百六十八斤，比互助組時增產六十八斤。

1953年3月，大春生產開始了。合作社第一個對手，不消說又是曾繁玉。啥子事情他總跟合作社反起干。就拿栽秧來說，合作社栽的是壯秧密植，株、行距只有六七寸；曾繁玉偏要栽稀大窩，株、行距都是一尺二三。合作社合理調配勞力，因地制宜；曾繁玉實際上是單干，當然做不到，他只是拚命往肥料這一頭按。

“兩千斤麻枯全部下田，豬圈給我挖乾淨，廁所給我用水洗。”他手忙腳亂地，直是給屋頭人下命令。

有些人看到這回曾繁玉硬是下大本錢了，不禁為合作社耽心：“噫，這回合作社的莊稼怕比不贏了。”

“你們別管，各人做的莊稼，各人心里有個譜譜。”社員們沒有灰心。

二道秧薅完了，秧子開始亮窩了。一天晚上，忽然一陣大風吹來，天上烏雲重烏雲，雷打火閃，暴雨象瓢澆桶倒似地落下來。羅世安睡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

“天啦，這雨落得多不是時候，秧子倒了咋辦？”老羅再也睡不着了，翻身爬起，把門打開，想出去看看。剛一到門口，一陣大風刮來，連氣都出不贏，哪里能走呀！再說，这么大的風，这么大的雨，出去看一陣，又有啥用呢。他正在發愁的時候，門咚的一下被人掀開了。老羅一看，只見同院子住的馮全披著上衣，慌慌張張跑了進來。

“老罗，糟了，你看这样大的风雨，秧子支撑不住呀！”馮全着急地说。“这天老爷硬没有良心！要是我们的秧子倒了，曾繁玉不在我们头上屙屎才怪！”

“是呀，万一秧子倒了，别人对合作社咋个看呢？”老罗考虑得更深一层。

老罗和馮全整整坐了一夜。天麻麻亮时，风停了，雨小了。他们马上披起蓑衣，戴上斗篷，一口气跑到田里。一看，全社一百多亩田，只有五分地的秧子倒了。他们才放了心。

这时，在去县城的大路上，来了四个人，走前面的搵一把油布伞，后面跟了三个，急急忙忙向田这边跑来。走搵一看，搵油布伞的是项部长，那三个是县上的同志。项部长一见到老罗，头一句话就问：“老罗，秧子倒没倒？”

“没有。”老罗把头一摇，声音提得特别高。

“赶快打电话向地委彙报。”项部长松了口气，给另一个说，“把情况彙报详细些。”

那人说了一声“是”就走了。

这件事象一股风样传出去了。远近好多互助组的人都来了，密密麻麻有好几百。

“同志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们看，这是合作社的庄稼。他们听了党的话，栽了壮秧密植，合理施肥，经得起风吹雨打……”项部长夸奖了合作社，又指着曾繁玉的秧子说：“这是曾繁玉的庄稼，倒成一块板！为什么这样？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

“道理其实也简单，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也是思想问题。”项部长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合作社就是好。”到場的农民心服了。

曾繁玉呢；当时也来了。他拿个竹扒扒，活象热鍋上的蚂蚁，站也不是，走也不是。田坎上这样多人，这个說一句，那个說一句，說得他实在站不住了，就悄悄地脚根烟袋朝一边溜走了。

吃了早飯，說起来也怪，曾繁玉别人不碰，偏偏又把馮全碰上了，想躲都躲不脱。

“曾四爸，是你整对了，还是我們整对了？”馮全劈头就是几句。

“这有啥来头，倒了它要起来。”曾繁玉腰杆软了，說話的声气也小了。

“哦，曾四爸，你說的‘麦倒一包糠，谷倒零打光’，咋个倒了还能起来？”馮全又用这两句話去頂他。

曾繁玉有点火了：“是好的，二天再看收成嘛！”說完一掉头就跑了。

这老头兒就是这股犟性子，明明輸了还硬起脑壳不服輸。

快秋收了，合作社的田里象鋪了一层黄金。这时县委給合作社来了一个通知，叫把社里的产量，向省委、地委彙报。大家都晓得合作社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巩固，主要是看它的产量。谷子打完，一吊秤，合作社一挑有一百五十多斤（平均每亩产六百十三斤，比互助时增产6%多）。又把戴先智互助組拿一挑来吊，一挑只有一百〇五斤。曾繁玉一挑多少，不消說也該拿来过过秤。可是他真聪明，死活也不願拿出来吊秤。还是我晓得他的脾气，就給他来了个“激将法”。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对他說：“曾四爸，把你的谷子弄

一挑来吊一吊。”

“有啥吊头，是好多就是好多。”老头子很厌烦地说。

“曾四爸，合作社的庄稼就是不如你。”我给他脸上直是贴金。“我就不信你的谷子就吊不赢合作社。”

“算了吧！”老头子对我的话有了兴趣。

“吊一挑试一试，明年再和他们拚。”我怂恿他。

“吊是可以，不过你不要跟别人说。”老头子答应了。

“保证不说。”我心里又高兴又好笑。

我们两人把秤吊了。

“咋个的，一挑只有六十五斤？”老头子不相信自己的庄稼，反问我来了。

“咋个的，都怪这个太顽固了。”我指着脑袋取笑他。

“去你的哟！”他把我轰了出来。

比庄稼活象下棋样，曾繁玉这盘算是输定了。大家都从这个事实中认识了：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好。

这时候，冯全又找曾繁玉算账去了。正好两个人在三岔路口碰上了。冯全问曾繁玉：“曾四爸，你一挑过了好多斤？”

“秤过不来，堆堆大嘛！”老头子嘴还在硬。

“你堆堆大，为啥一挑只过了六十多斤？”

“狗日的廖瞎子，他也捣我的蛋！”他不直接回答冯全，反而骂起我来了。

“曾四爸，谷子是摆到那里的，说秤头，论堆堆，你都不行，这还有啥说的？”冯全非要他认输不可。

曾繁玉象放了气的皮球，但嘴还在硬：“做庄稼嘛，又不是

接婆娘，今年輸了，明年再來。”

馮全馬上抓住“今年輸了”四個字追問一句：“你今年總輸了麼？”

“輸了。”曾繁玉把頭一低，從牙縫里擠出了這兩個字。

“好啦，這事已經弄清楚啦。你現在往哪兒去？跟我一路走這陽關道，還是走你那獨木橋？”馮全一笑，得意地往大路上走了。

曾繁玉垂頭喪氣地在三岔路口站了一會。然後，“呸”吐了一口口水，還是走獨木橋去了。

“互助組比单干强，合作社又比互助組好”，經過“比一比”已經比出来了。但是誰会想到，合作社里竟还有人要退出来单干呢？但偏偏就出了这样一件事！

一場風波

史良成口述

1958年秋收上坎，合作社得了个大丰收，把曾繁玉比垮了。秋收后結算分配，哪怕是中农，都普遍增加了收入，貧农就更不消說了。吳青云一家，单谷子就分了五六千斤；曾炳章家分的更多，差点兒就上万斤了。全社十五戶社員中，增加收入一成的有七戶，一至三成的有五戶，三至五成的有一戶，五成至一倍的有兩戶。社外的刘发栋、楊方柱、刘玉芳……好多人都来要求入社。当时社里考虑到社刚刚办好，經驗还不多，怕扩大了不好搞，就婉言謝絕了。

那时候，我是村干部又是社干部，一天到晚东跑西跑，耽擱大，家里劳力又少，全靠我女人一个人干活，沒有掙到好多工分，收入沒有別人增加得多。所以我女人就在我耳边上抱怨开了，說她一个人养家活口、操持家务恼火，要我多做活路，少

管閑事。其实，她也不是怕做活路，主要是听了一些閑言閑話，不讓我出来搞工作。再一层，往年我經濟作物种得多，要用現錢很方便，現在一年分配两次，平时手里就紧一些了；她对这也有意見。当然，最主要的是那点自私的根子沒有取脫，看見別人比自己分得多，觉得自己好象吃了亏似的。当时，我只好劝她把眼光放远一点，又拿罗世发来和我打比——人家担子比我重，收入比我少，可是人家从来就不計較个人利益，我們應該学习人家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有时候，她听了这些話，想想道理确实是对的，就不开腔了；可是，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又鬧起来了，弄得我很伤脑筋。

这里問題还没有解决，那里又有人向我吹火来了。吳青云、曾炳章他們几个，收入增加了，家底子鋪厚了，有了本錢了，就想退社单干，做生意，賺大錢。他們常到我們院子里来吹。我們同院子的有唐兴发，有我，还有隔壁的曾繁玉（他虽然不是社員，不过他是曾炳章的兄弟，又和我們只隔一堵墙，所以也常在一起摆閑談）。那时候，一談起来就說合作社不自由，又說做生意如何如何。特别是吳青云帮社上运了一趟米到理县去，支援那里的筑路工人，回来后，一談起理县的米价比新繁貴三倍，这一下更把大家眼睛惹紅了。这时候就有人要鬧退社了。他們先探听我的口气，問我退不退。我是副社长，家务也和他們差不多，或許还要好一点。他們是想拿我做挡箭牌，看我的脸色行事。当时我正在为老婆跟我扯筋的事弄得很不舒暢，再加上自己也有些个人拔家的思想，所以听他們这么一說，就象进了迷魂陣一样，順口就說了一句，“我也不干了。”

夜里，我睡在床上想来想去，总觉得这样做不对头。在組織合作社的时候，罗世发就告訴我，县委的指示是“只准办好，不准办坏”。我現在怎么能来拆台呢？要不干，解放开头就不該出来当干部。那一陣自己听了很多謠言，顧慮重重，三心二意地，但是在党的教育下，还是坚持着走上了这条正路。我怎么能够前功尽弃，辜負党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呢？……越想越感到不对头。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这件事告訴了罗世发。老罗看我动搖了一下，还是坚定下来了，他就沒有放在心上。我也想，那些人是等我出面来鬧，只要我不出面，大概他們說了就算了。所以我也沒有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老罗忽然气冲冲地来找我，說吳大娘半夜来鬧退社，吳青云一早也当面向他提出了；曾炳章家里也要退。我一听，詫了。都怪我不該乱說！但是話說出去又收不回来了。咋办呢？我們商量了一陣，都拿不定主意。只有先說服一下着了。我們早一趟、晚一趟地找吳青云、曾炳章談，嘴皮都說破了，还是說服不了。他們反說社上不执行“自願”的政策。最后，乡上又研究了一陣，决定讓老罗到县上去請示。

县委第一書記曹云生同志接見了罗世发。他听了老罗的彙報，又問了一些話以后，認為一下子扭不过来，只有按政策处理，讓他們退。老罗一听曹書記这么說，就急了，一下子吼了起来：“这也‘自願’，那也‘自願’，那还不‘自願’垮杆！”

老罗这种急躁情形，在曹書記面前还是第一次。曹書記笑了笑，輕言細語地說：“垮不了。合作社又不是紙糊的。”

老罗被曹書記这么一說，覺察到自己实在过火，弄得脸上紅一杠白一杠的，很不好意思。又想到这两戶一退，社外的人

会咋个看，社里的人是不是安得下来。心里又羞又急，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曹書記又好好安慰他一陣，最后对他說：“吳青云今天退社，是‘代表’，給你們带走了一戶；以后他觉悟提高了，回社了，那时候也是‘代表’，給你們带好多戶进来，很难估計，我看一定是一大批。你不要着急，回去好好处理，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县委。”

老罗从县里回来后，情緒很低，只簡單告訴我，說曹書記叫按政策办事，要退只有讓他們退。我一听也冷了半截。就这样，我們都毫无准备地开了社員大会。

在会上，老罗刚把話一說完，馮全一下子就冲起来了：“嗨，捞上一把就走，那么安逸的事呀！我們一天跑二三十里把肥料担回来，田給他們喂肥了，說退就退？要退，把肥料赔起，工分認起！”

馮全这一吼，曾炳章的兒子曾祥成就还嘴：“沒入社，我也沒有吃不起飯；入了社，也沒有占哪个的便宜。你运了肥料，我也不是沒推車子。赔起、認起的話少来！”

唐兴发、唐玉芳两兄妹也跟着打和声，說：“我們那点地也自己种吧，免得找閑話說。”

.....

这一来，会就不叫会了，老罗嗓子喊哑了也沒人听。馮全提起水烟袋，一冲进屋去了。吳青云两娘母也不給哪个打招呼，起身就走。曾祥成两口子脚跟脚地离开了会场。其他人也象“口袋头装茄子”一样，噤噤咕咕地，有說鬧退社的不对，有說馮全不对，一个二个都自动散会了。我看看就剩了老罗、徐繼英、曾玉清几个了。我想說什么也說不出，他們几个也是

誰也不搭理誰，各想各的心事。我这时候，完全灰心失望了。心想：散就散吧。我也奄奄地走了。

走了以后，我又有些失悔。我自己也晓得，我是社里举足輕重的一个富裕中农，我这一走，还不把老罗他們心都走空啦！但是，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泼了的水，还收拾得起来嗎？

快走攏屋了，我想想实在不对，馬上又折轉去。走到老罗家院子門口，我也沒有进去，就在門口站着。只見老罗气得紫勾起脑壳坐在阶沿边一把椅子上。徐繼英站在一边，抱起水烟袋直是抽。曾玉清也站在那里悶起不开腔。

悶了好久，徐繼英咚地一下放下水烟袋，冲出一句：“啥子哟，老罗，垮不了！他們不来，就剩我們三家人也要搞下去。”

曾玉清也接了腔：“我一个寡妇，还拖着个娃兒，任随他們怎么样，我們母女，死也要死在社里头！”

老罗一听这话，才抬起了脑壳。只見他眼泪花花直轉，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把头一昂，身子朝椅背上一靠，又去想他的去了。

我站在門口，看見他們这个情景，心里很难过。本想进去向老罗表示一下态度，但一听到徐繼英、曾玉清那些話，又觉得自己沒脸見他們，所以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罗，老罗又到县上去了。这时，我心里越想越不是味：为啥曾玉清、徐繼英她們就那么坚定？我为啥总是左右搖摆？就是退一万步，拿我和老罗的私人感情來說，我也不該在这紧要关头甩开他呀！何况社里只有他一个党员，我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是副社长，是他的二把手，怎

么能不支持他呢？我越想越难过。

下午，老罗从县里回来了，说曹書記馬上就来，通知大家今晚开个社員大会。天还没有黑，社員們刚到齐，曹書記就骑着自行車来了。

开会时，曹書記先講了一陣搞社会主义的道理，又說了一陣共产主义的前途，才提到退社的事情上来。他問大家，是不是都不願办合作社了，都要退社？徐繼英馬上就說不退。曾玉清也說不退。接着，又有好几戶人說不退。

这时候，我看大家都抱着怀疑态度看着我，連老罗好象也不信任我了。这怪誰呢？怪我自己。我正感到难堪的时候，忽然听到曹書記点名問我了，“史良成，你怎么样？”

我一下子坚定起来了，連頓都沒有打一个，說：“不退！”

大家都有点詫异，我却很高兴，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搬开了。

馮全趁此机会就拿話把刘选銀釘起，說：“我們都不退，刘选銀，你喃？”

刘选銀說：“我也沒說要退。”

正气起来了，曹書記才又說下去：“大家要是覺得社里有缺点，可以提出来改正；覺得自留地少了，不太活動，也可以研究，再抽一点各家种点甘蔗、烟叶呀什么的。”

曹書記这么一說，吳青云就松口了，曾炳章的兒子曾祥成也松口了，都說：“只要能多抽点地，不退社也要得。”

曹書記問要抽多少。吳青云开口要一亩四，曾祥成說要二亩二，唐兴发的口气更大，要把七个人的田抽五个人的回去。

这么一抽那还行？老罗急了，拉着曹書記咬耳朵。馮全更干脆，一张口就冒出来：“这样留，还合作个屁？自留地把粪水用完了，社上的田光拿水搵？”

他这一叫，没人再說要抽地了。曹書記抓住这点，就叫大家辯論。当然，大家都不同意这样抽。吳青云見大家口一紧，又把不退社的話收回去了。他又拿他媽出来頂起，說他媽思想不通。这点哪个还不清楚，退就退吧。他退了，曾炳章一家也退了。这时，除了叶志修、唐兴发两家还不稳当外，就只有楊全还在表示要考虑一下。

大多数人定下来了。十几天后，唐兴发、叶志修都收了心回社；楊全又比他們还要早几天。曾炳章最后也回社了。

吳青云呢？做生意，鬧了一場空欢喜，事情的經過說起来怪笑人的。总之，最后还是“逼上梁山”，回心轉意地又入了社。

誰走对了呢？相信党的話，走大家富裕道路的人是走对了的。不相信党的話，想走个人发财道路的人是走错了的；而且这条道路，在我們社会里是走不通的。

吳青云退社的事就是一个教訓。

此路不通

黃正清口述

說起吳青云那年鬧退社的事情來，便是又氣人又笑人。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

就在谷子分完，各家都挑回屋了的當天晚上，吳青云的媽——吳大娘拄根棍子，到我們家找老羅來了。

吳大娘一進門，就沒頭沒腦地說起來了。說啥她家土地分得少呀，人口又多呀，……她這些話弄得我們簡直摸不着頭腦。老羅以為她是对土地分紅有意見，問她是不是，她說不是。老羅又問她是不是工分上有問題，她還是一個“不是”。接着，老羅一連問她幾個“是不是”，她一連回了幾個“不是”。這就弄得人更摸不到底了。老羅只好鼓勵她自己談，叫她不要有顧慮。

·这样，吳大娘还东拉西扯地扯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我們家那点地，自己办得下来。”

老罗不听她这句话还好，一听她这句话，差点气都接不上了。好容易忍了又忍，压了又压，才說：“吳大娘，你的意思是要退社？”

話叫明了，事情抵硬了，吳大娘說話也不打頓頓了。左一个“工分上吃了亏”，右一个“肥料少算了錢”，总之一句話，她家是再不願留在社里了。

老罗压着气劝她一陣，劝不好，只好叫她大兒子吳青云来談。以为吳青云虽然在当了副村长以后，有退坡思想，但究竟是帮工出身（在地主家干过长工，有时候也推过鷄公車販米），解放初期也还积极跳過一陣，思想上总容易通一些，話也要好說些。哪晓得才不是那回事呢！

第二天一早，吳青云来了。装起啥事都沒有的样子，反問老罗找他啥子事。老罗問他，他媽昨晚上來說退社，是咋个回事。他才做起恍然大悟的样子，說：“有这回事。”接着，他把他媽昨晚上說过的話翻了一遍，还說他媽在屋头扭着他鬧。他这么一說，老罗看眉眼、觀神色，早已明白了他的心意。但吳青云高矮都不說他要退社，啥都是他媽的問題。老罗見他这么不坦率，就拿話頂他，兩句話就挖到了他的疮疤子。把戏一戳穿，吳青云也就不再裝門面了，打明叫响地鑽政策的空子，开口一个“入社自願”，閉口一个“退社自由”。

老罗說干了嘴巴都把他說不轉，只好答应他等社委会研究了再說。

这里才开了头，第二个又跟到来了。曾炳章家也要“把田

抽回去自己做”。

接着，退社的事就鬧开了。最后，还是曹書記亲自出馬，帮社上把这件事处理了。

吳青云退了社以后，第二天，就挑了十床晒席在田头鋪起，撮了二千多斤谷子出来晒。当晚又把它碾成米。第三天一早，弟兄两个就推到理县卖去了。这一趟賺了一笔錢。回来后，又把剩下的三千来斤谷子一齐碾出来，推起走了。家里谷子碾完了，又在乡場上收購，一連跑了三趟，賺了一笔大錢。

第三回卖完米回来，吳青云在城里买了半匹海昌蓝洋布，又买了些肉。布在車上搭起，肉在車上挂起。一回到場上，在茶館門口把車子一放，排排場場地买了两支大前門，又买了一串油炸麻花。这一来，惊动了不少人。黄基发互助組有几个人在里头喝茶，看見这个架势，眼睛都紅了。吳青云見人眼紅，就更神气了：“这算得啥子，再跑幾把，脚上还要蹬它双响响皮鞋呢！”

經他这一吹，有些人就动心了，也想走他这条路子。一連几天，茶館酒鋪里都在說这件事。

吳青云賺了錢，有了經驗，胆子就大了。这回他在市場上收購了裝九部車子的米，在街上吆喝：“哪个推車子？别个一天給一块，我給两元。”黄基发互助組有几个人就遭他拉起跑了。

八九車米，吱吱咕咕推了一长串。吳青云也变成老板了。他不推車子，手上提个口袋，嘴里叼根紙烟，头車走一陣，后車催几声：“快走呀！”

哪晓得，这一回到了理县，米价突然調整低了，跟新繁差

不到啥子。吳青云不甘心，想等米价再涨上去，就在栈房里住了下来。一天两天，米价不涨，他还稳得起；三天四天，他就慌了。天天卖点米开脚錢、房錢、飯錢，这样下去咋遭得住？又等了两天，他沒法了，只好按照政府規定价格把米卖了。

这回餉了大本不說，回家后新繁又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了。这一下把吳青云急坏了。屋头鍋盖揭不开，地里种籽撒不下，人餓起，田也餓起。两娘母，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吳大娘到成都跑了一趟，找她在部队上的二兒。她二兒知道这件事以后，当然就說了她們几句，劝她还是回社。吳大娘回来以后，看到社上小春都出土了，自己屋头种籽都还没得。咋办呢？

一天夜里，吳大娘又到我們屋头来了。老罗一开門，見她冷得打抖，就喊我起来把火烧起。一問，才知道她半夜三更摸起来，又是月黑头，半路上滾到水沟里去了，回去把棉衣烤了个半干，才又赶来。我給她塞了个烘籠，又煮了碗榜糟蛋給她吃了。这时天已慢慢亮起来了。

开头，吳大娘吞吞吐吐的，也沒有說明来意。不过，这可跟上回不同，她一进門，我們就曉得她是来干啥的了。我們还是等她先开口。

吳大娘說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紅着臉說了一句：“罗社长，我們还是回社吧。”

老罗想起她以前退社时那副神情，就故意反問了一句：“吳青云做生意不是很好嗎？”

“哎呀，还提这干啥哟！”她央求道，“那陣是我們不对！罗社长，还望你寬洪大量，……”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要社員大家来商量；再說，你們逼

是要多想一想。”

“通啦，通啦。是木脑壳嘛，經了这么一場風波，也通啦。”

“吳青雲呢？叫他也來當面談談吧。”

“哎呀，羅社長，他沒臉見人呀！連我都不好意思來的。好了，好了。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們自己不是。羅社長，我這就叫吳青雲他們來上工。”她深怕不答應讓她家回社，丟了这么一句話，就走了。

吃了早飯，吳青雲真的耨起鋤頭在社里田頭做起活路來了。社員們雖然有些奇怪，但猜也猜得到，他是要回社了。

馮全故意大聲地對他說：“哎，吳青雲，你弄錯了，那是我們社里的田喲！”他把“我們”兩個字的声音提得特別高。

吳青雲臉脹得緋紅，低低說了一句：“社里的就社里的，一樣干麻。”

老羅正好走那里過，就對社員們笑了笑，又給他們打了個招呼，叫他們不要再挖苦他了。

當天晚上，社委會研究過後，又開了社員大會。那天吳大娘端了張小凳子，埋起腦壳，坐在後面角角上。

老羅講了一陣黨的政策，打通社員思想。說明農民總是一家人，哪個走了彎路，絆了跟斗，大家都應該拉他一把，歡迎他回頭跟大家一齊朝前走。最後，社員們通過了，讓他們回社。

會後，老羅問吳大娘：“每回開會你都坐前頭，今天咋個坐到後頭去啦？”

吳大娘臉一下就紅了：“你眼睛真尖，我還說你沒有看見呢！”

党真英明！正当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开始抬头的时候，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并且召开了一系列互助合作会议，把互助合作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罗世发初级农业社不仅没有被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小股逆流冲垮，而且打大了。

綠树成蔭

黄静仙口述

1953年11月，罗世发在成都开完了互助合作会议回来，马上就回乡上来找我。他高兴得满脸是笑，一见面劈头就说：“老黄，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同意我们扩社，明年把社员户数打个滚！”

我当时有些不大明白，问他：“是真的？”

“真的。李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还亲自跟我谈了这个问题呢！”

“你见到李政委啦？”

“李政委召集六个农业社的社长座谈，我也参加了。”

“談了些啥？”我端了張椅子讓他坐下，又倒了杯開水給他。

他喝了口水，就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筆記本拿在手上都沒有打開。

“李政委先問我們今年生產怎麼樣。我告訴他：都增了產，合作社增產最多，把村里最富裕的中農曾繁玉都比輸了。李政委對這件事很感興趣，指示我們：合作社要鞏固，就要超過當地富裕農民的生產水平，這樣才能把所有的農民都吸引到這條路上來。他又問我：現在群眾對合作社怎麼看法？我就告訴他：劉發棟他們早就要求入社了，現在要求的人越來越多。他問我們準備怎麼辦。我說：我們經驗還不多，社還不怎麼鞏固。接着，我就把吳青雲他們退社的事向他彙報了。我想：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他們也都回社了，但總是件不光采的事，李政委听了大概也會不高興的。所以，我又補充了一句：我們暫時還不想擴社，把要求入社的人都打發轉去了。李政委一听我這樣說，就問我：不要人家走合作化的道路，要人家走哪條路呢？他看我楞住了，又耐心地向我解釋：農村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正在開始抬頭，要和我們搶地盤；我們不能讓步，應該把群眾往社會主義道路上引，群眾本身也有這個要求。黨公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群眾覺悟更加提高了。不光是我們這裡的農民積極要求入社，到處都一樣。還說吳青雲退社並不是一件壞事，現在看來壞事倒變成了好事，因為它告訴了其他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此路不通。李政委這麼一講，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這時，他又問我：哪些人要求入社最積極，平常的表現怎

么样？我就一户一户报给他听了。最后，他问我们社估计可以扩好大；我算了一下，说，打个滚绝对没有问题。他认为很好，不过，又特别嘱咐我们，不要硬逗三十户，少几户多几户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要把工作做深做透。”说到这里，罗世发端起茶杯，咕嚕咕嚕，一口气把水喝完了。然后问我：“你看咋个？”

我这时候已经听入神了，正在仔细琢磨李政委的这些指示。我原来的思想也和罗世发一样，吴青云退社，就把我们吓住，不敢扩社了。李政委看问题可是不同！……

罗世发见我不开腔，又说了一句：“你是支部书记，这件事一定要支持哟！”

我这才回过神来，说：“一定支持。马上就开支部会，你再详细向大家传达一下。”

党支部会开了以后，接着又召开了各种会议，组织全村群众进行讨论。社员们分别参加各个组，讲解合作社的优越性，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果然，正如李政委所分析的：群众刚学习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了；又亲眼看到了罗世发社今年增了产，每户人都增加了收入，认识了合作社的好处；吴青云的教训，也成了一面镜子。所以，大家劲头都很大。讨论刚结束，好多互助组都递来了申请书，要求全组入社。这还不算，有些人又单独跑来报了名，表示非入社不可；还有一天跑好几趟的。

七十八岁的玉世全老汉，在建小社的时候，本来已经被吸收入社了，就因为他儿媳妇觉得自己的苞田好，怕吃亏，才临时变了主意，参加到黄汉举互助组去了。他家的田离互助组

远，付出的工分要多些，他們翁媳俩挣进的工分又少，算下账来，当然要补人家的工资。结果，除了锅巴没得饭。再看看合作社，家家都增加了收入。不说老汉呕气，媳妇也失悔了。吴青云退社的时候，王老汉都批评过他：“你霉了，合作社这么好，你还要退出来！”

这阵听说要扩社了，王老汉一天好多趟地往社里跑，要求入社。他儿媳妇也背起个娃儿，到处找社员们说好话。遇到不肯饶人的馮全故意问她：“你那苕田好，冬苕要卖一道钱，还要割道猪草，入社不吃亏吗？”

“哎呀，还说那些做啥，我们老汉都已经把我骂惨了。都怪我有点资本主义思想，以后坚决克服！”

当时，不光是说好话、提保证，还有些人把土地证都拿来了，说：“我明天就到社上来出工。”也不管你答不答应，把土地证丢下就跑。

团转的人是这祥，河那边别个村的人也是这祥，连邻县新都的农民都跑来了。你说这个影响好大！

我们一看这劲头，心想：原来说的只是打个滚，现在来了这么多人，咋收得到口？当时老罗就说：“要一户一户单独报名，一定要全家愿意。”

我们刚把话传出去，这一下，可热闹了，每家每户都牵起线线来啦。社办公室院坝里挤得水泄不通，门都挤烂了（后来换了两扇新门）。接连报了三个晚上，一共报了一百六十多户，几乎全村都报了名。

有些人报名时作揖打拱地说：“做做好事吧！”把人腰都笑弯了。

馬五福老汉請人写了張紅紙条，跑到社里來，一進門就跪下了。我們趕忙把他摻起來，他被大家笑得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只好借口掩飾，說：“聽說要入社，我高興得腳杆都發軟了。”

群眾這樣積極要求入社，咋辦呢？給他們說：“我們經驗不多，不敢擴得太大。”

他們就說：“你們說要全家願意，我們都開了家庭會，全家一齊來報的名。”

有些人還故意用威脅的口氣說：“我們互助組已經收了攤子，解散了，非入社不可！”

當時我們弄得簡直下不到台。幾個幹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後，還是老羅出來向大家說：“要入社光是全家願意還不行，還要把生產搞好，把糧食統購任務完成好，用實際行動來爭取。”

大家說：“對嘛，我們把生產搞好了，把統購任務完成了，總要讓入社了吧！”

他們說干就干，一晚上就把要賣的余糧送完了，超額完成了國家任務。有些人差三斤五斤，也都連夜再跑一趟補足，深怕入不了社。

我們把情況作了研究，決定讓老羅到縣上去，向縣委請示。老羅從縣上回來後，說：“曹書記今晚要親自來，叫我們先把互助組長召集齊，要開個會。”

我們剛通知了各個互助組長，曹書記已經騎着自行車來了。他一攏就開會。還沒等他開口，互助組長們就鬧開了，七嘴八舌，噁噁喳喳；一句話：非入社不可。

曹書記一面听取汇报，一面就給大家解釋：这个事情还要仔細考虑，总之，一定会滿足大家的要求。但是互助組長們坚决要求当时就决定下来，好去向群众交代。

正說到这里，不知道怎么的，群众也跑起来了。曹書記出来对大家說：“你們先回去把生产搞好，互助組不要解散，等决定了再說。你們听不听我的話？”

大家說：“端到干飯，喊我們吃稀飯，咋个听話呢？”

曹書記一看這場面，又高兴又着急，說：“社，一定是讓你們入的；不过，是搞成几个小社，还是搞成一个大社，还要考虑。”

大家說：“罗世发社搞得好的，我們不搞小社，要加入他們的社。”

曹書記解釋了好久，好容易才把群众劝走。这时已是深夜一点过了，曹書記又連夜赶回县里去了。

第二天一早，省委农村工作部来了六个同志。他們一到了社里，有两个来找干部，那四个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去了。經他們調查的結果，情况是真实的，群众要求入社的劲头硬是那么大。

这样，經過反复調查、研究，新民村全村办成一个大社的要求终于实现了。与此同时，全乡又新建了四十五个小社，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入了社。

1954年元旦，全省第一个大社——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那时候，还没有修大礼堂，庆祝大会是在院壩头召开的。省内办得較早的几个社的社长，王达安、袁光华……被邀請来参加了典礼。周围几十里的許多村子也都派了代表

来。自动跑来看热闹的人那就更多。院壩里挤满了不说，连房顶上，树子上都爬满了人。

副社长史良成宣布社员名单的时候，会场上一下子静下来了，好紧张啊！念一个名字，就是一阵笑声、一阵掌声。有些老汉把胡子都笑翘起来了。

名字念完了，有些榜上无名的，马上就闹开了，说：“我们有哪些缺点嘛？天不亮就来了，等了这么久，还是管箕打水——枉淘神！”

老罗一面向他们解释，一面请他们留下来看戏。他们不干，故意说气话：“我们又不是社员，没资格看戏！”当场就把一家大小引走了。不过，说管说，做管做，他们还是一心想入社。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走上互相合作道路的经历也不同。大部份社员都是全家满意，很高兴、很顺利地就入了社。然而，也有些人是经过一番周折才入社的。

家庭糾紛

刘芝秀口述

我这个人脾气犟得很，从来都是說干啥就要干啥，家里人誰也管不住我。解放第二年，我才十三岁就参加了妇女武装队。那时候，家里不讓我去，我就偷偷跑出来；武装队不收我，我就賴在那里不肯走。最后，到底还是讓我参加了。1954年扩社的时候，我又鬧了一场家庭糾紛。

1953年年底，罗世发从省里开会回来，在万家巷子开会。我从来就是爱鬧热的，哪里有新鲜事，哪里就有我。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跑了去。那晚人真多，密密麻麻地挤了一滿壩。我人小身矮，說啥也看不见罗世发，一急，就从人家的腓子窝底下鑽过去了。

罗世发正站在那里和别人談話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把拉住他，問道：“驢子哥，你从城里头給我带些啥来？”

罗世发敲了我一下鼻子說：“小鬼，給你带来好东西，去，坐在那里好好听我講。”

我坐下后一心想看他的好东西，他說了些啥，我根本没听，糊里糊涂地散了会。我們互助組长刘宗貴說：“来，我們討論吧。”

“討論个啥呢？”我摸不着头脑地問。

“罗世发講了这半天你没听呀？”

我瞎眼了，“哎呀呀，原来是驢子哥騙我呢！”过后我才明白，罗世发說的好东西，就是他講的那些話。想起来又好笑又失悔。

討論就討論吧，反正我先听別个談。平时我最喜欢发言，这下可搶不了先了。我一面注意大家談，一面就在想。大家說：互助組比单千戶强。我想：这倒是真話，我們的粮食就比单千时多收了。大家說：合作社比互助組又提高了一步。我想：是呀，罗世发社不是比我們多打粮食嗎？所以他們一說到罗世发社要扩大，我就憋不住了，說：“入社，入社，我們入社！”別个說啥子动员家里呀，我根本不听了，心想：这么好的事，誰不願干，还要动员个啥？保险一說就成。我也等不到散会了，拔起腿来就跑。罗世发一把拉着我說：“你回去要好好跟你媽說，莫把好事办坏了。”

我說：“保証沒問題。”

我一口气跑回家，先不找我媽，因为她不是我的亲生娘，我娘早死了。娘死了后，啥事我都是和爹商量。她來我們家虽沒打我罵我，随便咋个，我都和她合不攏。这回入社，我还是先找我爹。

我爹正在卷叶子烟，我就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当时屋里头没灯没火的，也看不见他是生气，还是高兴。只见他卷了一支又一支的，我想有门路，大概动了心。哪知道他根本不拿我当回事，半天才说：“你懂个屁，成天野跑，别个都还没有入社，你就入社了？哼，看看再说嘛。”

啊，头一关就没有闩过去！其实，我爹是想看一下火色，当时我不了解，只觉得他不答应就是顽固。所以，越说越僵。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骡子哥”。

罗世发听了我的话，他一点也不急，稳起稳起地对我说：“你回去再找你爹说嘛。”

“他不听！”

“不听再说，再不听就多说，说到他听了就不说了。”

嘛，这算个啥主意！我把嘴一嘟，说：“人家跟你说正经话，你跟人家开玩笑！”

“我这不是说的正经话吗？”他还是笑嘻嘻地。

“你叫我跟他再谈啥子嘛？”

“谈合作化的优越性。”

“我谈不来！”

“谈不来，我教你嘛。”他拉我坐下，一五一十地给我讲开了。

嘛，他讲得真好！又生动，又具体，又有事实，又有道理。听得我直是点脑壳。

讲完了，他又叮嘱我：“你爹不是要看看再说吗？你要特别讲清楚，现在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在要求入社，好多家务比你们好的都想通了。不信，叫他自己挨家挨户去访问一下，看人

家是为啥要入社的。”

我說：“要得。这一下他一定会答应了。”說完，我車身就跑。

回去以后，我就向我爹开了一遍留声机，把罗世发的話轉述了一道。

真灵！經我这么一說，爹的思想居然馬上就通了。过后我才晓得，原来他早就出去打听过了，当时我还以为单是这么几句话就把他說服了呢。

爹的思想是通了，可是，最麻煩的事是在媽身上。这一点，我爹是知道的。所以他說：“我答应了，你对你媽說去吧。”

嗨，他想往我身上推！我咋肯答应！我对他說：“我才不去呢！你去。”

我們两爷子你推我，我推你，推了半天。結果还是父女齐上阵，爹遭我推起走前头。

媽一看我們这个样子，就知道来头了。所以沒等我們开“枪”（腔），她就先把枪尖尖对着我了：“你大惊小怪的，要入社你就去，莫跟我說！”轉过来又对着我爹：“你也跟她赶一条船！”

我知道事情麻煩了。只好把罗世发教我的办法拿出来，对她进行說服，白天說了，晚上說，吃飯也說，做活路也說。哪晓得我犯了教条主义了，沒有根据具体对象灵活掌握这个策略。所以，結果还是沒有說成。最后，我也沒有耐心再說了，便去把“驢子哥”搬来了。

罗世发一来，我就躲了出去，讓他和我爹一起去找我媽談。

我跑出去耍了一阵，心头总挂着說得成說不成，就悄悄地往回走。正好罗世发也出来了。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說：“小鬼，明天快去报名吧。”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高兴得怎么也睡不着。越想睡就越睡不着，一赌气把头蒙起来，看你睡不睡！我本想天不亮就起床的，哪知道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这下又急啦。我跳下床，打开柜子，拿起土地証，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拔腿就跑。两条毛根跑得立起来，我也顧不得了。

我跑进罗世发院里，一看，啊呀！人家早来啦，听说还有五更就来叫門的呢！报名的人可真多，都挨个挨个的排着。我也不好往前挤，只有排在后边，心想：反正来啦，心願了啦，多等一下怕啥。那天大家都很高兴，你一句他一句的，說得好熱鬧呀。

該我登記了，會計馮昌义說：“怎么你一个人来，你家里通不通？”

我見他不給我登記，就急着喊道：“当然通啦，不信你問驛子哥嘛！”

他就不再說啥，給我登記上了。

手續办好以后，罗世发走来对我說：“你心事啦，再別天天纏着我啦。”

我說：“問題解决了，还纏着你干啥！”

他說：“那就吃了飯再走吧。”

“誰吃你的飯。走了，走了。”我一趟子又跑了。

等我回到家，屋头已經吃过飯了。爹在椅子上坐着，吧叶子烟，他問我：“你报了名啦？”

“当然报啦，去了还不报。”我说这话时就偷看着我妈，妈站在爹侧边啥话也不说。

第二天开干部会，挨家挨户地审查入社户，我也跑去了。会上审查黄建章时，就因为他們闹分家被审查掉了。当时我想：要是我們被审查掉了，我准会哭鼻子，不然就只有跑，免得丢人。等到审查我們时，我心里活甩活甩地。这时罗世发就介绍了我家的情况，大家没多說就通过了。我心疼地一下才落实了。接着又审查別家，一直到下夜一点鐘。第二天又审查。这工作完了，被审查掉的有十二户。

接着又召开了社委扩干会，我也被吸收参加了。开会时罗世发先講了一下：“每个队要考虑两个队长，要一男一女，以便于工作。”

討論到我們这队时，不知怎么搞的，大家都要选我当女队长。我一听，就喊道：“我不干！我这点大个人，人家那么大的，我怎么喊人家作活路。叫不动时你們又要提意見，那不是搬鬼上吊，吊起又不管嗎？”

罗世发說：“十六岁就成年了，还小？黄静仙还不是十六岁就当武装队长了？我开始出来搞工作的时候，項部长就对我說过‘年轻人有朝气，干劲大，接受新东西快。’我們現在就是要多培养些年輕干部。何况你人虽小，資格却很老呢！”

他最后这句话把大家都說笑了。他們也說：“对的，你愛跑愛跳，斗争性又很强，要得。”

罗世发又开玩笑似地补了一句：“可就是要看对什么人，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乱斗爭。”

我橫說豎說，总是推不脫。最后，还是把我籠起来了。老

实說那时我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入了社，当了干部；害怕的是怕工作难打整。幸好开头还算順利。因为大家都新入社，劲头很大，我才放心地当了队长。

不几天就到了1954年的元旦。那天开扩社大会，宣布改名为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公布了社員、干部名单。

当天晚上，各队就开始分头研究生产，布置明天的工作。會議刚开到一半，生产还没有研究，就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外面喊叫。开头，我没听出来是哪个，又听到她說：“入社我們不来了。”这才听出是我媽的声音。我心头一惊，跟着就跑了出去。

果然是我媽。她站在門口，还在喊呢。

我問她：“你这是干啥嘛！入社不是取得你同意的，你又来鬧啥子？”

她說：“你管我的呢！”

我急了，就跟她吵：“你是安心来鬧事嘛咋个！你听了哪个的閑話，是哪个龟兒对你說了啥子，你指出来，我不甩他几耳巴子才怪！”

事情是明摆起的，我媽平时少出来开会，啥也不懂，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拨。可是她不承認，反說：“我听哪个挑拨，活了这么几十年，这点主意我自己拿得穩。”

我急得沒法，只好將話問她，說：“入社是自覺自願的，当初你是咋个对老罗点头的，現在又反盘了，真丟臉！”

我媽不認簧，大声武气地吼：“丟臉是丟我，丟不到你。社，我就是不入，要入你入！”

我气慘了，也顧不得別人听見笑話，也跟着她大声地吼：

“你鬧啥嗎，鬧啥嗎！”我本想和她講道理，可是气得啥話也說不出來。

這時，里边直喊我開會，我還有啥心腸開會嘍，也顧不得臉上不好看了，就對他們嚷：“開啥會嘍，我又不是幹部了！你們沒聽見我屋頭都要退社了嗎？”說完我就跑了。當時氣昏了，糊里糊塗的，烘籠把衣服燒個大洞洞都不知道。一進屋倒在床上就哭。

我媽隨跟脚步也攆回來了。她進屋就問：“你沖啥子嘍，你沖就把哪個吓倒了？你積極，積極很了看背脊骨疼！”

我一下掀開鋪蓋就和她吵。我爹攆來喊我“別吵了”，我也不管。這時我啥也不顧了，拿話就傷她，還說了啥子：“我親娘沒把我教好，你也不配。”

一個當后娘的聽到這種話當然釘心。她跳起來就吼：“找劉村長來弄清楚！”

我反激她說：“好意思去找！”

她一聽，一跌腳就往門外沖，說：“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我要是丟了你們劉家的人，河頭又沒得蓋蓋，我自己會找出路！”

我爹一把沒把她拉住，喊她也喊不住。想追出去，又怕親生女鬧外了，不追，出了事情更难說。真是夾板氣，兩頭都不松活。他急得沒法，又不好拿重話說我，只是輕輕地埋怨我說：“眼看就臘月三十了，你還跟她鬧啥子嘛！萬一鬧出事來，你叫我咋辦？”

媽跑出去半天沒回來，我也有些耽心了。我怕她真去跳河，就對我爹說：“我們看看去吧。”

我們走出門，天黑得啥也看不見，远远聽見我媽在喊羅世發，我們才放心，又回到屋頭。可是等了一會，還不見她回來，我們又出去了。剛出院壩，就見羅世發那邊有手電筒光，是羅世發把她送回來了。我就先跑進屋頭，故意不理她。

羅世發一來就對我說：“你們鬧些啥子嘞？”

我就把剛才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對他說了。

羅世發說：“一家人該好好商量，這樣鬧出去影響多不好。”他一邊說就一邊給我遞點子。我就不說啥子了，反正有他呢。

回頭羅世發又找我媽說，談些什麼，我不知道。最後我見我媽給羅世發做碗粉糟蛋吃，大概是消氣了。我真佩服“驢子哥”有一套。那夜事情就這樣擱平了。

第二天早晨，天都大亮了，我睡倒不起來。我媽喊我幾次吃飯，我也不理她。後來我爹又來喊我，我還是不起來。我爹說：“你要咋個嘛？”

我說：“要入社！”

我爹站了半天，才說：“有啥辦法呢，反正我們有三份田，把你那份拿出來，你先入吧。二天你媽想通了我們再入。”這樣我才起來到社上去。

羅世發聽了我的話，說：“你拿出你的田來入？”

我答應：“嗯。”

他把我鼻子一戳，說：“你才想得松活。”他見我不懂這話的意思，又補問我一句：“這樣一來，人家會咋個說我們合作社嘍？會不會說我們合作社把人家一家人，拆得妻離子散、六親不和？”

他問得我開不起腔了，然後才告訴我：我媽只是听了一個沒有入社的人挑撥了一句——“入社，二天茗菜都吃不到一根！”她才鬧起來的。本來只要把政策向她講清楚，就沒事了。現在被我這麼一亂鬥爭，倒弄得不好下台了。他叫我去賠個禮。我說我要堅持真理，絕不向落后思想低頭。最後，他見我高矮不答應，只好說：“那就叫你爹給你們調解一下吧。”

這倒差不多。我馬上就回家跟爹說去了。

哪知道，爹也不干。我一賭氣，又躺到床上不起來了。爹急了，這才替我去向媽說了几句好話。

媽也知道事情是自己先引起的，現在社長講清楚了政策，爹又說了好話；另外，還怕再鬧下去，別人說她“后娘待不得前妻女”，所以也就算了。

經過這樣一場糾紛，我們家才真正入了社。

全村合作化了。曾經与合作社“比一比”的曾繁玉，在这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主义激流中，怎么样呢？

順水推舟

徐繼英口述

曾繁玉在我們建立小社的時候，退出了互助組。以後，他憑自己肥料多、農具齊、勞力強，又仗恃自己有套老得挂拐棍的農業經驗，硬要和我們合作社比庄稼，結果比輸了。輸是輸了，但是他對合作社還是有抵觸的。

曾炳章那年鬧退社，就是受了他的吹哄。他和曾炳章是親弟兄。曾炳章入社後，收入增加了，單谷子就分了九千多斤，可是他對曾炳章說：“九千多斤谷子，哼，還當不到我三畝甘蔗的收入呢！”曾炳章就信了他的話，退了社。

曾炳章、吳青雲退社以後，曾繁玉心裡高興了，頭也昂起來了，走路腳步也跨得更大了。見了熟人就把對方肩膀一拍，兩個大拇指一翹，喊聲：“互助組萬歲！”喊“互助組萬歲”是嘴上的話，因為那陣他實際上是單干，照說就該喊“單干戶萬歲”才是實話，可是又說不出口。

他想看合作社的笑話，哪曉得並沒有看成，合作社不但沒有垮，反而更巩固、更扩大了。曹書記原先說的“吳青雲他們退社是‘代表’，二天回社也是‘代表’”，硬是說对了。这陣，不但他們兩戶回心轉意又入了社，而且全村一百六十多戶有一百五十多戶都入了社。曾繁玉呢？到这时候他还想跟合作社扳手劲，高矮不入。

那陣子村上还有几家人也沒有入社，这些人大半是些富裕中农。他們都是报了名，被社上审查掉，准备再考驗他們一下的。主要是因为他們有的人思想還沒有完全弄通；有的人屋头意見还不一致，甚至鬧得來要分家；……

这些沒有入社的富裕中农也知道，今后单干也不会随手。不說别的，找个帮工都找不到。所以，他們就彼此拉关系、套“竹根亲”。

有一天，曾繁玉、黄建章、任孝昆……好几个老汉，邀邀約約去赶場。在場上打了牙祭又坐茶館。

曾繁玉首先开了腔：“我們几个老庚，彼此該搭个手，……”

他这话正合其他那几个老汉的心意，所以他們馬上就扯开了。扯来扯去，就扯到組織一个“互助組”，要任孝昆的兒子任世明当这个組的組长，跟合作社唱个对台戏。他們还准备吸收富农参加。这事算是說定了，就要打鑼开张了。

这天，任孝昆醉醺醺地回到家里，进門就吼：“他們不要我們入社算了，我們組織个互助組，讓我們任世明当組长。”

他兒子任世明、女兒任慎容，听得不明不白，就追問他是咋个回事。他顛三倒四說了半天，才說清楚。兒子、女兒一商

量，这事不对头。本来他们家也是已经报了名要入社的，就因为老汉怕入社以后，找不到零用钱喝酒，横顺扯起，任世明本人当时也不大想参加，所以社里还在等他们全家都满意了才吸收入社。这时候出了这样的事，两兄妹觉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想嘛：这几户人住得东一坨、西一块，田也吊得远，象个八阵图似的，咋个互助？这还不说，这个“互助组”还要把富农拉进来，以后会搞成个啥样子，想也想得到。两兄妹商量了一阵，与其让老汉在外头乱闯，惹些麻烦，还不如迁就他一下，保证入社后有他的酒喝。商量好了，等老汉酒醒了以后，就找他谈判。

老汉是个老酒迷，一天要喝三道，少一道都不行。酒就是他的命，道爷骂娘、扯筋角力都是由酒引起的。做儿女的也知道他这个脾气：有酒好说话，无酒话难说；只要有酒，入社也好，不入也好，他都没意见。果然，条件讲好了，老汉欢天喜地，马上就催儿子快去向社上要求。

任世明到社里来，把事情原原本本谈清楚了。社里考虑了一阵，便批准他家入社了。

这时候，其他那些没有入社的中农也觉悟了，再三再四要求，也都先先后后入了社。

这个“互助组”没搞成。曾繁玉就沉不住气了。睁眼一看，田霸头的庄稼，尽是合作社的；自己那几块田夹在中间，就象一碗白饭里头渗了几颗稗籽一样，总有些碍眼。儿子、媳妇天天扭着他入社，闹得六畜不安。哪怕他再聪明、会盘算，也不能不考虑面前的处境了。那一晌，硬把曾繁玉心焦死了。听他屋头人说，他白天愁眉苦脸，不说一句话，夜晚唉声叹气，合

不上眼睛，桌子板凳碰他一下，也要冒火。

一天，他到禾登乡去赶场，路上遇到几个外村的农民，大概是到新民社来参观的，迎面笑嘻嘻地问他：“新民社在哪里？”

曾繁玉没有开腔，只是用手指了一下合作社的方向。

“你是社员吗？”

曾繁玉摇摇头。

“你没有入社？”那些人再没有问别的话，看看他，很奇怪地走了。

曾繁玉脸羞得通红，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他对合作社开始动心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叫老婆、媳妇来找罗世发。他二媳妇嘴巴很会说，一见面就“表叔，表叔”喊得很亲热（他们和罗世发本来是远房亲戚）。等到她提出入社的事，罗世发就问她：“你们爸爸咋不来呢？还是回去开个家庭会，再喊你爸爸来说吧。”

第二天曾繁玉在三岔路口碰见了老罗，说：“哎，我们那个事，你要帮忙哟！”

老罗还不相信他转变的这样快，故意问他：“哪个事？”

“哎，入社的事。”

老罗说：“村里头都是晓得的，你自己搞得挺好，何必入社呢？”

曾繁玉说：“大家都入了，我们还是要入嘛。”

“这个事社里要考虑，你自己也要再考虑考虑。”老罗没有直接答复他。

当天晚上，曾繁玉又领起全家人来找老罗。那时我们几

个干部正在开会。他没有进来，光叫媳妇来喊老罗。他媳妇走到门口，把罗世发叫了出来。

老罗到院坝里一看，嗨，全家登门啦！问他们来干啥，原来还是要求入社。老罗说：“要入社，耕牛、大农具都要折价归社哟。”

曾繁玉满口应承：“当然，当然。不单牛入社，我屋里草多得很，也一齐拿来。”

老罗说：“等社委会讨论一下再说吧。”

他说：“船载千斤，掌舵一人。这事就费你的心罗！”

老罗回来开会，他就坐在外头等着。会开完，我们出来了，他都还没有走。老罗问他：“你硬是想通啦？”

他说：“通了，通了。过去嘛，我是有些保守。”

老罗又进一步问：“你屋头啥都不缺，为啥一定要入社呢？”

他说：“咳，我们还是要跟共产党走嘛。”

就这样，他又许了很多愿，提了很多保证。社委会研究了一阵，终于批准了他入社。不过，他当时实在是为大势所迫，顺水推舟，人入社心没入社，以后一直还是在扯。说起来没完没了，还是不算了。

为了适应扩社后的新情况，社里采取了許多新的措施。推广新式农具便是当时的新措施之一。这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革命。

我当了新式农具手

曾玉清口述

1954年初，我們农业社扩大为一百六十八户的大社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对我來說，更是喜上加喜。因为，刚扩社不久，我就在乡上参加了党訓班的学习，5月間便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了；也在这个期間，我又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成了社里的第一个女农具手。这两件大事，是我終生也忘不了的。

在学习使用新式农具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和斗争，說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就談談这件事的經過吧。

扩社以后，社里为了要得到更全面的丰产，就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項就是农具革新。我們从县农具站請了两个同志来，在社里办了一个新式农具訓練班。当时报名的人象一窝蜂似的，可淨都是些年輕小伙子，一个女同志也沒有。我那陣是社里的妇女委員，又刚从党訓班学习回来，事事都要搶先

带头；心想：女同志就不能学用新式农具呀？我就非学一下不可！于是，我也报了名。党支部和社委会都很支持，就批准了我。第一批参加学习的有十八个人，其中只有两个女学员——我和黄建章的女儿黄汉秀。

消息刚传出去，一些有封建、保守思想的社员就叽叽喳喳地嘈开了。他们不光是认为自古以来就用惯了弯弯犁头，不相信新式农具；更反对的是女人学犁田。

黄建章老汉把胡子一抹，粗声粗气地说：“我活到胡子通根白了，没见过婆娘家学犁田的。真是狗咬耗子，找事做！”

他高矮不让他女儿来学。两个女学员就少了一个。

任孝昆老汉也把脑壳一摆，不以为然地说：“从古到今，只有男州，没有女县；怪事情，尼姑都要坐法台了！是她曾玉清把犁田学会了，我手板心煎鱼给她吃！”

我听了，只笑了笑，没有理他；心想：我就要叫你手板心煎鱼给我吃！

学习开始了，新式农具一样都还没有，老师只是画出图样来“纸上谈兵”。这当然就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幸好那时候大家劲头很大，都想给二天学开拖拉机打个底子，所以学习很专心，没有几天就把道理弄懂了。然后我们才到县里去取回了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

一天清早，天还没亮，我们就七手八脚割完了一块苕田，准备开始试验了。不晓是哪个传出去的，好多社员都看稀奇来了，田坎上站了一大排。我们是第一次实习，老师又不在场（他们回县里去了），心里本来就是活甩甩的；加上这么多人在旁边盯着，那几个胡子老汉又像是专门挑漏眼来的，这就弄得

我們更緊張了。八個人使兩條牛拉一架雙輪雙鐮犁，還笨手笨腳地弄不歸一。兩條牛又詭生，不聽使喚，碰到一起就打架，拉都拉不開。我們心里越緊張就越搞不好，越搞不好越緊張，摸着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亂做一團。惹得社員們也幫我們着急。那幾個胡子老漢却在一旁擠眉弄眼地捋鬚大笑。

一早晨過去了，一塊苞田還是一塊苞田，寸土未動。社員們失望地走了。胡子老漢們也翹起嘴巴，噉里咕嚕地走了。鍾三爸看見自己的牛打架，更不高興。氣呼呼地跑下田來，從我手里把牛索搶去，瞪了我一眼，就把牛牽起跑了；邊走邊抱怨：“你們的新式犁頭好，我沒得那麼多的牛來整！”

剩下幾個農具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話也不說，大家都感到很難堪。楞了半天，我才勸他們：“不怕，吃了午飯又試。不能這樣就算了。”大家點點頭分頭回去了。

中午，家家戶戶的房子上都冒起了煙子，我也顧不得煮飯，忙着去找牛。社里有一條得獎來的大牯牛，是曾炳章在喂。我找副社長史良成一說，老史就叫我去牽來。一條牛不行呀，哪里去再找一條呢？我只好又厚起臉皮去找鍾三爸。

去了以後，我好話說了幾籬筐，鍾三爸還是不肯答應。他只有一句話：“我這條牛有價錢，一百二十五元，賠得起你就牽。”

我說：“大家都是為了社上的事，又不是我私人用。”說着，我就到牛圈去把牛牽了出來。

鍾三爸一下子就把我擋住了，說：“你這是侵犯私人利益！”

我說：“用你的牛，社上算工分；打壞了，我負責賠。你還要咋個呢？”

他这才松了手，說：“好嘛，你答应賠就好办了。”

牛借到了，人也来齐了。我們又下了田。哪晓得，两条牛碰在一起还是要打架。我去拉时，一条牛把脑壳一摆，一角就把我打来躺下了。这可把几个小伙子吓坏了。黃光华赶忙跑攏把我拉了起来。鍾品三問我：“摔着哪里沒有？”

当时我也顧不得疼痛，說了声“不要紧”，又搶着牵牛去了。

这背时的牛硬是討厌，刚拉到一起，又打起架来了。你一角，我一角，攆过来，追过去，越打越凶，拉都拉不住了。忽然，社里那条大牯牛一下子冲过来，鍾三爸那条牛沒有躲得及，啊！遭了一角，打脫一块肉，鮮血直冒。大家赶忙拥上去，七手八脚把两条牛拉住。我一看，急出一身冷汗，慌忙間抓起一把泥巴糊在牛的伤口上，好不容易才把血止住。这一来，还試驗啥呢！我脚杆一軟，坐到田坎上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小伙子們也都沒有主意了。

牛一牵回去，那些反对搞新式农具的人有笑話看了，冷嘲热諷地說：“打牙祭，吃牛肉啦！……”

鍾三爸也不肯要牛了，把牛索甩給我，叫我把現錢摆起。社委会出来担保，說牛要是死了，社里一定負責賠。鍾三爸还是不收。最后，只好把牛拴在鍾品三家里，医了几回，撿了几副藥，完全医好了，才牵去还给鍾三爸。

出了这么一場祸事，我心里有些动搖了。任孝昆、侯么爸这些胡子老汉又說开了：“婆娘家要学会犁田，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万家村自古以来有好多妇女犁过田？”

我一想：当真話，是沒得妇女犁田呀！算了，还是把这个

包袱退了吧。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党支部(当时社里已成立了支部,支书是罗世发同志;乡上则成立了总支委员会,总支书是黄静仙同志)彙报了。同志们安慰我一陣,又严肃地批評我不应该有这种畏难情緒;新联社还没有妇女使牛,就是要立个旗帜起来。經同志们这么一說,我才又鼓起劲来。最后,大家研究决定給我們新农具手分配固定的牛。接着,又把县农具站的同志請了来,找出了双輪犁上打脚木太长的毛病。这一下我才有了信心。当晚我把打脚木一根改成了三根,直到半夜过才搞好。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去領錢,准备到街上去打鉄环。当时的副业委員黄汉民一听说我要拿錢,鼻子里哼了一声,說:“社上錢再多,也不能拿給你們去浪費呀!”

我气得連會計室的門都沒有进,掉头就走。自己拿錢把鉄环买了。

农具經過修整以后,好使了,牛也肯拉起走了。我們試了几次,技术也就慢慢操熟了。这时候正赶上春耕开始,社委会便决定讓我們分头下队去犁田。哪晓得第一次出馬就連碰了几个釘子。

我們头一天先跟三队說好,用新式农具帮他們犁田,双輪双鐮犁也抬到田里去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去一看,田已經遭水淹了(后来才查出是反革命分子楊全搞的)。这是一个釘子。

再到五队去时,当时的队长戴先智把田犁了个“十”字,意思說这田他們自己要犁,不欢迎我們。这又是一个釘子。

没办法,我們又轉到八队去。周克明老汉远远看見我們来了,赶忙迎了过来。我們只說他是来欢迎的,哪晓得他走过来就把脚一岔,手一摆,把我們挡住了。

一連碰了几个釘子，扑了几个空，真把人都要急死了。最后，还是光华跑回去說服了他父亲、九队队长黃志亮，我們才在九队犁了几十亩田。

党支部和社委会，見不少社員都还不相信新式农具，便研究决定：来一次新旧农具大竞赛。那时候，邻近的鄉县正好刚建立了一个拖拉机站。社里便找人去联系，請他們也派一部拖拉机来，一方面代耕，一方面参加竞赛，起个示范作用。

一切都安排好了。拖拉机也开来了。这一下，不光是社里鬧麻了，从郫县到新民社沿路的人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竞赛是在三角綫大田举行的。那天来參觀的人，硬是成千上万。一清早，拖拉机、双輪单铧犁、旧式犁头，就已經在田头摆起了。年輕小伙子、姑娘們围在拖拉机周围，个个都要搶着上去坐一下。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几个負責干部就站在双輪单铧犁面前，叮嚀我們不要心慌，要沉着应战。任孝昆、黃建章那些胡子老汉也在給耕旧犁的任世明加油。任世明是社里数一数二的老把式，又是任孝昆的兒子，老汉家对他是信得过的。任世明自己也是精神抖擞的，戴了頂凉草帽，牵了条又肥又壮的大牯牛，卷衣撈袖，磨拳擦掌。

太阳快三竿子高了，竞赛才开始。三种农具同时开动了。拖拉机自然是一馬当先；只看見車輪过后，泥巴直翻，就象波浪滾滾，把人眼睛都看花了。我們当时虽然有些紧张，但是牢牢記住了“要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地朝前犁。任世明呢？还没有走好远，就臉紅筋胀，大汗滾滾了。不說赶拖拉机，要想撵上我們双輪单铧犁都不可能。老汉們急得直是喊他加油。……

晌午，竞赛結束了。比快：旧犁头犁了9分田，双輪单鐮犁犁了2亩，拖拉机犁了13亩几。比深：旧犁是4寸，新犁7寸，拖拉机8寸。比質量：旧犁犁的渣渣瓦瓦，新犁犁的均均匀匀，拖拉机犁的平平整整。下午，社委会就把那些不相信新式农具的胡子老汉找来开了个座談会。他們沒有話說了。可有些人还没有服輸，要再看收成。于是，社委会又决定在这几块同土質的田里，栽同样的谷种，同样施肥，同样管理。結果，秋收一算賬：新犁犁的田每亩平均比旧犁犁的多收了五十二斤黄谷。这一下所有的社員都信服了。

秋收后，社里又自己开办了一个新式农具訓練班。我們几个都当了老师。一共培养了六十二名新式农具手，其中包括：“活到胡子通根白了，沒見過婆娘家学犁田”的黄建章的女兒黄汉秀；要“手板心煎魚”給我吃的任孝昆的女兒任慎容；……

从此以后，新式农具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妇女犁田的也多了。全社掀起了农具革新的高潮。

沒有好久，社里又培养了两名拖拉机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了新繁县建立了拖拉机站，經常来給我們代耕以后，学会开拖拉机的人就更多了。

我因为身体不好，后来社里就要我专搞妇女工作和生活福利工作去了。我自己虽然沒有当上拖拉机手，但是看到那些女拖拉机手开起拖拉机在田里跑时，心里还是高兴的。

(龔星蕙記錄)

在祖国的大家庭里，你处处都会感到有无数的亲人时刻在关怀着你。社里曾經有过这样一个动人的、难忘的故事，

亲人的关怀

任慎容口述

1954年扩社以后，社員們个个欢天喜地，生产劲头很大。全社的小春作物长得比往年更好，来参观的人比往年更多。最打眼的是那油菜田，一块连一块，老远就望见黄橙橙的一片。风一吹，那菜花的波浪就象用金线织成的锦缎一样，啊呀，才叫好看哟！

可是，十根指拇不一样长。说句公道话，那阵我们三队在全社来说硬是一根小指拇，样啥都落在别个后头。偏偏挨到我们的五队，又是一根大指拇。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字，只怕货比货。这两个队一比呀，差起多长一节。他们的油菜，花开得密，里一层，外一层，高一层，低一层。你要想数一下一棵菜籽开了好多花，数着数着，风一吹，啊哟，就数不清了。那秆秆象锄头把把似的，又粗又壮。叶子绿得发黑，长得密密麻麻的。那些田里呀，硬是丢团泥巴都丢不进去，雀雀鑽进去了也

飞不出来。我們的油菜呢，花稀秆瘦，叶子发黄，活象个痨病鬼！不說參觀的人看了要搖頭，我們自己也看不过去。

消息传得真快！“人民日报”馬上就登出了一篇通訊，題目是“一个社里两样庄稼”，表揚了我們社里其他的队，批評了三队。那时我是三队的副队长，管妇女工作。队长是我哥哥任世明。这篇文章着重地批評了我哥哥的落后思想。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問題主要就出在我哥哥身上。

說老实话，我哥哥那陣硬是人入了社，心还没有入社。他的思想我是清楚的。往年在互助組的时候，是各种各收，除了換工互助以外，有些事彼此可以各不照闲。他虽说当个互助組长，平时还能抽空出去碾米打油，挣些工錢。如今入了社就不同了。要鍋里有，碗里才有。大家都要為社、为集体。生产队长比互助組长就操心得多，想再到外面去找外水就不行了。他心里当然不舒服，搞起工作来总是懶心无腸的。以后又自己养了些茄子秧秧，干脆搞起私有来了。社里的事更加不願意管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他就象支公差一样，硬要和我輪流去，說：“要耽擱只耽擱一个。”开了会轉来，他也只三言两語向队员交代一下就算了。有一回，社里要派他到成都去学习，他一心只挂着他那茄子秧秧，任随你咋个动员，高矮不肯去。队上的生产、队员的思想，他也不大过問，很少向社上彙报，很少和大家研究。那时候队里开会，討論得最起劲的是評工分。有些人为了二分、半分，也要争得面紅耳赤的。天天晚上都要拖起多晏，还評不下来，有时候会接連闔上几晚上。他也不好好說服、解决，只简单地叫大家田間亮手艺，當場比高低。結果越比越不服气，活路越做越粗糙。我跟他談过不知好多次，

可他总是摆出一副长兄的面孔，把我看作小娃娃似的，根本不拿你当回事。社委会也常常批评他，叫他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光是鼓励队员抢工分。他把这些话也都当成了耳边风。有时候还在我面前发牢骚：“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就干脆把我这队长撤职好了，我倒巴心不得呢！”

这阵，“人民日报”登出这样一篇文章，罗社长把他找去，叫他看了，又叫他回来给队员们念一念，让大家讨论讨论。他才认识到问题严重，不解决是不行了。

那天上午，我和队员们正在田里做活路，他拿着那张报纸来了。还没有走拢田边，他就嚷了起来：“你们晓不晓得，我们三队出了名啦！”

我们一听，都停下活路，楞楞地望着他。

他走到田坎上，扬着报纸，招呼我们：“来，我念段新闻给你们听。”

大家都一窝蜂地围了过去。

有的问：“我们真的出了名啦？”

有的问：“报上是咋个说的？”

有的看到了报头，说：“哦，还是‘人民日报’登的文章呢！”

他苦笑了一下，说：“是呀，‘人民日报’登的。这一下我们是全国闻名啦！”

大家说：“那你就快念吧！”

“好吧。”他答应了一声，就开始念了起来。

大家都屏声静气地听他念。文章开头是表扬我们社里庄稼长得好，大家听了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等他一念到批评我们三队那一段的时候，大家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眉头上都象扭

上了一把鎖似的。念的人越念声音越沉重，听的人越听心里越难过。

文章念完了，大家都悶起脑壳不开腔。靜得来連根綉花針落在地上都听得到声音。过了好一会，才有人低低說了一句：“出了名，出了臭名！”

这一說，把大家都带动了，馬上就七嘴八舌地嘈开了。有些人对五队不服气，說：

“他們还不是有缺点！”

“比手艺、比条件，我們哪点不如他們？”

我看这种情緒不对头，馬上接着說：“不管怎么說，事实摆起在：我們的庄稼就是不如人家。条件再好又咋个呢？那更說明我們工作上、思想上有問題。”說到这里，我就拿眼睛盯着我哥哥，希望他能带头表示态度。

我哥哥也知道我的心意，他避开了我的眼光，低着头，沉痛地說：“是呀，会怪要先怪自己，不能光挑別个的漏眼。过去錯都錯在我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首先該我檢討……”接着他就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的思想根根挖了出来。

这一来，情緒扭轉了。我們大家也都先检查了自己，然后又展开了互相批評。这个会开得非常好，馬上大家的劲头都不同了。那天的活路比往常两天做的还要多、还要好。

正在我們检查了过去的缺点、制訂今后的工作計劃、准备給社委会写决心書的时候，我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們最可爱的人——三位志願軍战士从朝鮮前綫寄来的。信封上貼了一张印着和平鴿的邮票。虽然是万里迢迢、經過若干人的手送来的，但它还是那么洁淨平展，沒有一絲綉紋，沒有一

点污迹。看来，所有的經手人都是那么爱护、敬重这封信。信的大概內容是这样的：

……我們正在冰天雪地、炮火隆隆的朝鮮前綫，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战，狠狠地打击美帝国主义。为了朝鮮人民和祖国的安全，我們决不放过一个凶残的敌人。同志們，当我们身下鋪着雪，身上盖着雪，几个小时、几天几夜監視着敌人，打击着敌人时，我們知道在祖国的南方，这时候已是菜黄麦熟，万紫千紅的春天了。我們是多么怀念祖国、关心祖国呀！……

看到了人民日报上“一个社里两样庄稼”这篇通訊，我們很关心你們队里的生产，为你們現在的情况焦急。希望你们，象我們消灭敌人那样，消灭你們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象我們保卫祖国那样，保护、培育你們的庄稼。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能把生产搞好。

同志們，讓我們在不同的战綫上，互相勉励、互相竞赛吧！……

这封信立刻轟动了全队、全社。我們把这封信念了不知多少次。社員們都激动地說：“这是亲人对我们的关怀，我們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呀！”

这时候，全社所有的队都争先恐后地提出，要支援三队，突击落后的菜籽；我們三队的干部、队员則坚决不要别个帮忙，保証补救好全部菜籽，并且要学习五队，在各方面赶上和超过五队。我們給三个志願軍战士回了信，这封信也就是我們的决心書和保証書。

“支援国家建設！”“支援志願軍！”“用实际行动回答志願軍对我们的关怀！”成了我們全队响亮的战斗口号。

这时候，社里为了加强对各生产队的领导，又实行了生产队与定額管理，即“包工制”的办法（当时重庆“新华日报”

发表过一篇“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制’的情况与经验”的文章，介绍了这种先进的管理方法），帮助我们克服了生产上的混乱现象。

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制度改善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我们补救了以前的损失，使菜籽产量达到了全社的平均水平。紧接着，在大春生产开始时，我们就被评上了全社的模范生产队，夺得了优胜红旗。

队员们看了这面红旗，万分激动地说：“要是没有亲人的关怀、督促，我们哪会得到这面红旗呢！红旗是志愿军的，我们要爱护它，永远保持着它！”

我们写信向志愿军彙报了夺得红旗的经过，并且这样写道：

我们想，解放前，莫说庄稼好坏，就是我们农民的死活，又有哪个关心呢？同志们，是你们使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现在在党的领导下，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隔几千里几万里，都有数不清的人在关心我们。哪怕是我們多收了一颗粮食，你们也会感到高兴，哪怕是我們有一点点小错，你们也会感到心痛。同志们，你说我们怎么会不努力生产呢？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家庭呀！我们感到幸福，感到骄傲！……

扩社以后，社員的物質文化生活也在逐步改善。社里先后修建了大礼堂、球場，建立了夜校、圖書館、衛生室，……还創办了第一个幼兒園。

凡事起头难。别看办一个小小的幼兒園，当时却也遇到不少困难呢！

第一个幼兒園

任淑仪口述

要說，我們这个幼兒園，也沒啥談的。現在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都办起了幼兒園，单是我們这个公社就先后办起了三百〇三个托兒所、幼兒園、哺乳站，大家已經积累了很多經驗，并且都逐步走上正規化了。我們那陣的幼兒園，怎能比呢？不过，我們当时办的时候，条件差、沒經驗，有些人还对它有过怀疑，硬是困难重重的。当成历史資料記下来，給孩子們将来看看，还是怪有意思的。我就談一談吧。

1964年，我們社扩大了以后，照說人多了，活路就要輕松了。哪晓得恰恰相反。生产一加劲，各項事业一兴办，活路反而更紧张，劳动力反而感到不够用了。那么，事情不可以少办

一些，生产不可以稍稍马虎一些吗？不行。社员们不答应。他们说，合作社的生产就是该比互助组搞得好一些，大社样样事情就是该比小社办得象样一些。但是，劳动力不够用又咋个办呢？男社员说，我们一个人可以顶两个用；女社员说，我们可以出来多做些活路。这一来，问题就发生了。那些拖儿带女的妈妈们，不甘心成天在屋头守娃娃，经常和家里人扯筋，闹着要出来做活路。干部们出面调解，也不大说得服这些妈妈们，她们反而扭着你给她想办法；何况有些干部本身就还没有解决这个家庭纠纷呢！最后，社委会决定：办个幼儿园，由当时的妇女委员曾玉清负责筹备。

曾玉清也不知道看中我哪一点了，要我来搞具体工作。那时，我是社上的接生员。接生员这工作起先我也不喜欢，后来干了一阵，就觉得满好了。可是，搞幼儿园，我硬从心眼里不喜欢。我对曾玉清说：“你看我这个德性，能干这个工作呀？”

她说：“就要你这个德性呢。”

“不行。我是粗手笨脚的，娃儿们细皮嫩肉，合不来，合不来。”

“你粗手笨脚，接生就合得来吗？”

嗨，她真厉害，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话柄！我急了，又找了个理由：“那些娃儿鼻涕眼泪多脏的！”

你猜她怎么说：“你接生，就不怕脏？”

我还有啥话说呢，只好服从组织分配。

“任淑仪当幼儿园的嬢嬢（保育员）。”这话一传出去，问题就来啦。

这个说：“对！社上还嫌娃儿们不会闹，找个头儿领起

来。”

那个說：“我自己生的还管不了呢，她能管呀？”

事情总是这样的：办一个新事情，总要有些人反对，尽管这个事情是为了她們办的。当时，曾玉清就給我打气撑腰：“管她們的呢，你干你的，干出来給她們看看。”有人打气撑腰还怕啥，干吧！

幼兒園的房子找好了，又寬敞，又亮燥，地点也很适中。我們把它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社里还从公益金里拨給我們一些經費。

可是，又出了怪問題了：“三个孃孃，守着空房，乐得清闲，悶得发慌。”媽媽們不把娃兒們送进幼兒園，我們干个屁呀！

找来曾玉清，又搬来罗世发，大家开了个会，分头去动员，才弄来几个孩子。最初送来的只是干部的娃兒，后来才慢慢多起来。記得开头那陣，大大小小只有二十七个，幼兒園就开了张。

刚干这个工作，沒有一点經驗。那些野跑慣了的娃兒們硬是不听你的話。你叫他們往东，他們偏走西；你喊他們打狗，他們就給你罵雞；你要貫徹集体，他們就来个自由散漫。好話也說了，反話也講过。有时你見他們很老实呀，規規矩矩听你說話，翻着小眼，点着脑壳，等你一轉身，他們就惹了祸。过去惹祸找父母，这陣惹祸找孃孃。沒办法，給人家陪礼道歉。倒好象娃娃是我們生的。有一回，实在把我气极了，“关起来！”这法子真灵驗，把一个娃兒关起来，其余的都老实了，縮脚縮手地，大气也不敢出啦。这天我們可真清闲。哪晓得我洋洋得意的勁兒還沒过，孩子們就給你来个“罢課运动”；第二

天有一大半娃兒們不來了。這是啥道理，我還找不出毛病呢！我們幾個保育員一商量，就召開了個媽媽代表會。

她們一來就說：“你們是咋搞的，哪興把娃娃關起來？娃娃們說怕你們關，不來啦！”

原來我犯了簡單粗暴的“軍閥主義”了，怪不得娃兒們不敢來了呢！沒辦法，給媽媽們賠不是，作保證，要求媽媽們動員娃娃們來幼兒園。

孩子們來了，對我一點也不親切了。我在他們群里，就象一只大貓守着几只小耗子一樣，孩子一見我就縮成一團。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麼興趣再搞這個工作？我找羅社長鬧情緒去了。

羅社長一見我氣鼓鼓的樣子，就曉得我是來干啥的了，也不等我開口，就說：“任淑儀，你原先是個接生員，光管接下來，不管教養可不行。這個責任別個能推，你推不脫。”嘿，他真機靈，一句話就封了門；順手又拿了本書給我，說：“我把我的老師介紹給你，想不通就問問它吧。”

我說：“我不看，我要跟你談問題。”

他說：“等你看完了再談吧。”

那是一本啥書呢？就是我以後一直學習的，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我拿了這本書，當時可沒心思看它，因為太累，沒時間。作農業的人，還有個午睡，我們的午睡是給娃娃們搦蚊子。

過了幾天，我才在晚上翻了翻。一翻就丟不下手，一口氣就看完了。第二天羅社長正好來了，一來就說：“我們談談吧。”

我說：“我正要找你呢。”

他說：“你不忙說。我告訴你，社委會研究了，覺得你們要提高一下業務；街上完小幼稚班鄒老師有些經驗，你們可以抽空去找她教教。”

嘿，他對我說的話，正是我要找他談的問題。當時我思想是通了，就是業務還不通。這一下有了門路，可高興死了。

鄒老師人滿好，講話也滿中聽。我很喜歡她。她對我們講了很多對待兒童的辦法，最要緊的是要耐心細心，懂得孩子的心。聽起倒簡單，作起來硬麻煩。我想：孩子有啥心嚀，貪玩好耍。嘿，名堂就在這兒呢——鄒老師送了我一本愛集體的小白兔的書，我拿回去給孩子們講了，第二天他們就照着玩了起來。我看他們玩這個又有意思，又不撕包谷、扯豆角了，就又給他們編了幾個類似的故事，而且還和他們一起玩耍。譬如那個“拔大蘿卜”的故事，我就當大蘿卜讓他們拔。嘿，真有意思！那些小鬼鼓起小眼，卷起小袖，一個接一個，硬把我給拔起來啦。那陣我才真是個孩子頭呢！

娃娃們受了集體教育，樣子都變了。外面來看的，哪個不誇說幾句呀。夸娃兒，我們心頭就寬慰了。再想到起初娃兒惹禍，人家怪我們時，也不覺得委屈了。孩子們給我們也增了光；來參觀的人給娃娃們照象，總把我們拉到一起。那陣日子才熱鬧呢！今天縣婦聯送給我們幼兒園椅子，明天省婦聯送給我們玩具。後來，她們還把我們這個幼兒園當典型推廣，經常組織友鄰附近的社，到我們幼兒園來參觀，交流經驗；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後來，“人民畫報”和許多報紙都介紹了我們這個幼兒園，登了不少照片和文章。大家看着我們幼兒園办好

了，誰還肯把娃兒放在屋頭呢？不管够不够条件，都給你塞进来。

我跟几个起初說二話的妇女开玩笑說：“这怎么成呢，我还是个孩子头呢。”

她們滿認真地說：“哎呀，淑仪妹妹呀，你快別說这些吧。要是我們早把娃兒交給你，娃兒早就有出息啦！我們也少受了罪，多掙了工分。”

这么一来，我們的幼兒園可又成了个托兒所，大点的也管，小点的也帶。虽說我們累一些，可是从社里來說，幼兒園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別說不上，对于解放多子女媽媽的劳动力來說，是起了直接作用的。过去媽媽們常为孩子吵架鬧意見，有的甚至抱成見不說話。自从成立了幼兒園，孩子們在一块成了好朋友，媽媽們的陈年意見，也云消霧散了。

幼兒園不光是孩子們的天地，也是媽媽們常來的地方。她們給我們幼兒園想了不少办法，作了不少工作，真正的作到了家庭和幼兒園配合着教育孩子們。

別看我們小幼兒園里的小娃娃，可見過不少大世面呢！这群小家伙，先后接見過日本代表团、波兰代表团、苏联代表团……特别是苏联代表团来那回，才有趣呢！

有天，听說苏联同志要參觀我們新民社。娃兒們都知道了。他們喊着：“嬢嬢，苏叔叔来不来我們这里？我們要苏叔叔。”他們合群搭伙地纏着你要苏叔叔。我想，人家是来看社里的庄稼，哪有时间到幼兒園来，就劝他們不要鬧。

誰知，那天罗社长和曾玉清等几个社干部陪着苏联同志来了。真急人，弄得我們措手不及，硬不知道咋个办了。嘿！

就在这时，小家伙們一窝蜂似的跑去了。噼噼啪啪鼓着小巴掌，唧唧喳喳叫着苏叔叔。拉的拉，扯的扯，把那个苏叔叔围起来了。这个搬椅子，那个拿茶杯，直喊苏叔叔坐，苏叔叔喝。說来真好笑：苏叔叔块头那么大，他們給搬了个小椅子，难怪苏叔叔光笑着摇头呢。这下我們倒乐个清闲，由着他們去招待吧。他們拉着苏叔叔看这样、看那样。来时迎接、去时欢送；有的还拉着不放，要把大苏叔叔，留在小幼兒園里呢。

过后我們就想：这是誰教給他們的？为啥对苏叔叔这样亲切呢？可見得苏联同志對我們的友誼，就連几岁娃娃都曉得。

苏联同志給孩子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后，这事就成了他們游戏的題材。他們把围裙布折起来，挂在脖子上，当照相机；学着苏叔叔的样子走进幼兒園。哪个要是装得不象，就受大伙的批評，弄不好还要他檢討。要当苏叔叔，随便的娃兒还当不上。他們真有“心”呢！

和孩子一起，要多活几年，这话真不假。从54年到55年，我觉得日子过得真愉快。別看我人长大了，心可变小啦。不和他們在一起就觉得无伴，心里悶得慌。拿57年說吧，我跑到西艾去結婚，住了一年，生活再好，心头还是想着他們，結果还是跑回我們这幼兒園里来了。

罗世发同志自从解放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博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而且他带头组织的互助组、合作社，一直是互助合作运动中一面先进的旗帜，在全省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这不仅是他的光荣、社里的光荣，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上北京

刘玉芳口述

1954年9月，罗世发上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我们新民主社最大的喜事、最大的光荣。

罗世发咋个会当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呢？这事要从村里的普选说起。

1953年夏天，普选工作在新民村展开了。干部们把普选的意义和办法一讲，大家就把老罗看中了。这个说：“我选罗社长。”那个说：“我选罗主席。”带些岁数的老辈子们，也怕人听不见似地敞开喉咙直嚷：“我选罗老么，罗老么是对的！”平班等辈的青年人更不消说了，个个都争着要选“驷子哥”。尽

管干部們一再給大家打招呼：“这是选自己心爱的人，各拿各的主意呵！”“別看見人家举手，你也跟着挠起来！”可是社員們都說：“曉得，曉得。哪个心中沒个打米碗嗎咋个？”选举那天，齐齐嶄嶄地都投了罗世发的票，把他选成了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本来嘛，象罗世发这样好的人，大家不选他还选誰呢？从解放算起，在斗争地主上，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关心群众生活上，在劳动生产上，人家老罗硬是門門都起了带头作用的。单拿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來說，他那股坚决的劲儿別人就难比；任憑风吹雨打，他硬是閃也沒閃一下。象办社初期，少数富裕农民煽起来的退社风波，鬧得好凶呵，可是他活象鉄打的一样，毫不动摇地团結着大多数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巩固了十几戶人的小社，而且还把它扩大成为一百七十多戶人的大社，更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紅旗。至于平常他那种爱社的精神，也是只要长得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見的。从建社第一天起，他总是起早睡晚，任劳任怨。象鋤猪草这些工分大的活路，从来沒有他的份；哪門活路工分小，他就在那門頂起干。五黄六月，太阳晒得人气都喘不过来，他每天挑起粪桶，領着社員，一挑一挑地从县里往回担粪水。前前后后担了四五个月，一直把社里大小茅坑都装得满满的，才放下扁担来。这还不算，那时候，合作社才办起来，他和許多贫苦农民一样，生活上还很困难。二三月間，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家里时常揭不开鍋，每天摘把茗菜回去，一家老小，缺盐少味的煮来吃了，又用来頂住干。碰上晌午間，实在餓的不行了，就扑在河边捧上两口水来喝，从来沒有向哪个叫声苦。有时，挨邻

处近的社員們发现了，主动借給他一升半升的，一轉身他又把它轉送給貧苦戶去了。他对自己这样的刻苦，而对待其他貧苦戶却比什么亲人都好。秧子栽不下去的，他带起人帮栽；沒猪的，他帮着貸猪款；沒肥料的，他帮着借肥料；吃不起飯的，他帮着借口粮。他一天到晚除了搞生产，总是东一趟西一趟为貧苦戶奔忙。有一回，吳青云的兄弟吳发潤害病，一連睡了几个月，是药都吃过了，是医生都請到了，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听说后，借了些錢給他，又亲自抬他进城去看病，把病治好了。事后，吳发潤感动的逢人就說：“不是老罗，我早就沒得命了！”还有周二娘也是，七十多岁了，又是孤人。老罗硬是見一次說一次地囑咐他們互助組的人好好照顧她。有一回她的房子倒了，老罗活路一丢，馬上去給她把房子修好不說，还把吃的烧的也給她备办好，又找自己的母亲經常去給她梳头发和洗衣服。俗話說：“好得来連褲兒衣裳都舍得脫給別人穿。”老罗对待貧苦戶就是这样。就在这年冬天，有一次七十来岁的孤寡老汉馮恩云向曾玉清說：“二嫂子，眼看数九天就要到了，我棉褲沒得一条，滾身子沒得一件，这个冬天，我怕过不出来了。”曾玉清把馮恩云的話告訴老罗以后，他連囁吞也沒有打一个，馬上把自己身上的棉褲脫下来，給馮恩云送去了。这样的事，在新民社你隨便找着哪个貧苦农民，他都說得出一两桩来。你想想看，这样好的人，大家不选他还选誰呢？所以，乡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代表們也一致选他当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随后县上又把他选成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間，一个惊人的喜訊从成都传到新民社来了：罗世发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家一听，好高兴啊！有

的說：“罗世发不枉自为大家辛苦一場。”有的說：“这一下我們新民主主义硬是不简单了！”而更多的人一見面头一句話总是：

“罗世发都当了全国人民代表，你看我們农民翻身翻得有多大！”

“我們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硬是整对了！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选出来了，真是光荣呵！”

老貧农馬五爸一听到这消息，立即惊喜得张着嘴巴一本正經地說：“呵，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到底不同，农民也当上全国人民代表了。啥时候选的，早晓得我也赶到成都去投他一票。”引得大家都高兴地打起哈哈来。

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期越来越近，社員們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了。因为他們听说这一次要选举国家领导人員，还要制定宪法呢！所以尽管社干部专门开了两夜的会，写了一封长信請罗世发轉交給毛主席，代表大家給他老人家問好，向他老人家保証要把社办得更好，要把生产搞得更好，可是社員們还是成天把罗世发釘倒。不管田头屋头，只要一見面，就再三叮嚀他，这回去一定要替他們投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領袖的票。临行的前几天，更是差点把罗世发家的門坎都踢断了。老貧农馮恩云拄了根棒棒，一进门就拉着罗世发的两手說：“你要走了，千万記住帮我問毛主席好。你給他老人家說，我很好，沒有党、沒有他老人家，我早就活不出来了。”馮恩云还没有轉身，老婆婆們又来了。吳二娘盯咕眼兒地看了罗世发半天，激动得眼泪花花地說：“你一定要給毛主席說句話啊！你就說……就說我們真正翻身了！”刘良汉、刘良春、黄汉秀、任慎容、任淑仪这些年輕人，更是一收工就往老

罗屋头跑。他們的話更多了，有的保証要多喂几条大肥猪；有的保証要把托兒所办的更好；有的囑咐老罗“一定要和毛主席握个手！”有的要求他“別忘了带张毛主席的象片回来！”每天都要吵齐半夜。一直到老罗走的那天早上，他們把他送到大路边，还又一次高声地囑咐道：

“記住給毛主席問好呵！”

“記住向他老人家說，我們一定把生产搞得更好！把合作社办得更好！”

就这样，罗世发前脚才走，社里立刻就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人們忘記了疲勞，也忘記了什么叫白天黑夜，大家都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搞好生产，报答毛主席！”因此，除了出色地作好田头的活路外，还接連打了二十多个夜战，开出了几十亩荒地。社員們口里不說，心里都在想：“讓罗世发回来看，我們請他帶給毛主席的保証，硬是一点也沒有放空炮！”

那一陣，大家特別喜欢讀报，每天都在注意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會的报导。

10月初的一个下午，大家正在田里做活路，忽然看見公路上开来了一輛小汽車。不知誰叫了一声：“罗社长回来了！”人們丟下活路，立即向公路边涌来。不到一袋烟工夫，全社男女老幼早已把罗世发团团圍住了。大家第一句話就爭着問他：

“你看見毛主席沒有？”

“毛主席身体好不好？”

“你給我們投了毛主席的票沒有？”

其实这些他們早从报纸上看到了，但还是要問。罗世发

忙也忙不贏地回答：“見着了！見着了！”不曉得哪一個已經猜出他和毛主席握過手，立刻跑過去緊緊地抓住他的手。這一下把大家提醒了，都爭着來和羅世發握手。你拉過來，我拉過去，弄得羅世發兩隻手都搞不贏了。為了握一下曾經和毛主席握過的手，許多人擠出一身大汗還一股勁地朝羅世發身邊擠。任淑儀來遲了一步，見別人把羅世發團團圍住，擠也擠不進去，心裡一急，從別人頭上便把手伸了過去，一下子把五十多歲的馮三娘也掀倒了。馮三娘雖然口里罵着：“死女子，你慌些啥子！”但是，她自己連灰也忘了拍，一骨碌爬起來又忙着和羅世發握手去了。

人越圍越多了，個個都要拉着羅世發提問題。羅世發應付不過來，揩了揩臉上的汗水，大聲地說：“我明天詳細地給大家傳達好不好？”

“不行，馬上就傳達！”人們都高聲地要求着，接着就朝大禮堂涌去。能裝千人的大禮堂，很快便擠得連縫縫也沒有了。窗子上、階沿上碼滿了人不算，外面還圍了好幾層。

羅世發開始傳達了：

“9月15日下午三點鐘，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開幕了。就在這天下午，我見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見到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負責同志！”

羅世發剛剛說完這句話，會場里的巴掌早已象暴風雨般地響起來了。

“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羅世發在掌聲中又激動地說了一句，於是整個會場更加沸騰起來了，掌聲一陣緊似一陣。羅世發又說：“我代表大家投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票，選舉他

們為我們國家的主席和副主席！……”這時候，“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象驚濤駭浪似地響遍了整個會場。青年人再也坐不住了，他們不斷地朝羅世發面前擠，深怕聽漏了一個字。老年人也興奮得“嘖嘖”“嗚嗚”地贊嘆着。

傳達繼續下去，掌聲和歡呼聲也一陣緊似一陣。老貧農黃子亮把羅世發望了又望，突然回過頭來向身旁的人說：“你看怪不怪，我聽着他傳達，就象自己也到了北京，見了毛主席，並且和他老人家握了手一樣。”

“咋不是呢！”在一旁的向大娘接着說。“我們親眼看着羅世發長大的嘛！他和我們是一樣的莊稼人。我硬是從來沒想到他會見着毛主席。真的，我們農民硬是當家作主了。”她越說越激動，滾出眼淚來了。

羅世發傳達了一兩個鐘頭，越講越起勁，聽的人也越聽越興奮。傳達剛剛結束，許多年輕人一個二個已經把搞好生產的計劃訂出來了。馮全更是起勁，一鵝子跑來拉着羅世發說：“我們都商量過了，保證把生產搞得更好，給你撐起，你明年再上北京去給毛主席報喜！”

從這時起，新民主社整整熱鬧了幾個月。每天都有附近各縣的農民成群結隊來“看代表”，打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詳細情況，問候毛主席好。不過，那時候羅世發又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到維也納去了，回來以前還在蘇聯參觀了一陣。也就是從這時起，又一個規模空前、熱火朝天的生產高潮在新民主社展開了。

（式 琮記錄）

生产不断在发展,生活不断在提高。但是,社員們并未因此滿足。他們繼續不断地沿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向前迈进。他們搬开了土地私有制这块絆脚石,扩建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搬开絆脚石

刘元光口述

1954年春天,邻近的郵县拖拉机站派拖拉机到社里来参加新旧农具竞赛,并进行代耕。头几天,这个好消息就传遍了全社,惊动了附近的乡村。社員們祖祖輩輩都沒見過用机器耕田,現在机器要来了,哪个又不欢迎呢?

拖拉机要来的头一天下午,社长罗世发和几个社干,到各队去轉田坎,查看拖拉机耕田的路綫。

田里的菜籽、麦子还没收割。明天拖拉机来,是耕苕子田。为了欢迎拖拉机来,社員們兴高采烈地,只一天功夫就把七十多亩苕子全部收割干净了。老罗和大家看了一处又一处,不时用手指点:“拖拉机从这边开进来,那边地头上倒拐,再到前边那块田里去。”

几个人轉到馬路上，远远看見第五生产队队长戴先智在吆牛耕田。走攏戴先智旁边，大家又看了两块田：靠馬路边上这块有一亩多，紧靠这块田的东南角上，是一块五亩多的大田。拖拉机下了馬路，就从这块小田开进去。

大家向戴先智說：“戴先智，給隊員們說一声，这两块田要使拖拉机耕，免得他們費劲啦。”

“晓得。”戴先智爱理不理地回答了一声，脸上一絲笑容都沒有。看样子他很不高兴。

老罗以为他吆牛吆喝累了，想讓他歇歇气，就喊他：“走，一路去看看明天拖拉机来了耕哪些田。”

戴先智“嗯”了一声，丢下犁头跟大家一块兒走了。可是，走不多远，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又轉身回去犁田去了。

这一下，連平常最会摸社員心事的罗社长也弄不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戴先智是个富裕中农，他和另外两家伙喂了一头牛，由三家輪流使喚、掙工分。牛耕一天，掙的工錢要頂一个人做三天活路。戴先智老早就在盼望牛輪过来，好多掙点工分。哪晓得，刚好拖拉机要来，牛也正輪到戴家。牛耕的田要用拖拉机来耕，使牛人的工分就掙不成了。

老罗他們来轉田坎的时候，戴先智正在田里发悶。听到老罗喊他，他也想跟他們一路到处轉轉，散散心。可是，心里老是丢不下他那头牛的事。所以，他才走几步，就又轉身回去了。

天还没黑，一块田已經耕完了。戴先智懶心无腸地，也不想再搞了。他收拾了一下，便准备回家。刚一抬头，又看見了

那两块要用拖拉机耕的田。他想：“要是拖拉机晚几天来，这两块田就该我的牛来耕啦。挣的工分呀，比我一个人做十天活路还多！……”

他牵着牛往家里走。那两块田的影子老是在他眼前乱晃。忽然，他心里一动：“要是把那块小田淹上水，拖拉机开不进稀泥巴田，不是就耕不成啦！对，就这么干！”可是，他马上又想到：“事情如果大家知道了，社员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可使不得。”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走棚屋以后，他想想实在舍不得这笔钱财，就叫他小妹妹去放水把田淹了。他当时就没有想想：你的牛犁不成这两块田，可以跟社上说清楚，找其他的活路干嘛，咋能这样歹心恶意乱搞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财迷心窍，就只会朝一边想，啥子坏事也干得出来。戴先智就是这样的。他当时还给自己找了个遁词呢：“万一被别人知道了，就说是小娃娃不懂事，搞了耍的。”

尽管想好了退步，终究是做贼心虚，这晚上，他提心吊胆地一直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他起床后，也不敢出门见人，呆呆地坐在屋里发楞。忽然，他弟弟戴先贵怒气冲冲地从外面跑回来了。他一看，知道事情发作了。

果然，戴先贵一面责备他，一面把外边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这时，全社所有的生产队都在开会讨论这件放水淹田的事。大家非常愤怒，严厉地批评戴先智的错误。

有人说：“人民政府用拖拉机来帮我们代耕。戴先智水淹拖拉机，是存心整我们！”

有人說：“他还配当队长？連社員的条件都不够！該开除他，赶出社去！”

戴先智一听，臉都吓白了。他知道众怒难犯，連忙冲出門去，跑到那块淹了水的田里，把水全部放走；又找来几块木板在田里鋪好。

事情过了，人們摆龙門陣时总要問：为啥会有这种事？假如耕牛归社里公有，哪里会“水淹拖拉机？”生产資料私有制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在这件事上明显的表現出来了。

紧接着，又发现了另一个問題，还是由拖拉机代耕引起的。

那时全社一千多亩田，大都象豆腐干似地小块块，拖拉机根本就下不去。要扩大机耕田，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掉很多小田坎，把小田連成大田。尽管社員們佩服拖拉机，但一說起去田坎，就打縮脚錘了。有的就問：“不去田坎行不行？”好多人嘴里不說，却你望我、我望你，心里头在挽疙瘩。还有这样的事：社里头天把曾繁玉的田坎去了，第二天田坎又被人砌起来了。誰砌的呢？不問也知道。

当时，經過一再說服，加上不少干部、社員带头，虽然还是陸續去掉了一些田坎，但問題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很多社員看到这类性質的事件以后，都渐渐省悟到土地私有制成了絆脚石了，要想法搬开才行。

1955年秋，中共中央办公厅編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一重要文献，毛主席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它有力地吧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了更大的高潮。全国农村里都出現了新的局面：沒入社的往社里奔；入了社的要办集体农庄

(那时候大家想到的就是集体农庄)。我們社里也鬧开了。大家都說：“我們要办集体农庄，爭取当庄員！”特别是貧苦农民最积极，他們主张“越快越好”！

11月間，老罗到成都参加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談会，就提出要办集体农庄。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問他，社員們是不是有这个要求？老罗詳詳細細地彙报了社里的情况。李井泉同志向他說，只要群众要求办，就可以办。名称統一叫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老罗和同时参加这个座談会的乡支部書記黃靜仙同志，都高兴得了不得。回到社里，馬上就召开社員大会。

記得那天晚上，老罗刚一宣布：“已經批准了，我們馬上就办高級社！”大礼堂里就象放鞭炮似地，噼噼啪啪嘈开了。有拍巴掌的，有喊“毛主席万岁”的，有笑的，有跳的，……大家都搶先发言，爭着表示态度。

散会以后，社員們还不肯回去。大家围成一堆一堆的，商量咋个把生产搞好，爭取“当高級社員”。你說要把菜籽栽好，他說要把麦子点好；还有人說該把地翻深些。真熱鬧！

从这天起，天不亮，社員們就忙着整地下种，互相督促，都說要把生产搞好，才好当高級社員。天一黑，大礼堂里就挤滿了学文化的社員。他們說：“沒文化，咋能当高級社員！”

社員們劲头虽然很大，但办高級社毕竟是新事情。学习一开头，各式各样的問題都提出来了：

“土地归公，我們在沟边、河边的树子和竹林咋办？”

“还有沒有自留地？”

“外村沒有办高級社，姑娘嫁出去沒土地帶，人家答不答应？”

“土地归公，租佃关系怎样解决？”

“土地归公，我們这些老汉死了埋在哪里？”

.....

問題虽說又多又复杂，可是，經過干部們把具体政策交代清楚，把道理講明白以后，大家象吃了“定心湯元”一样，很快也就想通了。这是因为，几年来的事实証明，共产党从来是說一不二，从来是領導农民往幸福道路上走的。

当然，道理想通了是一回事，感情上对土地私有制的留恋又是一回事。那些土地多的富裕农民心事还是很重的。富裕中农黄三合当时的表現，正表达了好些富裕农民的心情。他听說土地要归公，取消土地分紅，悶了一两天都不开腔。一天几次踱地里去看望自己的田地，站在田边自言自語：“几輩人种的地，硬是舍不得！”

针对这种情况，干部們又分头串門，帮那些顧虑比較大的社員解疙瘩。

一天，生产队长吳青云走到富裕中农黄三合家里。黄三合这时已經躺在床上生病了。老吳向他說：“要办高級社了，你有啥意見呀？”

黄三合悶了一陣，問：“为啥要取消土地分紅？以后是不是要全靠劳动吃飯？沒劳动又怎么办？”他是在顧虑家里劳力少，自己又老了。

老吳向他作了詳細解釋，又講清楚照顧办法：“你去年不是喂牛喂得很好嗎？以后你就專門喂牛，一样掙劳动工分。”

黄三合点点头，又問：“高級社好是好，不曉得分得够不？”

老吳說：“周二娘、吳二娘这些孤老太婆，社上年年都在照

願，你是曉得的。農業社里哪會讓人挨餓？聽共產黨的話是
不會錯的。我那年栽了個跟斗，就是因為沒有聽黨的話啊！入
高級社吧，包你沒有錯的。”

黃三合想了一下，這才斬釘截鐵地說：“我黃三合不是懶
人，只要我積極勞動，和大家一樣能過富裕生活。”

那一陣，不只是新農社為轉社鬧得熱氣騰騰，外鄉外村都
鬧遍了。特別是準備和新農社合併的鄰近的幾個村，更是歡
天喜地。不過，當時也有些富社的幹部不願意和窮社合併，後
來一看到家底子比他們更厚的新農社都沒有說什麼，而且願
意把積存的几倉谷子和公共積累全部移交給新社，他們也就
沒有話說了。

緊接着，召開了報名入社大會。報名入社的，除了原來的
新農社，還有周圍四個村子辦了一年多的六個初級社和几十
戶單干農民，一共是七百三十一戶。這時全鄉也已合作化了，
並成立了以新農社為中心的社長聯席會（又叫“聯社”）。

1956年元旦，在新農社的大壩子里，召開了新農高級農
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大會。

自從報名以後，人們都望着這一天。社員們忙着布置會
場，趕制新衣，邀請親戚朋友到時候來參觀。幹部們更忙，忙
着訂高級社的生產規劃，忙着并社的交接準備工作……

成立大會的主席台布置得莊嚴大方，會場四周几十杆彩
旗迎風飄揚，會場旁邊，搭了又寬又大的席棚，里面有圖片展
覽，可以看出新農社從建社以來走過的道路。一塊平地上，擺
設着新農高級農業社幾年後的一幅美麗圖景：高大的禮堂、社
員的樓房宿舍、發電站、拖拉機站、畜牧場、俱樂部、公園，一

块块整齐的大田里跑着拖拉机，社員們輕鬆愉快地劳动着……

元旦这天，天还没亮，人們已經吃完早飯，姑娘們照着灯梳装打扮完毕，男女老少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队伍排得整整齐齐的，敲起鑼鼓，打着紅旗走进会场。男女社員，机关、学校来宾和附近各县的农民代表，还有很多自动来参观的农民和社員的亲友，足足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省里、县里的领导同志也来了。好多走不动路的老大爷、老大娘，也坐着鷄公車来了。会场上站不下，就站在会场外。周围几里的大路小路上，人群象纒牵的一样，还在往会场涌。展覽館里挤得水泄不通。会场四周摆满了各种卖东西的小摊子，硬是比赶会还關热。

上午十一点鐘，大会开始了。禾登乡党总支書記黃靜仙講了社的建立經過。接着是社长罗世发报告社的七年远景规划。他說：“我們馬上就要开始建立发电站。国家要在我們这里建拖拉机站。不久的将来，高大的樓房、医院、学校也要在这里出現。我們全社的社員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劳动創造幸福的生活。……”台下的社員們听得嘴都合不攏了。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講了話。他祝賀新民高級社成立，鼓勵社員們努力实现远景规划。接着，省川剧团和省歌舞团特来給社員們演出。川剧著名演員陈書舫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新民的社員們，从这天以后，向着美好的生活又跨进了一步！

(江 河記录)

为了更有计划地全面发展生产,创造更幸福的生活,社里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2年的全面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过,占了很大的篇幅);在转为高级社以后,就立即实施了。

水电站是当时最先搞起来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建设工程。

大放光明

蔡德福口述

1955年底,我们这里许许多多、社干部成天到晚地忙。白天忙着筹备转社,到处奔走,黑夜忙着规划远景,苦想通宵。那时候工作虽多,干起来却很痛快,因为明年元旦,七百多户人的新民高级农业社就要宣告成立了。

一个深夜,大家正聚在办公室,酝酿新民高级社的七年远景规划。忽然,一阵风吹来,桌上的油灯灭了。黑地里,有人感叹地说:“农村电气化就好了,风再大,也把灯吹不熄。”

“是呀,我们该在远景规划里添个发电站。”

“恐怕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吧。”

“为啥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拖拉机了,转社

以后，要逐步实现这个远景规划，很多活路要改用机械操作，发电站还怕没有用？”

灯亮了，照见最后这位说话的是乡总支书记黄静仙同志。

社长罗世发拥护她的意见，说：“按照远景规划，殷家湾一带的河沟不合灌溉需要，要另开新河。我们不如在新开的河道上，修个小水电站；将来还可以附设个加工厂，打米、推面、碎饲料，解决加工粮食和家畜的饲料问题。”

道理要辩论，问题要推敲，一经研究，建立发电站就有必要了。于是，这个建议便列入了七年远景规划之中。

转社后的远景规划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不几天，省水利厅、省农业厅都派了专人下来协助我们。省水利厅原来就计划在川西平原试办一个水电站，作为建立农村电站的基点。现在视察了我们这里的条件以后，决定把这个试点就搞在这里，并赠送给我们一部10瓩的发电机。另外，还要在禾登乡办一个水利训练班，抽调温江专区各县的水利干部来实地学习。

那一晌，王守贵乡长天天陪同水利厅的干部，到社里各处勘查地形。社员们看见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日子要到了！”

“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党的话，硬是没有半点虚假！”

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更加激发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省水利厅两位技师、都江堰管理委员会一位科长和乡、社的负责干部经过一再研究，最后确定了：

填平殷家湾那一段弯曲的河道和沿河的一些大小沟渠，

另开一条又寬又直的新河；电站的地址就設在黄金堰。这个工程很艰巨，单靠社里的力量还不行，必須动員全乡一起来搞。所以，当时領导上就指定由王乡长和我共同負責。

我原来是新民二社的社长，負責管理农业；轉社时，担任高級社的副社长，分工专管副业。电气这套把戏，我从来没有摸过，咋个搞法，心里完全没有底。但是，推又推不脫，只好硬起头皮干；心想：啥事都是人干的，別人学得会，我还怕学不会？

专区水利訓練班在乡上办起来以后，帮了我們很大的忙，一切准备工作帮我們办得好好的。到了阳历年底，諸事都已齐备，就等破土开工了。

1956年元旦，高級社正式成立了。大家尽兴地狂欢了一天以后，第二天就投入了兴修水电站的战斗。

王乡长帶領全乡一千多人开辟新河道。当时各个兄弟社劲头也都很大。他們曾經要求与新民社合并轉为高級社，結果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未被批准。現在要他們一起来修水电站，他們知道，这就象一根繩子把他們和新民社拴在一起了。所以，他們早就拍了胸脯：“算我們一份。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随要随喊，随到随拿。”王乡长所帶領的这一千多人，就是各个兄弟社派来的，全部是些精强力壯的年輕人。

我帶領高級社的几百个人，負責修筑电站。我們是这样分的工：一、二耕区負責挖基坑，三、四耕区負責盘条石，五、六耕区負責撿卵石，七耕区負責担沙子。这几百人是經常出工的，其他附带搞一些杂活的人还未計算在內。

那一晌，我們社里到处是人山人海，熱鬧得很。每段工地

上都充滿了歡笑声、吼号子声、叮叮当当的工具声……

修筑电站的工作是比較艰巨的。

基坑沒有挖好深，底下就浸出水来了。那时又正是腊月寒天，站在水里挖的人，两条腿就象浸在冰里一样，寒气直往骨头縫縫里鑽。上来以后，一个个腿上都裂开多长的冰口。他們烤一烤火，喝两口酒，讓社里的医务人員在冰口上塗点药膏，馬上又跳下水去，眉头都不皱一下。

运条石也是恼火的工作。川西壩子大石头很难找，只好拆場口上那座貞节牌坊。拆掉沒費好大的事，运可就困难了。小路过不去，大路也推不走。他們一方面趕制木滾滾，一方面把小路开成大路。最后，費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石头盘到电站来。

捡卵石、担沙子看起来简单一些，事实上也很麻烦。他們常常要跑到几十里外去找、去担。

工程虽然这样艰巨，但在全体人員的努力下，还是一天一天迅速地进展着。不过二十五天工夫，新河就完工了。这一来，修筑电站的人就更紧张了。而社里又要求我們在旧历年底修好，因为轉社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搞，不能在这一工程上把劳动力陷得太多、太久；而且春节要来了，一定要保証提前发电、开灯，讓大家明光灿烂地过好轉社后的第一个春节。

正在这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陪同下，到我們社里訪問来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彭司令員在參觀了我們的电站工程以后，听說我們暂时只能安装一个10瓩的发电机，还不能滿足规划中的需要，他便建議省水利厅調拨一个85瓩的发电机給我們；省水

利厅的负责同志当时就答应了。

中央首长对我们的这种关怀，更加激发了社员们的冲天干劲。修筑电站的人，白天顶着雪干，夜晚点着灯干，连续苦战了五天五夜，终于在旧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把基坑砌好了。年三十的上午，铺上楼板，下午，技师们帮我们把手轮机和35瓩的发电机安好，这就全部完工了。

同一天，各家各户的电綫、电灯，也都拉好、装好了。

傍晚，天还没黑，大路上、小路上，成群结队的人们，就象潮水似地向电站涌来了，密密麻麻地把电站围了一层又一层。同一个时候，在禾登场上和通往社办公室的大路上，还有无数的人群聚集在每一盏电灯底下，仰头等待着。看吧，当时那个热闹的劲仗！

老头子们哈哈连天，谈的是光绪、宣统……最后归结到：“总算活到了这一天！”

老婆婆们笑个不停，说的是操家理事的好光景：“这一下晚上做点针线活路，也用不着戴老光眼镜啦！”

小伙子们磨拳擦掌地说：“不怕月黑头，我们也能夜战！”

姑娘们开玩笑地说：“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怕碰到鬼了！”

妈妈在劝哄哭闹的娃儿：“看，看，那是啥子！”

教师在告诫调皮的学生：“以后晚上要多读点书！”

开天辟地以来，我们这里是第一次用电灯呀，叫人们咋不如此兴奋呢！

时间到了。当我们把皮带往电机上一套，技师把闸门一开，骤然一道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啊，电灯亮啦！”

“好嘉呀！……”

人們的欢呼声把嘩嘩的河水声、嚙嚙的机器声都盖过了！欢乐的时刻刚过去沒几天，困难又来了。当时，电站上只有我和另外三个同志。他們虽然在水利訓練班学习了几天，但懂的东西还是不多；我就更是一窍不通了。开始，水利厅有两个技师留在这里，我們在他們耐心指点下，学会了实际操作方法，可是有很多原理还是沒有弄懂。他們一走以后，我們就沒抓拿了。机器不是这里出点小毛病，就是那里发生点故障。我們四个人組成了一个技术学习小組，“三个小皮匠，湊个諸葛亮”，有时候碰对了，毛病当时就医好了；有时候碰不对，机器就要停車。群众当然有意見。

有些人說：“一天有灯，十天停电。你們是咋搞的？”

有些人干脆每天跑一趟，来問我們：“今晚电灯亮不亮？我們好早打主意。”

还有人挖苦我們：“亮了，还不是象块面渣（炭火）似的，連个油壺子都当不到！”

我們只好哑口无言。本来嘛，电灯不亮，咋能怪別人批評呢！当时，我們几个都搞得来灰溜溜的。我向党支部和罗社长反映了情况。支部答应技术、材料設備問題，馬上請求上級解决；但思想問題，要我們自己解决。老罗也对我說：“旧社会办电厂是資本家的事，他們借此来剝削工人；技术也只有知識分子才能掌握。今天我們办电厂是社員集体的事。为了建設社会主义，我們黃泥巴脚杆也要掌握技术。搞社会主义，要有一颗革命雄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灰心丧气。”

我把这些話給其他三个同志談了。大家都很激动，一齐

表示：一定要勤學苦練，掌握技術；哪怕有天大的困難，也要把電站搞好。說干就干，我們跟着就研究技術上的問題，又一個一個跳到結了冰的水里去檢查機器上的毛病。等到省水利廳把一些配件、零件送來時，我們很快就裝配好了。

電燈又復明了，機器也不扯拐了。這時社員們又另有話說了：“幾個小伙子真有辦法！”嘿，夸奖起我們來啦！

在前些日子，電燈經常打瞌睡，我們也不好意思去收人家的電燈費。現在我們可以去收了。每盞燈收幾角錢，每月一共收幾十塊錢。說來寒傖，這麼大一個電站，才有這麼一點收入。這時，社里決定馬上就把加工廠搞起來。我們听了非常高兴，這一下不光是給社里增加了副業收入，我們自己也可以多學幾門手藝了。

加工廠搞起來以後，開始，只幫社員碾點米，磨點面，工作很零散，活路也不多。後來，社里和糧食部門訂了加工米的合同，我們才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糧食部門加工的米，質量要求比較高，出米率要求也比較高。有個別同志圖快，圖給社里多掙點錢，就主張適當降低質量，我堅決不同意。我馬上召開技術研究會，叫大家從技術上找竅門。當時，我先提了個“輕風糠”的辦法，大家認為很好。試驗過後，果然有效。這就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又想了很多好辦法。這次加工結束，出米率超出一萬多斤，質量全部符合標準。糧食局獎勵給電站二百多元。

1958年，社里大力發展副業，公有豬、私有豬陡然增加了几倍，飼料就供應不及了。電站決定再搞飼料加工。我到供銷社去買飼料粉碎機時，一問價錢，要二百多元一部，把我吓

了一跳。仔細一看，機器外壳全是鉄做的，所以價錢既貴，又十分笨重，不便移動。我馬上找了一個木匠師傅來，和他一起研究機器的構造。最後，我設計，他制作，終於造成了木制飼料粉碎機，節省了很多成本。

電站的業務就這樣一天天地發展起來了，為社里作了不少貢獻；尤其是在大躍進中，除了給社員們在夜戰時照明外，還在全民煉鋼、煉鉄的戰鬥中，支援鋼鐵戰士立了大功。

高級社在农、副、牧、漁等生产方面的建設，項目很多，难以一一介紹。在文化福利方面，当时也創建了三所民办小学、一所医院以及其他許多农村里从未有过的事业。

这里只介紹一下民办中学創建的經過。从这篇文章里，不仅可以看到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及这所学校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党的教育方針和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如何英明、正确。

附帶提一提：从1957年开始，省、专、县、乡各級机关都陸續輪流下放來一些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或基层工作；如县委組織部副部长张守福同志下放到禾登乡担任党总支書記，地委秘書陈浩东同志下放到新民主担任党支部書記，禾登乡副乡长刘元光同志下放到新民主担任副社长，……这就更加充实、加强了社里的领导力量。

光 荣 的 事 业

贺国智口述

在川西壩子，沒有誰不知道新民主。我們还在新都中学讀書的时候，就常常从报纸上，人們的言談中，看到和听到对于它的介紹。在一次温江专区学生代表会上，我們还曾听过

罗世发社长的报告。以后，又随同全校师生到新民社来参观过一次。通过这些接触，我们对农村——具体說是对新民社——产生了美丽的憧憬与向往。

1957年暑期，我們高中毕业了。当时有七个未考上大学的同学，自动邀集一路，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了新民社。

七个年輕的高中毕业生，毛遂自荐，要来支援农村建設，既沒有介紹信，也沒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該怎么处理呢？这給社里提出了一个难题。罗社长在第一次接見他們时，只好婉言謝絕了。然而，这几个年輕人却一直纏着他。

“我們認識你，我們到社里來過。”

“可是我并不認識你們呀，到我們社里來過的人那么多。”

“我們在溫江听过你的报告，你說农村里很需要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們就來了。”

“需要是很需要，不过你們應該通过組織介紹來，我們好根据你們的特长、願望、工作時間多长，等等情况來安排。”

“我們讀的是普通中学，也說不上有什么特长；我們的願望是來从事文化建設工作，最好是教教書呀，……”

“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可以。”

“对，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至于時間，根据以后的情况，……”

“我們是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参加劳动鍛煉來的，願意长期在这里安家落戶。”

“长期安家落戶？”罗社长对这句话有了兴趣，但显然他还不大相信，“农村沒有城市那么好耍哟！”他挨排一二地注視着他們。

有几个人低下头，避开了罗社长的目光。有几个人却坚决地说：“我们不是为了好耍来的。我们能吃苦。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可以找新都中学出证明。”

“那好吧，这个事情我们社委会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你们暂时住下来参观参观也可以。有地方住没有？”

“有……”

这件事当时没有决定。七个人在禾登场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

一天过去了，没有回信；两天过去了，没有回信。他们从早到晚，社里一趟，乡政府一趟，新繁县城一趟，东奔西走，但还是没有结果。这时候，一个姓萧的同学考取了大学，在接到通知后就走了。留下来的六个人更心焦了。

怎么办呢？黄汉光、刘军才、张存杰三个同学主张到社里找个地方去住，先参加劳动，搞好群众关系，用实际行动争取社里的信任。一个姓黄的同学不同意，认为这没有搞头，说：“等你们工作确定了，通知一声，我背起铺盖就来。”便扬长而去了。其他两个虽然也不感兴趣，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五个人在乡场附近一个生产队里参加了收割早稻的工作。社员们起初觉得有些奇怪：这几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地来参加劳动，既不吃社里的饭，又要社里的工钱，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呢？当逐渐混熟了，明白他们的来意以后，社员们才赞叹地说：“如今的学生真好！”

事情很快反映到社委会去了。罗社长特地来看望他们，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与要求。他们说没有什么困难，只是要求能搬到社里来住；听社员们说，砖瓦窑有个大草棚空着，他们

想搬过来。罗社长答应了，并嘱咐社员们好好在生产上、生活上照顾他们。回去后，他又找人送来几尺蓝布，给他们做围腰，表示对他们参加劳动的嘉奖和鼓励。

经过这一番考验，社里对他们信任了。罗社长亲自到县里去，向宣传部和文教科请示，准备根据一年来社里自搞三所民办小学的经验，再建立一所民办初级农业中学。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罗社长家里，五个同学围坐在方桌旁，静听刚从县里回来的罗社长给他们传达县上的指示。他们在罗社长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了，这时才等到。罗社长脱去淋湿了的衣服，一边用热水洗抹身体，一边给他们讲办学校的计划：“原则是确定了：这所中学要贯彻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师资、校舍、经费要全部由社里自行解决，以后学校要自给自足；要办一定要办好，不能半途而废。……”

说到这里，罗社长的爱人黄正清提了一壶开水出来，给每人倒了一杯。

“外面的雨很大，你们是借屋躲雨来的吧？来，喝杯热开水。”罗社长象是开玩笑似地插了这么一句，但马上又扭转了话头：“大的原则就是这样。至于具体办法，社委会明天晚上要详细研究，你们也来参加。你们回去先商量商量，准备提出你们的意见。”

愿望就要实现了！他们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兴奋，彬彬有礼地告辞了罗社长。可是，一跨出大门，却象燕子似地飞跃起来，连罗社长招呼他们转来拿雨伞的叫声都没有听到。

也许是吹了风、淋了雨的关系吧，他们回到窑棚以后，热

劲就消退了。大家冷靜地來考慮未來的問題了。

一個姓劉的同學說：“嗨！民辦中學，沒聽說過。看吧，二天辦起來，缺這少那的！這麼有名的社，應該由國家撥一筆錢，辦個漂漂亮亮的正規中學，那才帶勁。”

其他的人默不作聲，各人想着各人的問題。他見無人答腔，便往鋪上一躺，自做美夢去了。

另一個姓何的同學又發表意見了：“學校辦起來以後，我們不是一輩子都要待在农村里啦？”

“一輩子待在农村里，有什麼不好呢？”黃漢光反問道。

“今年考不取大學，明年我還要再去考。我不能長期待在农村里。”

“你沒有听懂剛才羅社長說借屋躲雨的意思嗎？你這不正是借屋躲雨的思想！”劉軍才也開了腔。

“借屋躲雨又咋個？我總不能把青春白白地葬送在這里！”

“你這是什麼話！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建設，是黨的號召。我們能把知識貢獻給農村，是最大的光榮！”張存杰忍不住跳了起來。

“好吧，你們享受這份光榮吧！我有我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路！”

第二天一早，他不辭而別，另尋出路去了。

他的離開，並沒有影響事情的進行。社委會順利地商量好了關於辦中學的若干具體問題：決定先開三個班；師資，除留下的四個人以外，再由他們邀約兩個人來；校舍，根據副社長史良成的建議，把副業坊的大豬圈騰一排出來，隔成五間房

子，屋外的一块空地平出来做操场，全部整修工程由师生和家长义务承担；课桌，采取副社长蔡德福提出的办法，用旧砖砌脚，上面搭盖砖坯匣匣；凳子，由学生自带；经费，每个学生每期缴学费五元，全部设备开支都在学费中支付；……总之，勤俭办学，一切因陋就简，不讲排场。

最后又讨论了教师的工资问题。黄汉光、刘军才、张存杰坚持要和社员一般待遇，只要能解决食宿问题就行了。社委会根据学费收入预算及他们的实际情况，决定每人每月十五元。听到这个决定以后，那个姓刘的同学当时就露出了不满的神色；散会以后，一路上，大发牢骚：“哼！当个中学教师，才十五块钱一个月，连小学教师都不如；我回去拉板板车也比这挣得多。再见吧，新民社！”

他又走了，剩下的只有三个人了。他们决定回母校求援。母校的老师、同学听说了这件事以后，非常高兴，非常支持。很多未考取大学的同学争着要来，甚至有些考取了大学的也想来。最后，学校领导上决定，由原毕业班的团支部推荐三个团员。这三个人就是黄文愈、张宗德和我。这样一来，这六个未来的教师便全部是团员了。母校除了在人员上的支援外，还给了许多物质上的支援——赠送了一批教学用具和图书。

到了社里以后，我们一边整修校舍，一边就开始招生了。这时又遇到了困难。

有些学生家长认为：“读民办中学，只上半天课，读了书还是当农民，没出息！”

“读书读到猪圈头去了，啥子学堂哟！”

“这几个嫩水娃娃，自己都是考不上大学的，教得好啥子書！”

有些家长还顾虑：“我女兒都十七八岁了，几个老师尽是一些二十上下岁的男娃娃，二天莫鬧出啥子事情来！”

.....

我們听到这些风言风語，自然很丧气；尤其恼火的是自己又不好出面解释，真成了哑子吃黄连了！党支部和社委会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便向学生家长反复进行动员，又指定了几个生产队长、保管員、會計、卫生員带头报名；罗社长还替我們打了保票，并規定了一条紀律：学校里不准乱談恋爱。这样，那些家长才将信将疑地把子弟送来讀書。

校舍整修好了，一共招收了一百五十八个学生（除少数干部外，大部分是以前和本届的高小毕业生）。在开課前，我們专门抽了一个星期時間到母校去学习如何备课、如何教学。在开学前一天，罗社长、党支書陈浩东等几个負責干部又亲自来听我們試教，給我們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見：如何講得生动具体一些呀，如何联系农村的实际情况呀，等等；最后，还鼓励我們胆子放大一些，不要过于紧张。

學校正式办起来了。以罗社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成立了（罗社长兼校长，并担任政治教員；我为副校长）。团支部、队委会也組成了。

开始，大部分学生都有一种自卑情緒，認为自己讀的不是正規学校，“連証章都沒有一个”，“上課还要自带凳子”，……他們一出校門就把書包藏起；有些少先队员連紅領巾也不敢打。另外，还有些同学看不起老师，上課时故意找漏眼，調皮

搗蛋，不聽管教。這對於毫無教學經驗的人來說，是多麼難以克服的困難呀！我們也曾為此動搖過、哭泣過，……每當這種時候，黨支部的負責同志就鼓勵我們，幫我們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

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學校里加強了團、隊的組織活動，學生中的黨、團員起了骨幹與模範作用。縣、鄉、社各級領導同志經常輪流來上政治課，給了我們很多有益的教導。有關單位有同志到社里來工作時，我們也要請他們來講課。我們自己在教學的內容、方法、質量上也力求改進。我們六個人差不多每晚上都要開一次團小組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互相幫助。這樣，學校才一天天地走上正軌。

我們的的生活也越來越愉快了。上午在課堂上当老師；下午勞動時就当學生。我們被編入了楊萬明生產隊，除了參加勞動以外，還擔負了一些記錄、宣傳等文化方面的工作。所有的同學、家長、社員都成了我們最好的朋友與親人。

學校這種半工半讀的辦法，不僅使師生通過勞動與農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同時也使教育真正與生產相結合了——書本知識可以用於生產，而生產知識又豐富了課堂教學。這就使許多學生家長改變了對學校的看法。

拿戴先琮來說。她是生產隊的會計，原先在工作上常常遇到困難。進校以後，學習成績很好，每門課程都在4分以上，工作起來就不吃力了。同時，在勞動上，一學期掙了五百六十分，再加每月打兩雙拖鞋，一共就收入了七十多元。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而且還能貼補一部分家用。她

母亲喜欢得不得了。逢人便说：“民办中学真好，教出来的学生能文能武。你看我们先琼，多能干！哪象她哥哥，在城里读了书转来，扫帚倒了都不肯扶一下，连根筷子也花不来！”

象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全校学生的学业成绩，平均60%都在4分以上。劳动上成绩更显著，每个学生每期平均都要挣五百多分，最多的挣到一千二百多分，副业收入还在外。1958年，我们师生种的十五亩试验田，早稻亩产达一千五百另一斤，中稻亩产达二千一百三十斤，还帮一些生产队完成了许多突击工作；在大跃进中，全校建立了几十个小型工厂、作坊，还参加了炼钢炼铁，……社里曾多次为我们举办了成绩展览会。

学校在群众中的威信树立起来并逐步提高了。学生人数逐年在增加，外乡外县的学生也跑来了。党报也屡次表扬我们，介绍我们办校的经验，各地都在纷纷推广。将近两年的时间，先后来校参观访问的有两三万人之多。中央首长、各级领导同志到学校里来视察，国内外著名的教育专家以及很多国际友人，前来参观，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1958年年底，我以先进单位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并荣获团中央授与我们学校的一面锦旗。

我们在1958年2月就被吸收为新民社社员，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想，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光荣的！

1957年，在我國曾經展開過一場規模浩大的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這是在思想戰綫上和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帶有決定意義的鬥爭。

農村里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便是這個鬥爭的一部分。當時，新民主也展開了這樣一場鬥爭。

烏雲遮不住太陽

劉發棟口述

我們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走上互助合作道路以後，生產一年比一年搞得更好，各項事業一年比一年辦得多，生活一年比一年提得高。這些事實，使得廣大農民更加滿懷信心地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奔。可是，它也使得那些夢想重新騎到人民頭上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越來越不甘心。他們一直在找機會鑽空子來進行破壞。造謠誣蔑，挑撥離間，“混進來、拉出去”，……啥子花樣都有，總之要想把互助組、合作社整垮掉。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我們還查出了一些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的特務、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不法富農。從那

以后；他們才稍稍收敛一些；不过，說几句怪話呀，整烂你几把鋤头、釘耙呀，田坎上給你戳几个缺口呀，这些坏事还是在阴倒整。

1957年秋收以后，我們这里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用我們农民的話來說，这就好比人隔天把要洗个澡，免得脏了生疮害病；机器过一段时间要上点油，防止生鏽出毛病。一句話，就是要克服我們工作上、思想上的缺点，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更好更快地建設社会主义。哪晓得“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那些地、富、反字号的家伙，看錯了风向，以为这一下要变天了。他們张牙舞爪地公开和我們干起来了。

在我們五耕区（包括楊万明生产队、女兒队和我們这个队）的鳴放会上，开头，社員們提了一些生产上的意見，大部分都很正确。我們秉着边整边改的精神，就馬上接受，逐步改正了。这时候，地、富、反字号的家伙，心里象猫爪抓似的，憋不住了，斜刺里杀出了一刀。鬧得最厉害的就是楊全。

楊全是个什么人物呢？我先簡單介紹一下。他是个兵痞出身。解放前一直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解放过后才被資遣回来。回来以后，村里給他分了田分了房子。又念及他不懂生产，怕他庄稼搞不起走，所以罗世发他們刚組織互助組的时候，就吸收他参加了；以后办十五戶人的初級社，也带上了他。平时他只能搞点挑抬活路，其他重要生产活路，都是別人代他搞了。就这样，他还象打摆子一样：有时候偷懶装病；有时候又“积极”到这种程度——天不亮就起来去“逮睡懶觉的”，揪人家唐玉芳（女社員）的門。另外，还經常“斗争”地主；

他担粪水弄倒了，就到地主的粪坑里去担一挑来补起；地主家有人坐月子，他就跑去要糲糟蛋吃。1953年3月，他还鬧过一場笑話，“人民日报”上都登了文章，題目叫“楊全的婚事”。这个事說起来倒有趣，也还可以看出他为人的一方面，不过說来話长，比起来又不太关紧要，我就不談了。下面只說他被送去劳改的事。那是1955年。

头一年秋天，我們副业坊的粉房、养猪場里接連发生了这样几件事：在鎖着的抽屜里丢了几百万元（旧币）；猪槽里发现了大头針，已經死了几根猪；磨子被打坏了，磨心里发现有鉄砂子；几桶粉搞坏了，損失了几百万元（旧币）。紧接着，在第二年春天，又死了很多猪，在最后一根死猪的腴窝下发现有刀伤。这当然引起了社上的注意。經過治安委員和公安部門的調查，群众提出了不少綫索。

有的說：“楊全就在副业坊住，他又常拉粉房會計喝酒，錢可能是他偷的。”

有的說：“我看見他在柳树底下，拉着石光浩，鬼鬼祟祟地在說悄悄話。石家因为社里修水利，停了他家碾子的事对社里不滿，石光浩又是個十几岁的娃兒，不懂事，楊全一定是在挑拨他干坏事。”

粉房的老师傅說：“楊全曾經問过我，粉怕啥子。我說，見不得盐，一見了盐就結不成粉了。”

.....

紙咋个包得住火？經過大家一揭发，又仔仔細細作了調查，就弄清楚了；这些事大半是楊全亲自干的，有一两件是他指使別人干的。最后，楊全本人也招認了。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了他两年徒刑。

1957年上半年，楊全刑滿被釋放回來以後，並沒有悔悟，反而滿不在乎地說：“勞改隊還是安逸，你們看我都長胖了。”所以，當我們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後，他就肆無忌憚地活動開了。那一向，他成天酒館進、茶館出，到處点火煽風。見到這個，說：“你為啥不放？他們不是叫我們大鳴大放嗎，你怕啥？”見到那個，說：“沒啥大不了的，不得敲沙罐（槍斃），充其量去拉板板車（勞改）。我就準備去唱‘二進宮’。”……在他串連之下，不僅地、富、反字號的傢伙跟他結成了一伙，甚至個別落後社員也上了他的當，當了他的幫手。

在我們耕區會上，他“牛皮渣，渣牛皮”，亂說了一陣不算，還帶頭到全社的大會上去鬧。在頭一回開大會的時候，他第一個上的台。首先就指着羅世發罵了一陣，那些話簡直不堪入耳。然後，他又對着幾個黨員幹部，挨一挨二地點名：“史良威、楊萬明、聳二爸（這是喊我），拿耳朵來聽到，我在罵你們了！”“曾玉清、黃紀芬，台口來坐好！你們腦殼抬不起來啦？”……他從肅反到統購統銷，從合作社到羅世發等社干、積極分子，全都攻擊得一塌糊塗。真惡毒！

當時，群眾氣得一個個砣子（拳頭）都捏出水來了，有些人鞋子都脫下來拿在手里了。幹部們只好東拉西勸，叫大家不要動手，讓他們“放”深“放”透，看他們肚皮里头究竟裝了些啥子污七八糟的東西；反正真金不怕火燒，道理總是講得清楚的。這樣，群眾才忍了又忍、壓了又壓，沒有當場跟他算賬。

接下來就是三耕區的陳中和老娘子上了台。她在土改時，隱藏過地主的財產；糧食統購中，又伙同反革命分子鬧過

粮；在她们原来的小社里，利用儿子是保管员，经常偷社里的东西；……经过好多次批评，都没有悔改，硬是“老马不死旧性在”。她一张嘴巴尖酸刻薄，来得个厉害。一开口就是：“并高级社那阵，我们倒是欢天喜地的。就象嫁女一样，办了好多陪奩。哪晓得小伙子长得膘，顿顿吃饽饽（指稀粥之类的东西）！大社就是不如小社，小社不如单……王轱辘（王乡长过去推車維生，她輕蔑地給他取了这么个外号），不要拿眼睛恨着我！老娘嘴說干了，給我倒杯水来！”也亏我們的支部書記陈浩东同志有涵养，当真就給她倒了杯开水。她喝了两口，又繼續說下去：“我代表我們三区提出退社！”三区的社員一听都詫了，啊个选她当“代表”的？嗨，哪晓得她还不仅是“代表”呢，你听她那口气：她連哪个当社长，哪个当會計，哪个当啥子，全都委派好了！看起来真不简单，她們还不光是罵一通、鬧一陣就算了，居然硬是想另搞一套呢！

你看，这不是跟着就来了：她一說完，那些地主、反动富农、反革命分子全都耀武揚威，要求实行倒算了！这个說：“我的成份划錯了！”那个說：“退还我的田地房产！”这个喊：“冤枉！”那个喊：“报仇！”……吹哟，解放前那付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拿出来了！

散会以后，群众紛紛来找干部。

有的說：“这些坏蛋硬是昧了良心，白肉上生疔疮，乱栽誣！”

有的說：“有他們的发言权，也該有我們的发言权。非爭辯清楚不可！我报名发言。”

有些人耽心：“真要我們退田退房子，咋办？”

有些人就笑笑：“乌云遮不住太阳。国民党那么凶，都完蛋了；他们几爷子闹得出啥名堂！”

七十多岁的馮恩云老汉，当天找曾玉清找了几次，晚上才找到。他一进门就问曾玉清：“今天在会上，我起来三次想揍他们，你就连拉我三次。我真不懂，你们是咋个搞的，让人家指到鼻子骂！”

曾玉清看馮老汉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就让他坐下慢慢说；又抓了把灰面出来做汤元，给他宵夜。馮老汉这个人平时就不会说话，这时候更是气得来结结巴巴的。他一边在烧火，一边在摇头：“弄糟了！弄糟了！”

曾玉清只好慢慢劝他。汤元煮好了，曾玉清舀了一碗给他。馮老汉用筷子拈了一下，也没有吃。过了一下，忽然把碗一搁，说：“明天我是要去打喇，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说着就冲出门去了。

曾玉清连忙追出去，一边送他转去，一边又耐心劝他。

第二天一早，黄纪芬不晓得这个事，一碰见馮老汉，就问他有沒有啥意见，有意见就放出来。这一下，把老汉气惨了，他说：“共产党这么好，我还有意见？你叫我放啥？”他以为叫他放，就是信不过他。所以说完了，掉头就走，会也不参加了。

当时还有个更老的老汉王世全，已经是八十往外的人了。他经历了几个朝代，但是哪个朝代也没有解放以后好。所以，一听到有人骂共产党、骂人民政府、骂合作社，他也气得来吹胡子瞪眼睛的，直是说：“简直不象话！简直不象话！”

黄纪芬把馮老汉的事告诉了曾玉清以后，曾玉清马上就去找馮老汉。正好，两个老汉在一起，曾玉清对他们说：“既然

你們听不得那些肮脏話，暂时不参加开会也可以。你們两位老汉就散散心吧。”这样，后来两次鳴放大会，他們就沒有参加。直到开始大辯論时，他們才高高兴兴地跑来。

象这样动人的例子多得很。总之，那时候界限分明得很：一边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农民群众，一边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且一旦他們提出要倒算以后，連那几个上了他們当；当了他們助手的落后社員都和他們划了界限，站过来了。

回过来，又說楊全。他自从在社里大会上“放”了以后，更加张牙舞爪、趾高气揚了。队里給他分派活路，他脑壳一摆：“我没得空！”这位“总代表”当时的确是忙：这个村跑到那个村，这个社跑到那个社；用不着下請帖，就自蒞跑上門卖他的“狗皮膏藥”去了。

有一天，廖焯华在場上茶館里喝茶，楊全走来了。他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脚往另一张椅子上一蹶，喊声：“来个双碗！”然后車轉身来，对廖焯华說：“廖师，今天我到华严寺联社上去放了一下，放伸了，放伸了。回来喝了茶、吃了酒，老子还要去放！”廖焯华也沒有理他，心想：秋后的油炸蟻，看你还蹦得到几天；再开大会，我就要头一个上台跟你辯論。

意見提得差不多了，社里把所有的意見分类排队，正确的馬上就改；暂时还不能办到的，也作了答复；属于誤会的，就說明真象，解释清楚；涉及到有关单位的，就轉出去。这样处理，不仅社員們都很滿意，而且社里确实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出現了很多新气象。最后，剩下来的，就是那些“代表”的“意見”了。这当然也要件件有着落，条条有交代，就把它交給群众去

討論。于是，展开了一場大爭大辯。

这一下，气氛不同了。开会时，人也来得多了。为了给那些“代表”开开眼界，社員們个个穿上了新衣裳，象赶花会似地把一家大小都到起来了。老年人见了面有說有笑，青年人到了一起又唱又跳。那个劲仗就不用說了。这时候，“代表”們都奄气了，失魂落魄地低着头，直往角角上躲。

辯論开始了。社員們要求，請那些“代表”还是坐到台上去。然后，这才一个个、一件件逐条逐款地跟他們摆事实，講道理，对証据，追根源。

三耕区會計何炳然算了一笔賬：“轉高級社以后，全区大小平均每人所得劳动日，比并社轉社前多一倍（由每人每年三百二十个工分增加到六百多工分）；按戶計算分的粮食也比过去多。再以副业來說，因为有水电站和增加了很多新項目，仅1956年的純收入就有二万三千多元，全社每戶平均三十元左右。要不是并社轉社，哪有那么好的事！”

社員們这时候也紛紛說道：

“是呀。要不是轉成高級社，不說修水电站，就是买水电站的机器，我們小社社員一年不吃飯也办不到！”

“岂止修水电站，我們还办了打米厂、砖瓦窑、果园、粉房、养猪場，还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夏种指数，还办了中学、小学、幼兒園、图书室、医疗所，……不是并社轉社，那个小社办得到这么多！”

“陈中和說她們并社吃了亏，簡直是胡說！大家都曉得的，老新民社光是公积金，每戶平均就有一百多元；还不說这些那些。大家富裕嘛，咋个能說哪个小社吃亏不吃亏！”

三区社員石光明原来对拆社不贊成也不反对，这时候也表示态度了，他向大家报了自己的收入賬：“1955年小社时，每个劳动日值八角二分，我做了一百六十个劳动日，加上土地報酬，也分不够全家人的口粮。轉社并社以后，头一年我做了三百六十个劳动日，分够口粮，又分了几十元现金。到底高級社和大社好不好，这不是明摆着的嗎！”

.....

“代表”們那些“意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黃，咋經得住反駁！所以，他們馬上就繳械投降，坦白了他們的陰謀目的。有几个干脆往下一跪，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說：“我放屁，我該死，我給大家磕头賠罪！”这些家伙就是这么卑鄙无耻！

这时候，曾經上了当的落后社員也醒悟了。唐兴发非常气愤地指着楊全說：“楊全，你想錯了！我們农民和共产党永远是一家人，絕不能讓你这个反动家伙耍陰謀！”

为了証明統購統銷並沒有讓农民餓肚子，有些社員提議馬上办个余粮展覽会。大家都很贊成，并且主张扩大一些，把其他实物也拿出来展覽，显示一下合作化的优越性，长一长自己的志气。当时會場上象鍋开水似的欢騰起来了，各家各戶都爭着要把自己家里存的余粮和历年来置办的衣籠罩被、日用器具，全部拿来展覽。哪去找这么大的地方来摆呢？社上研究了一下，决定分区举行，而且要划定地盘，一家只能占一小块。尽管这样，还是很有看头呢！

我們耕区的展覽会搞在社办公室壩子头。一布置起来以后，比百貨公司的小門市部还漂亮，东西也更多。赶場那天，街上冷冷清清的，都跑到这里来了。有些人把它当成了交易

市場，看到這也要問，那也想買。

社里展覽了以後，又選了一部分，敲鑼打鼓地送到鄉上去集中展覽。最後，社里還專門搞了一個“三發展覽會”。這三發是：唐興發、周玉發、黃基發，他們都是忘本回頭的典型人物。

這一來，更進一步提高了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也挽救了那些失足落水的落後社員。至於那些興風作浪，與人民為敵的地、富、反字號的壞傢伙，也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作了處理。“總代表”楊全，被新繁縣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三年管束。

經過這場思想戰綫和政治戰綫上的鬥爭，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接着，便掀起了一个轟轟烈烈的大躍進的高潮。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人民内部也出现过少数忘本的人。唐兴发就是一个典型。

一面镜子

曾庆祥 石韞玉

1957年年底，新民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在大鸣大放阶段，一个曾经是作为贫苦农民在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摆脱了贫困的典型人物——社员唐兴发，却说他所在的社“生活改善是想戴大红花的干部吹牛皮”，“合作社增产是算盘打出来的，不实事求是”，“共产党现在不是为农民办事了”，统购统销把他“整惨了，饿得一家人打偏偏”，“眼看我的家务就要更快地爬上去，统购统销又把我打下去罗”，……他的妹妹唐玉芳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也同样作了恶意的攻击。

唐兴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解放前，他家世代

代都是帮人的。他父亲唐洪顺十三岁从川北三台县逃荒到新繁县禾登乡，在一个姓杨的地主家当长年。唐兴发五岁就开始捡狗屎，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卖零工。他的弟弟、妹妹出世后，一个都没有逃过他那样的命运。后来，地主为了把身强力壮的唐兴发弟兄紧紧地拴住，也曾租了几亩田地给他们种。虽然不短欠一颗租子，但是，稍不如意地主就夺佃。以后只让他们种了六分多地。为了生活，为了有个安身的地方，唐兴发全家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任随地主摆布。在杨家(地主)大门角一间半烂茅草棚里，住着唐兴发一家九口人，睡草窝，盖蓑草，身披烂麻布口袋。六分多地养不活九口人，何况还要给地主交租呢？唐兴发弟兄只有贩小菜、干零活，娘和妹妹就织布、纺线，一天累到黑，一年累到头，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吃点苕菜、南瓜过活。因为生活过不下去，唐兴发的两个妹妹，十岁时就被逼着“嫁”出去当了童养媳。唐玉芳十岁出“嫁”的时候，年纪小、身体轻，花轿不好抬，还在轿里加上了几块石头。

除了受地主的地租剥削以外，唐兴发家从老到小，还要给地主当牛马，无偿地服劳役。五十多岁的父亲经常要推鸡公车送地主的母亲到新都去玩耍。妈和妹妹们要给地主家倒马桶。地主从来没有把唐兴发一家当人看待过。有一年，唐兴发五岁的小妹妹死了，埋葬的时候，地主不许从大门抬尸体出去，说是怕给杨家“招来不吉利”，逼着把尸体从侧面院墙上往外吊；结果，装尸体的匣子被摔的粉碎。

在旧社会里，压在农民头上的不只是地主阶级这一座大山，还有国民党的军队，伪乡、保长和袍哥大爷等等。1945年，唐兴发的二弟唐守德贩小菜到灌县，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了

壯丁。他娘和妹妹唐玉芳借了路費到灌縣，向國民黨的營長磕頭哀告，好容易營長“開了恩”，答應她們拿錢、“取保”把人換回去。全家求爹爹告奶奶，借了高利貸，要求地方上的袍哥大爷和偽鄉、保長辦證明。但是，錢被瓜分了，唐守德的人影也沒有見，到現在都沒有下落；白白地措上了一筆高利貸，直到解放時還沒有還清。第二年，年老體弱的父親被地主和偽鄉、保長派到新津修飛機場，挨打、挨罵又挨餓，回來害了一場病，又沒錢醫，慘痛死去。

人死了，高利貸措上了，唐興發一家人在地獄里越陷越深。但是，盤踞在窮人頭上的毒蛇絲毫也沒有放鬆他們。那時候，有個灶頭就算一戶，偽鄉、保長按灶頭派壯丁費，要他家每月出一斗米。全年還收入不到幾斗米的唐興發，只好把灶拆掉，煮飯時再用三塊磚頭把鍋撐起當灶頭。快解放時，楊家地主又要攆他們到場上乞丐們住的戲樓下去住。唐興發娘兒母子哭哭啼啼，帶上酒米、蘇麻求告偽鄉長向地主說情。鄉長把禮物收了，理也沒理睬。這時候，唐興發全家已經走投無路了。

二

解放了，共產黨、毛主席給受苦的人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解放後不久，村農協會給唐興發家調撥了三畝多田種。受够了壓迫、嘗盡了辛酸的唐興發，這時才象一個人一樣站了起來。他積極參加了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的鬥爭，以後又擔任了土改主席團的代表、賠罰委員會的主任。他妹妹唐玉芳也當

了村妇女主任。经过土地改革，他家里共分得十亩零二分土地，还和另外四户农民伙分了一头耕牛；其余拌桶、犁头、钉耙、锄头……，凡是需要的农具，都分到了。全家六口人也从破茅草棚里搬进了原来地主的正当中四间瓦房，还分了两间草房做牛圈和猪舍；刻有龙凤的大花床、衣柜、桌椅板凳、锅瓢碗盏，一样样都分齐了。

土改结束不久，唐兴发一家人参加了罗世发互助组，接着又转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第一年分配，唐兴发一家就分到了五千六百斤谷子、四百八十斤小麦、七百多斤洋芋，还有三百斤菜籽，加上柴草，总值约近四百元。分配以后，黄澄澄的谷子堆在唐兴发家的围席里，谷堆顶顶差一点抵到房子的中梁。这是唐兴发家祖祖辈辈从来没有过的事情。1954年，他家从社里分到的收入约值五百多元；1955年又上升到七百多元。因为劳动好，每年分配，在全社社员当中，唐兴发的收入总是数一数二的。1956年转为高级社后，取消了土地报酬，人强力壮的唐兴发一家，收入更是节节上升。在家庭副业方面，过去连一根猪毛也没有的唐兴发，从1953年就开始喂上了一头肥猪，1954年发展到三头，1955年又开始喂母猪，到1957年已经有了三头母猪，光凭卖小猪，一年就要收入好几百元。土改时分到一个猪圈，现在已经发展到三个圈了。

随着收入的急剧增加，唐兴发一家人的生活也一年变一个样。仅1955年，他家就向左邻右舍调剂布票，买了五十四丈洋布、二十多斤棉花，添制了三床新被盖、两床新蚊帐。家里的人都穿上了新棉衣，还买了皮鞋、胶鞋、绒线衣。唐兴发也扔掉了头上的白帕子，戴上了崭新的呢子帽。妹妹唐玉芳

和唐守贞还围上了绒围巾。唐守贞进了学校，唐玉芳也在民办夜校里认字。

共产党、毛主席把唐兴发一家人从旧社会的泥坑里救出来，土地改革、合作化又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大翻身，贫穷困苦、受人欺凌侮辱的日子一去永不复返了。

三

唐兴发解放前的苦难遭遇，新报社里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他翻身后的经历，新报社周围因转几十里地的农民也都清楚。他曾经在全乡庆祝丰收的大会上讲过话，也曾一次又一次地接待过参观访问的外地农民、国际友人和中外新闻记者。省、专、县的党政领导同志也找他谈过话。在这些场合中，他向人们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和他的新生活。然而，唐兴发在大鸣大放中变了，这是为什么？

唐兴发在1953年曾经退过一次社。解放前，唐兴发除了种地、卖零工以外，还要靠贩小菜维持全家生活。他曾经走遍周围几县小菜的产区和销地，也熟悉怎样才能从这行买卖中多赚一些钱。解放以后，虽然不指望卖小菜过活，但在土地改革和入社以前，还是要把贩卖小菜当成找零用钱的重要来源。初入社时，每逢场上小菜价钱好、获利大的时候，唐兴发心里总是痒痒的。1953年秋收分配时，唐兴发的收入大大增加，在社外单干的富裕中农曾繁玉挑唆他说：“你在社里分的倒不少，但是在社外种一亩红甘蔗，要抵你们社里几亩田的收入。”想拉他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两条道路面前，唐兴发动

搖了：“种甘蔗好倒是好，哪有那么多本錢呀！”“本錢我借給你。”曾繁玉几句话就打动了唐兴发的心。在資本主义个人发财的思想支配下，唐兴发退了社。退社不久，社里开展了总路綫的宣传，实行了粮食統購統銷，唐兴发在大家的帮助下，檢討了錯誤，又重新回到了合作社。但是，唐兴发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資本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此就根本消除。他妹妹唐玉芳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資本主义思想。1953年粮食統購統銷时，他妹妹在县扩干会上自报卖米四百斤，回来以后又变成只卖四百斤谷子。群众批評她自私，妇女会改选时就没有选她。从那时起，她就不大关心集体了；除了埋头搶工分外，有机会就出外做点买进卖出的小生意，直到1957年还在販小鷄。唐兴发回社以后，虽然没有再做生意，也没有再提过退社的要求，但是合作社每一次分配，他都感到不滿意。他常常想：要不是統購統銷，我想买多少米就买多少，可以囤积十石、二十石、一百石……，要用就用，想吃就吃，粮价漲了就可以賺錢；有了粮食，想喂多少母猪就喂多少；要不到两年，我就能大发家务。有了这些想法，唐兴发兄妹的資本主义思想便日渐严重地滋长起来。他們对于合作社，对于集体也就越来越疏远了；对于統購統銷，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唐兴发兄妹思想上的疙瘩，早被同队的楊全发现了。楊全原是个兵痞，1955年因为破坏生产和偷盜被法院判了徒刑，1957年5月刑滿释放回社后就到处散布反动言論。新民主社刚宣布整风，楊全便乘机煽动唐兴发兄妹：“你1953年为什么被选掉的？”“統購統銷为什么逼着你們卖粮食？”“农民生活还不如劳改队！”“共产党对农民变了心。”这些恶毒的挑拨，触动了

唐玉芳 1953 年落选的“隱痛”，煽起了唐兴发兄妹对干部的不满，也点燃了他們埋藏在心底的自私自利想个人发财的欲望。1957 年 11 月底，大鳴大放开始了。唐兴发兄妹見了干部时总是摆出一付难看的面孔，会上一言不发。在一次全社的鳴放大会上，一个老富裕中农社員恶毒地誣蔑謾罵：“統購統銷搞糟了”，“合作社減產了”，“生活沒有改善”。資本主义个人打算的欲望、楊全的挑拨和这一老富裕中农的謾罵，攪昏了唐兴发兄妹的头脑。他們經不起这些毒箭的内外夹攻，鑽在牛角尖里越鑽越深，終于放出了一連串的錯誤言論。

四

唐兴发兄妹，不管他們自己的言論是否合乎事实，也不管他們放出那些言論以后会有些什么結果，他們越放越有劲；在生产队的会上，在耕作区的会上，一再重复着这些錯誤言論。在一次耕作区的大会上，唐兴发的話刚一住口，楊全就发言了，他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黑暗，連国民党都不如”，以前把他“扣錯了”。接着，反动富农的兒子刘逸清也起来为被鎮压了的特务叔父和当过伪保长、解放后因为破坏生产被扣捕的父亲喊“冤”叫“屈”，說人民政府把他的父亲“扣捕錯了”；并且气势汹汹地要合作社把調換来作办公室的房子退还給他，还要合作社退还他家入社时抵交公积金的竹林。地主、反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唐兴发兄妹为他們的反攻倒算打冲锋。地主、反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是极其险毒的；但是，却激发了唐兴发兄妹的階級覺悟。自从这次大会以后，他

們心里象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捫心自問：“地主、富农現在就要房要树，要是他們真的重新当道，對我們有好处嗎？”“我們分地主的房子、农具家具能够保得住嗎？”“我們在会上說些昧良心的話，不是給地主、富农撑腰嗎？”他們越想越恼，越想越后悔；一連几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渾身难受，活路也不想干。

唐兴发开始知道自己錯了，但是沒有勇气認錯。队里的干部和群众为了帮助他認識錯誤，同他进行了辯論。过去在禾登乡住了几十年、現在又和唐兴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生产队长楊万明，在辯論会上問唐兴发：“解放前你家除了一口烂鍋，借人家一架破床，还有个啥？現在光鋤头就十几把，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土改分的和入社后新添的？”“你說統購統銷把你整惨了，現在你家里一天三頓白米飯，又喂起几头母猪，粮食从哪里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沒有实行統購統銷，場上的大米天天卖，你家为啥不买粮？为啥要吃苕菜当頓？”“你忘記了你父亲怎样死的嗎？忘記了你家老二怎样被拉走的嗎？忘記了你的两个妹妹为什么要嫁出去当童养媳嗎？”同院子住的副社长史良成也問他：“你說共产党不是为农民办事，你家里几口人，解放前挤在一間半烂茅草棚里，現在住的瓦房，又装上了电灯，这些又是哪个給你办的？”……社員們对他摆了許多事实，提了很多問題。这些既尖銳又誠懇的語句，句句刺痛了唐兴发的心，他发现自己忘了本，“忘了恩人共产党！”

为了教育唐兴发和具有同样思想的社員黄基发、周玉发，为了有力地駁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制度的反动謬論，社里征得他本人和家庭的同意，举办

了“三发展覽会”；通过图画、照片和实物，把他們的今昔生活作了一个鮮明的对比。展覽会上，一边是唐兴发家解放前的一頂只剩下吊筋筋、挂綫綫的烂蚊帳，一床破得連猪都鑽得过去的烂棉絮，还有一件筋筋絮絮穿了两代人的破棉袄；另一边是唐兴发解放后新置的棉被、蚊帳、皮鞋、洗脸盆、玻璃鏡子、綫綫衣、卡嘰和嘑嘑衣服……这些只是唐兴发家的一部分，一共就有好几十件，琳琅滿目，象百貨公司的小門市部。这和解放前的东西一比，就是唐兴发生活改善的鉄証。唐兴发自己在这个会上当解說員。參觀的人指着这些实物，用批評而又是同情的口吻問他：“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为啥昧着良心說話？”唐兴发一句話也回答不上来，羞愧地哭了好几場；他只是悔恨地向人們說：“我忘了本，吃水忘了挖井人！”

五

經過辯論和展覽，唐兴发最后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共产党、毛主席不仅把他从旧社会的泥坑里救了出来，不仅使他在經濟上翻了身，而且两次把他从岔道上拉了回来。最后，唐兴发兄妹在社員大会上作了檢討，心里也輕松了。唐兴发一見到干部就說：“共产党挽救了我。要不是这次运动，憑着个人发财和自私自利的資本主义思想，以后还会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当。以后我一定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大道。”

(原載 1958 年 1 月 9 日“四川日报”，
題名“把唐兴发当作一面鏡子”)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紧接着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势如排山倒海。

“叫河水搬家”，便是社里大跃进开始的第一声号角。

叫河水搬家

胡宗礼

离禾登乡三四里远，有座古庙名叫山洪庵。庵前有一条丈把宽的小河，水流常年不断。这条河从庵前流来，围着庵绕了一个大圈，就象一个葫芦的形状，又从庵右流走。据说，这条河是很多年前庙里一个和尚，为了招引香客，特意挖成的。说什么：“在本庵烧香敬神，菩萨就保佑他把用出去的钱，都赚回来，就象这条河，从庵前流走了又从庵后转回来一样。”

传说如此，不必管它。且说这河下流河床过高，流经庵左一片低洼地带，便一年一年地浸漫着沿河的田土，使得附近一百多亩好田，都变成下湿田和冬水田了。每年田里只能种一季庄稼，无论用好多肥料，也得不到好收成。秋收时，田里还积着五六寸深的水，人们在水里捞谷，稀泥溅满一身。收起来的谷子，乌猫皂狗的，有的都生芽了。解放前，富裕农民都不

願在这里做庄稼。附近流传着一首痛心的歌謠：“厰后穷，厰前富，厰子側边出寡妇。”

多少年来，这里祖祖辈辈的农民，多想新开一条河道，把山洪庵前的河水，径直从庵右引到下游去，不讓它糟踐良田。可是在旧社会，那些封建統治者只知道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哪会来管这些事呢！就是解放后，也因为互助組、初級社土地私有，人少力弱，未能动工。現在高級社成立后，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人多力大，才实现了千百年来的愿望，新辟了山洪庵河道，改变了自然的面貌。

1958年2月的一天，鷄才叫过二道，大雪还在飞着，山洪庵新勘好的河道綫上传来一陣急促的脚步声，一群人影向工地奔过来了。开始，人們沒有一个說話的，直到鋤头、铁鍬掘起土来了，这才听见愉快的談笑声：

“喂，这么干不对头呀！天还没亮，人又挤，鋤头沒有长眼睛，出了事故，可不得了呀！”这是一个妇女的口音。

“你回去頂起鍋盖来嘛！”另一个妇女的声音。

“頂鍋盖还不如頂鋪盖。”又一个妇女的声音。

“頂鋪盖还不如轉去睡大觉。”还是一个妇女的声音。紧接着响起一片妇女的哄笑。

“停工，馬上停工！”听得出这是一个年紀較大的妇女，她的嗓音很宏亮。

人們还没有安静。

“叫大家快停工，黄队长要講話。”一个尖声的妇女在喊着。

原来这是社里有名的“女兒队”的队员們。这个生产队里

因为抽調了很多男人到外边参加工业建設等各項工作，剩下的就只有三四十个妇女和几个劳力較差的男人，所以人們便把它叫作了女兒队。但也莫要小看这个女兒队，这三四十个妇女大多数是年輕力壯的，干劲十足，在任何生产竞赛中，不当“状元”也要爭个“榜眼”。

昨天晚上，社里布置了改修山洪庵河道的任务以后，她們私下約好，决定提早出工时间。鷄叫头道，家家户户就把早飯弄好吃了，有孩子的，交給家里的老年人帶，便忙着拿起工具到工地来了。

經過一陣吆喝，她們才漸漸安靜下来。队长黃紀芬敞开了她那宏亮的嗓子，对队员們說：“挖土的人距离一丈，挑土的到了挖土的地方，要先打声招呼。……”

女兒队的工作刚布置好，忽然东北角又来了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談論着：

“看，有人先来了。是哪个队？”

“噦噦噦噦鬧麻了，不看都曉得是女兒队！”

“黃紀芬太不对了，光顧她們爭紅旗，提前出工，不遵守时间！”

“你遵守了？規定的七点鐘开始，現在才五点半呢！”

“算了，人家都挖了半里远了。莫說話，快走！”

人群走攏来了，原来是张孝琼生产队。这队人也不簡單啦！从来，無論日征夜战，他們总是攻艰克險的猛将。哪里工作有困难，就能在哪里找到他們。在竞赛中，这个队常常是女兒队的劲敌。

张孝琼队到了工地，队员們一字长蛇般地散开，各人站好

崗位，展開工作，有條有理。畢竟是個有經驗、有鍛煉的勞動隊伍，一點也不混亂。

這時候快六點半鐘了，因為下雪，天還是那麼迷蒙蒙的。來開河的三十二個生產隊，都提前開工了。打夯聲，挖土聲，各色各樣的勞動聲音，响成一片。長達三四里的工地上，上千的男女社員，挖的挖，担的担，夯的夯，真是熱火朝天。

廣播筒傳出了宏大的喊話聲：“同志們，加油干呀！社里特製了優勝紅旗，誰的成績好，誰就去取它！”果然，在指揮棚的附近，高高地插著一面鮮紅的旗幟，在冷風里呼啦啦地飄揚。

張孝琮隊里的年輕小伙子陶后廷，首先喊起來：“對呀！奪紅旗呀！”

“還奪紅旗呢！看看人家女兒隊，堤埂都壘起尺多高了。”隊長張孝琮提醒他說。

“不要緊，我們趕得過！”陶后廷很有把握地說。

“有竅門嗎？”

“多啦。我們把勞動力調配一下，勞力強的挖土、挑土；勞力弱的，到堤上去夯土。苦戰三小時，負責趕上女兒隊。”

“對！”張孝琮立刻採納了陶后廷提出的具體建議，重新調配勞動力。很快安排就緒，工作又緊張地展開了。這裡只能聽到工具撞擊土石的聲音。陶后廷干得來滿身大汗，熱氣騰騰，雪花飛進他的頸項里，感到怪不好受，索性把衣服脫個精光，只穿一件背心，穿梭一樣把泥土飛運上堤。

三個鐘頭的苦戰過去後，張孝琮隊把河心挖了二尺來深，把堤埂筑了三尺來高，趕到女兒隊的前面去了。

这一来，惊动了邻近的黄光荣队。他们全是一些年轻小伙子，少年气盛，看见张孝琼队这样勇猛，哪能让过。立刻组织人马，创造了一个提土的办法——挑土的人只消把土运到堤边，不用上堤，由夯土的人，弯腰把土提上堤埂。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力，提高了工效。不到一个钟头，河心也挖了将近两尺。

那边女队起先还在庆幸自己来得早、干得多，以为红旗到手定有把握。这时发觉自己快要落后，这才慌了。她们坚持中午不休息，吃过午饭又开干。

就这样你赶我，我追你，做到擦黑时候，这三个队，都先后完成了任务。第一名是张孝琼队，收工早，质量也好。没到吃晚饭，三十三个生产队的开河任务全都完成。这时候，风也停了，天也晴了。仅仅十个小时，一条深达三尺、堤高四尺、长达数里的新河道就完工了。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呀！工地上传来了胜利的歌声。灯光照射在劳动英雄们的脸上，他们都显得那么兴奋、那么愉快。当张孝琼举着大红旗从人丛中穿过的时候，人们的鼓掌声就象打雷一样震荡着整个田野。

当人们向大自然进军，要它俯首听命时，大自然不甘驯服，它在顽强地挣扎。

一场三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洪水，汹涌澎湃地冲来了！

制伏三岔河

周运智口述

1958年的夏秋之交，中稻快要收割的时候，忽然接连下了几天封门大雨，日夜不停，大路上都没人走了。

一天夜里，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门外有人在喊：“周队长，周队长！”

“是哪个？”我翻身坐了起来。

“我，刘元光。”

“啊，是刘乡长。”

刘乡长那时已经下放到我们新联社任副社长了，他负责领导我们这边几个耕作区。现在深夜来叫门，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我连忙披上单衣，下床去开了门。一看，哎，外面好大的雨呀，屋檐水就象吊起一根根的抱龙柱！刘乡长带领着十几个人，浑身都淋湿了。他顾不上进门来，急促地对我说：

“老周，刚才得到报告，三岔河的水涨了。你赶快去喊队员起来防洪，要抓紧时间，要快！”说完，他就带着人从田坎上抄捷路向河边飞跑过去。

听见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记得不久前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我们第一耕作区敢于订出那样高的生产指标，都是靠三岔河给我们撑腰壮胆。要是它不听话，把这一带的稻田淹了，今年的丰产计划眼看就无望了。何况，沿河两岸还住着好几十户人家，河下游又是社里的水电站，还有国家的工厂和铁路。要是遭到损失，……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我喊人堵水去了！”我跨进房门，给我爱人杨世秀打了声招呼，转身便走。

杨世秀跳下床来，一把拉住我，说：“天这么黑，雨这么大，不要去！”

“不行呀，救水如救命，非去不可！”

“缓一下，等天亮再去嘛。”

我知道她最近身体不好，有时候需要我照顾，只好向她解释：“缓不得呀！国家的工厂、铁路，社里的庄稼、电站，社员的性命、财产，缓一步都要受损失！”

杨世秀见我非去不可，拦也拦不住，只好拿来斗笠给我戴上，又给我加上衣服，反复地叮嘱我：“雨大风大，莫着了凉，……”

我点点头，一边扣着衣服，一边向门外跑去。

村前村后响起了当当的大镬声和砰砰的竹梆声。各区队、小队的负责人，冒着狂风暴雨在挨家挨户喊人：“快起来防洪呀！河水翻堤坝啦！……”吼声一片，十分紧张。

我喊了二十多个精强力壮的年轻队员，赶往河边去向刘乡长报到。

来到河边，借着无数支纵横交射的电筒光，一看水场，吓得我伸出了舌头。三岔河里的水好野啊！浑荡荡的全是黄泥汤，就象一锅鲜开的稀饭，扑腾腾地翻过两边堤坝，把河边一带地势稍低的稻田都淹得不見谷穗了！这样大的水灾，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听老年人说，三十六年前（癸亥年），三岔河涨过一次洪水，淹死了百多个人，冲毁了七八千亩田的庄稼。在旧社会，农民受官僚、地主剥削压迫不算，还要遭天灾的打击，一想起就痛心。万不料这场灾祸今天又要落到我们头上来了。我心里实在有些害怕，见了刘乡长时，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刘乡长，这么大……大的水，咋……咋得了？”

刘乡长沉着地说：“不要怕。国民党反动派几百万部队都被我们打垮了，这点自然灾害吓不了我们！”

这时候，河道上游的电话来了，说水又涨了。刘乡长马上给我们分配任务，叫我们去帮河边上那几户人搬家。刘乡长一再指示说：“前些日子就动员过几次了，他们不愿意搬，这一回，一定要把他们搬走。”

我们接受了任务，刚要走，发觉洪水已经把我們包围了。我们站的路，一眨眼，水就淹齐了膝头。刘乡长立即下令：“赶快向高地撤退！”

他顺手在豆地里抽了一根竹棍，带头探路，把我们引出了水障。一路上，我接连蹚了两交，衣服泡湿了，斗笠也被风吹跑了。当时哪还顾得上这些，只是急急忙忙地往那几户人家跑。

跑攏河边，天已經粉粉亮了。洪水越来越大。三、四耕区的社員正在堵塞被洪水冲开的堤埂缺口。副社长曾玉清和女兒队长黃紀芬根本不顧自己有病，带头跳下水去，用身子抵挡洪水。水势十分凶猛，冲得她們东搖西晃，站立不稳。这时其他男女社員赶忙跳下水去接应她們。一个个手挽手，臂套臂，結成了一道人身長堤。就这样，还是挡不住汹涌的洪水。只見缺口越冲越多，越冲越大。河壩上的五座院子立刻就被洪水包围起来，窗口都已淹沒了。这五座院子里住的人正是先前劝不走的那几戶。这时，他們才着急起来。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全都爬上了房頂，拚命地吼叫：“救命呀！救命呀！……”

我們一耕区的人，和那五座院子隔着一片大水。大家又都不会游泳，眼看洪水就要把它吞沒了，也沒法去救。有些社員急得不顧性命地要往水里跳，我連忙把他們拦住了。正在这危急关头，刘乡长来了。他問我們，有沒有会撑船的。一句話把大家提醒了。石德生、石德富两弟兄說：“我們會。”

只是，哪兒去找現成的船呢？大家还是很着急。石德富忽然想起来了，說：“拌桶就好。”

“对！”大家連忙七手八脚地找来了十几只拌桶，划了过去。不到晌午时候，就把这五座院子里的人全部救出来了。总共救了二十几个人、七条肥猪，还有其他农具器物。

趁着休息的片刻，我回家去換衣服。

還沒走攏屋，就看見楊世秀在門口站着，东张西望，滿面愁容。我走过去，对她說：“你身子不好，为啥不进屋去？”

“你不曉得累，也該曉得餓嘛！”她抱怨了两句，馬上又轉

換口气說：“早飯給你弄好了，快去吃吧。”

“水都沒有堵住，还吃飯！快去再拿件衣裳給我換。”我脫下濕透了的衣服，和她走進屋去。

她打開櫃子，翻來翻去，猶豫了一會，最後拿了件爛衣服，帶气地甩給我，說：“只有這件爛衣裳！”

我接過來一看，原來這是一件我解放前穿了几十年的爛棉緊身。我心里忽然起了一種說不出是酸是甜的感觸，好像重逢當年一起受過飢寒的老朋友一樣，很自然地想起了從前的苦難和今天的幸福。它鼓起了我更大的勇氣。

我把它披在身上，放腿就跑。楊世秀在後面喊我吃飯，我也沒有理她。

跑到河邊，才知道原來的防洪計劃，這時已經改變了。先前是堵塞洪水沖崩了的堤埂缺口，這個辦法有缺點。因為水勢越來越大，舊堤經不住沖擊，這裡砌好，那裡又沖開了；同時，舊堤太矮，管不住高漲的洪水。所以，領導上決定，在舊堤外面重築新堤。這樣有個好處：河床寬了，水勢就緩慢了。這時，暑假教師講習會的一百多個男女青年教師，也支援我們堵水來了。全體防洪人員就有七八百人了，還怕它有天大的困難！

大雨一直沒有停過，我們也一直堅持着防洪戰鬥。砍芭茅，抱谷草，担土巴，運石頭，……硬是人多好辦事。象銅牆鐵壁似的新堤，看着看着就逐漸升高加長了。教師們一邊勞動，一邊給我們作小型的文娛表演。歌聲和笑聲把雨聲和水聲都蓋過了。人們一點也不感覺勞累。不到擦黑時候，新堤大體上築成，剩下不多一點了。這時河水也消退了一些。劉鄉長

和社干部們檢查了工程，叫大家分批回家吃飯。

我的爛棉緊身又濕透了，一停工下來，身上就冷得發抖；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於是，也抽這個空子回家去了。

這次回去，楊世秀不再象前次那樣嘟起嘴巴了，只是驚嘆地說：

“我剛才去看了，好大的水啊！”

“是啊。要是在解放前，還不曉得淹死好多人，沖壞好多莊稼呢！”

楊世秀把熱騰騰的飯菜給我擺在桌上。我趕緊脫下濕衣服，狼吞虎咽地、一碗又一碗地吃着飯。忽然身上多了一件衣服，感到暖和起來了。轉身一看，楊世秀半嗔半笑地在我身後站着。我再把衣服一拉，發覺竟是一件新棉衣。我一方面感到驚異，一方面又有些懷疑，便對楊世秀說：

“我還要出去築堤啊！”

“去嘛，哪個攔你啦！”

“這件新棉衣，春節才穿過三天呀！……”

“看你，拿舊衣裳你嫌舊，拿新衣裳你又嫌新，硬是難將就！”

“我是說我還要出去，你舍得讓我穿新衣裳？”

“有啥舍不得的？人家劉鄉長和好多人、社員，都在雨壩頭搞了一天，有些人還不也是穿的新衣裳，人家也沒有顧惜。為了件衣裳，把你凍壞了咋得了！”

我見她不但不再攔我，而且还鼓勵我去，心里真高興！我又多干了兩大碗飯，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才回到工地去。

天刚断黑不久，我們的新堤完全筑成了。洪水被管住后，稻田里的谷穗又現出来了。这时，广播筒里传出防洪指揮部的指示，命令全部停工，各归原地听候調动。我們这个队因为靠河近，被派值守夜班，严密監視水位涨落，有情况就向指揮部彙报。

这天夜里，我把队上守夜的十二个人分成六班，轮流巡邏，監視水位涨落。沒有灯亮，我們就用竹竿鋸成标尺，插在水里。看水的人，只消用手摸摸上面的鋸痕就知道水的涨落了。这样防守到下半夜，雨又下大了，河水又吼了起来。我們六班人都不敢睡，就圍在那根竹竿旁边摸标尺上的鋸痕。你摸一下，我摸一下，深怕它多淹一个“刻刻”。当我們正准备去向刘乡长彙报水位情况时，刘乡长恰好来了。他告訴我們：“刚才得到上游头的电话，水势可能还要上涨。已經通知了全体防洪人員，打早上工，把河堤普遍加高到四尺。”

他的話還沒說完，河堤上下，人声喧騰，各队已經出工来了。

近千的人又战斗了一个白天，终于把三岔河的洪水制伏住了。保住了沿河几千亩良田、几百戶人家和电站、工厂、铁路……。旧社会无法抵抗的天灾，被我們战胜了！

(宗 礼記录)

大跃进中，人們不仅改修了河道，战胜了洪水，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单以积肥运动来說，在短短的几天時間內，每戶社員平均就积了几万斤以上的糞。在“除七害”运动中，全社动员，一齐吆喝，一举就歼灭了几万只麻雀（社里所創造的这个“围剿麻雀”的战术，当时曾被拍成了新聞紀錄片，在全国推广）。各式各样的小型工厂兴建起来了。全民炼鋼运动也搞开了。兽医院建立起来了。广播网建立起来了。鼓动詩、画、标語遍布全社。……所有这一切都紧紧圍繞着农业战綫上的網——爭取亩产双千斤！

早稻的丰收，使亩产双千斤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驗 收

樊次尊口述

地委早稻驗收团到新民社的前一天，喜信就传遍了全社各队。社員們一听见，没有一个不欢天喜地。大家猜想地委一定有負責同志来，都說：“地委到我們社里来驗收，是党重視我們社里的生产。”在大跃进中得到上級党委这样的关怀和鼓舞，大家更加提高了劳动热情。

第二天一早，黨支書陳浩東就來找七耕區生產隊長黃常友。老黃這時候正在放牛。

陳支書一看見他，就問：“黃隊長，你曉得不？等一會，地委驗收團要來驗收我們的早稻啦。”

黃常友回答說：“早聽說了。”

“那就在你這個隊驗收吧！”

老黃是個踏實的人，聽了這話，大吃一驚：“啥？”

陳支書懂得他的心事，笑着問：“你害怕啦？”

黃常友把眉頭一皺：“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這個時候來！”

“這時候來，有啥不好？”

“陳支書，你又不是不曉得，看嘛，好谷子都打完了，這幾塊田的早谷栽得遲，收成孬，咋好意思給他們驗收？就是待客，也要上樣好菜嘛。”

“不要緊，好好孬孬都要待客。現在各隊的早稻都收完了，就只有你們隊上還有幾塊栽得遲的。你看，挑哪一塊合適？”

陳支書越說越認真，黃常友越聽越心緊。他問：“陳書記，他們咋個驗收法？”

“他們要親自割，親自打，親自過秤，親自划碼，親自結算。”

黃常友苦惱地搔搔頭髮，說：“噢，這麼硬嘍！”

陳支書還是笑嘻嘻地催問道：“莫說閑話了。你看挑哪塊田？”

黃常友遲疑地說：“挑一塊好田對不對呀？”

陈支書忍不住笑了，心想：“剩下这几块早稻田都是孬的，哪来的好田呀！”但他还是顺着老黄的意思，說：“对，孬中选好吧。不过，要挑小一点的，半天就能打完的田。他們驗收了，还要赶回去。”

黄常友想了一陣，說：“好嘛，那就挑那块一亩六分六厘的小田。”

“对，就这样决定。你把队上的镰刀、拌桶都准备好。他們馬上就要攏了。”陈支書說完，就回社上吃早飯去了。

黄常友这早晨，端碗飯都忘記了往嘴里刨，呆坐在飯桌上，悶起不开腔。他心里乱翻翻地想着：“那几天每亩打一千七八百斤，他們不来驗收，偏偏把好的打完了，留下这几块迟谷子田，要来驗收了。这些田只怕連一千斤也收不起来。这不給我們新民社丢臉嗎？”他越想越煩躁，把筷子一放，心头的話不覺从嘴里冒出来了：“真冤枉！盖面肉放到碗底下去了。”

他那个七岁的小女兒不懂事，听了她爸爸的話，拿筷子指着菜碗說：“爸爸，你看錯了。肉都在碗上面呀！”把黄常友弄得笑也不是，气也不是。

就在这天(1958年7月28日)上午八点鐘，黄常友生产队那块一亩六分六厘的早稻田周围，挤滿了看驗收的人，把田埂都踩垮了。由温江专区各县、社代表組成的地委驗收团的人員，拿起镰刀，抬起拌桶，下田开始收割。摄影师胸前吊着相机，围着田埂到处轉，忙着找镜头。新聞記者蹲在田埂上；拉着社里的干部，在采訪早稻丰收的經驗。广播电台的录音員手忙脚乱地在准备录音。人們指手划脚地談論着，大家都

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把丰收的喜讯，传播得更远，传递给更多的人。

地委验收团团长申部长，问站在他旁边的黄常友：“黄队长，你这块田能打多少斤呀？”

黄常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多了，怕打不够，当面丢底；说少了，脸没处放，给社里丢丑。谷子在田里，还没有过秤，哪个拿得准？这才叫左右为难！他把脑壳儿摸，回答说：“大致就是那个……千斤不远吧？”

申部长听他说完，忽然打了个哈哈。黄常友的脸，刷一下就红了。可是申部长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笑着说：“这么好的谷子还打不到一千斤呀？我看千斤要出头。黄队长，你太谦虚了。”

老黄听了，心里一高兴，也似乎相信真的能打一千多斤了。趁此机会，他向客人约略露了点风色：“申部长，这块田好啥啊，那几天我们社里打的谷子才好哟……”他本想再说几句，另外一件事把他的话打断了。

验收团里有一位新津县的代表，一下田，就忙着比窝距，量行距，仔仔细细地在数每窝谷子的穗数和每穗谷子的颗数。这时候，他忽然敞开喉咙喊起来了：“你们看！一窝有十三四根谷穗，一穗有一百五十多颗。比我们种的试验田要好一半多呀！”

他旁边一位同志搭腔了：“我和你打赌！”

“打赌就打赌。一千斤，我占外，你占内。”

那人把头一掉说：“那我才不干呢。”

黄常友在旁边听入神了。一点钟前，他心里还象吃了干

碌一样，辣呼呼的；这时候他心里好象吃了一块冰糖，变得甜滋滋的了。

割谷声，打谷声，嚓嚓嚓，蓬蓬蓬，响成一片。金黄放亮的谷子，一挑一挑送到地边来过秤。这道手續很严格：一人过秤，一人监秤，一人报数，一人划碼，一人記賬。申部长亲自掌秤，不許秤杆有半点高低。其余的工作，全都是驗收团来的人負責，認真极了。还有丈量田亩的工作，才更精細呢。四五个人下田，牵着軟尺，比了又算，算了又比，一共丈量了三次。前一次，丈多了，复丈两次，才算精确，确实是一亩六分六厘。……

果真是人多力量大，半天时间，谷子打完了，秤也过完了，划碼的和記賬的对了对子，沒有差错。記賬的人就高声向群众宣布：“除了籬篲和水气，亩产净重一千另四十八斤！”

象打雷一样，田野里立刻响起一阵掌声。黄常友这才松了口气，心里在說：“看不出这块田能打这么多！莫非我还有二分保守啦？”

这时，他的两只手突然被申部长抓住了。申部长兴奋地說：“黄队长，我代表驗收团，庆賀你們的早稻丰产！”

黄常友明白这是該解释的时候了。他向申部长說：“我們这块田栽得迟，在社里大检查的时候，曾經被評作三类苗，后来加了把劲才有現在这个样子。那几天打好谷子，可惜你們沒有来看。四耕作区有几亩田，每亩收了二千四百多斤。黄紀芬领导的女兒队，有六亩田，都是打的二千二百多斤。一般的田，也是亩产一千六七，比这块田好到哪里去了！”

“黄队长，請把早稻丰产的經驗，向大家介紹一下。”群众

一边鼓掌，一边吼着。

当着首长面前向群众讲话，在黄常友的经历中，还是头一回。但是他这时并不害怕。他往田埂上一站，高声发言了：“我们今年早稻得到丰产，是全体社员的努力，是党的总路线的鼓舞。我们没有多的经验，只是听了党的话，鼓干劲，争上游，破除保守思想，采用新式耕作方法，才得到这次丰收的。我们的丰收，是党的光荣！”

田野上响起鼓掌声和欢呼声，一阵盖过一阵。

“听党的话就能永远得到胜利！”

“光荣归于伟大的共产党！”

群众的口号声，五里外也能听见。

一月以后，在新民社办公室里，罗世发社长翻阅一份刚刚整理出来的材料。封面上写着“新民社 1958 年早稻丰产经验总结”，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本年度全社早稻亩产，已经突破千斤关了！

（宗 礼记录）

“人民公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經濟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产物。”

——摘自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食堂飯菜香

馬佩璣口述

大跃进以来，社員們那股干劲簡直沒法形容。說声积肥，一夜就堆起几匹大山；說声改河，两天就开出一条河道；說声栽秧，就跳下田；說声炼鉄，就跑上山；……啥事都是搶着干，越困难越搶得凶，越搞得起劲。不管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白天黑夜地干，拦也拦不住，劝也劝不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搶着担水送粪下田。十二三岁的小娃兒偷跑上山去运煤背矿。男人們忙得来忘記了回家。女人們忙得来顧不上煮飯。

这可把社里的領導同志們急坏了。別的不說，首先吃飯就是个最大的問題。由于妇女們都想在外面多搞一会儿活路，原来一天燒三次火的，現在改成三天燒一次火；要不就兩頓合成一頓吃。有时候，飯煮好了，男人們怕耽擱時間，又不

肯回来吃，只好送到工地上去。路上一走，田边一擱，飯菜都凉了。“人是鉄，飯是鋼”，大跃进又不是三天两天的事，长此下去咋行呢？

恰巧在这时候，副社长曾玉清到北川县去开了現場會議轉来，說那里有些社已經办起了公共食堂。社长罗世发从县里开会回来，也說这个办法要得，可以推广。社委会一研究，决定我們也办公共食堂，先在女兒队搞个試点。这是1958年8月轉人民公社以前的事。

罗社长告訴我，說社上已經决定要我当这个食堂的事务长。我一听就发愁了，心想：“我家里才两个娃兒，吃飯都常常打架，全队在一起开伙食，怕把角都要打掉呢！过去評工分还有人爭高論矮，現在合起来吃飯，多啦少啦，咋弄得好？再說，一个家庭妇女弄上七八个人的飯，就要忙得出不了大門，現在煮一两百人的飯，三四个炊事員，一天到晚忙得毛根不沾背，只怕也煮不出来！”我越想越不敢接这个担子，便去找专管生活福利工作的曾副社长，談了我的这些顧慮。

曾副社长也沒有向我講啥子大道理，只問我：“你觉得該不該搞嘛？”

我說：“該搞。”

“那就对了。既然該搞，有困难就要克服，拿出大跃进的劲头来！”

我还能再說啥呢？大跃进当中，誰沒有遇到过困难？誰又沒有克服过困难？干吧，我同意了。

曾副社长知道我信心不足，又对我說：“可以先搞两个小食堂，試几天再說。你搞你們那个院子，我搞我們这个院子；

搞好了，然后再合起来搞全队的。”

說定了以后，我們就分头准备去了。

我們院子这个食堂，虽然只有七八戶人，可是一开头就碰到了很多麻煩。米要从各家拿来，吃多少拿多少，吃一天拿一天，煮好了再分；分的时候份量很难掌握，分多了怕不够，分少了人家有意見。菜是各家自留地里种的，不能随便去挖；而且各家菜蔬的好孬、油盐的多少都不一样，只好各吃各。这样一来，人家要做点菜吧，又要烧鍋耽擱時間，食堂就起不到节省劳力的作用；不做吧，有泡菜的还能吃点泡菜，沒有泡菜的只好吃“粘眼飯”。柴的問題更不好办。川西壩子树山少，柴很精貴。沒有柴的过去都是由社上分，不够时还要自己去买，哪有給食堂的；有柴的要留着自己烧水做菜，也不願拿到食堂来；柴多的倒肯拿出来，不过要給現錢才行，有些人就为了这点，宁願把柴拿到場上去卖也不給食堂。米、菜、柴，这三样就把我們难坏了。另外，还有个問題，炊事員忙得来連屋头的猪也沒時間喂，这都不說，結果还是吃力不討好，工分沒有着落，要减少收入。队上开会的时候，队长黄紀芬也提过，要求搭伙的按人口給炊事員提点工分，作为報酬。可是，她这話才說出口，就有人反对。

社員郎延章說：“喲，我們有好多工分来支銷呀？我家里七八个人，能劳动的大人少，光吃飯的娃兒多。讀書要工分，幼兒園要工分，托兒所要工分，現在参加食堂也要工分，我哪来那么多工分給？这个食堂，我不参加都要得。”

熊富春也說：“我屋头一年分的粮食刚够吃，請不起人煮飯。”

这些话也是实情。那时候，人口多、劳力少的人，生活就是要紧一些。当时大家都觉得左右为难，没法解决。这个食堂只搞了几天就垮台了。

曾副社长她们那个食堂呢？问题也是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曾副社长肯舍己待人。开初几天烧的柴全是她拿出来的。这就带动了群众，把这个食堂支撑下来了。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大跃进的规模越来越浩大，生产任务越来越繁重。9月间，社里陆续抽调了一千多个主要劳动力，到一百多里以外的彭县大宝山去炼铁。农业上又展开了突击四秋的运动，不仅要顶起走了的人的工作全部顶起来，而且要作出更大的成绩。为了应付这种紧张局面，社里搞了一段时间的大兵团作战。这一来，公共食堂更加非办不可了。社委会除了叫各个生产队普遍试办一两个小食堂以外，还决定在我们女儿队搞一个全队的大食堂，而且立刻就要搞起来。

任务是这样重要，又是这样艰巨，我更抓不到边了。幸好曾副社长、黄队长她们把这个担子承住了。她们先召开了党、团员会议，作了动员。然后，又接连开了三次队员大会，进行酝酿。党员同志们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真叫人感动！食堂要房子，黄队长说：“我让。”她这个人性子急，说了就干。马上三下两下就把房子腾空，搬到一处又远又烂的房子去了。接着，又带着社员连熬了三个通宵，把食堂修整归一。食堂要用具，曾副社长、黄队长把自己的锅灶拆了，把所有的用具都给了食堂。食堂要菜，她们和龔次尊、鍾品三等另外几个党员同志，把自己菜园地里种的菜，全部挖出来送给食堂。食堂要

柴，也是她們几个和馮恩云老汉等先投資了一批。……她們一带头，积极分子一支持，少数不同意的人也就沒有話說了。

大食堂办起来了。开头我們这个队加上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共有二百多人吃飯。我和三个炊事員有生以来第一次搞这样的大伙食，心里当然很紧张。但是一看到党员、社干們这样热心，劲头也就大了。头一夜我們沒有睡覺，又有好多人自动跑来帮忙，一早就把飯煮好了，还做了几样好菜。社員們吃得都很滿意，我們心里也很高兴。

过了几天，老問題又来了。菜呀、柴呀，又沒有了。幸好，这时候社里正在分第二批谷子，又分了中秋节的过节費。大家同意集中留在食堂里，作为基金。这样，食堂才暂时稳定下来。但是以后咋个解决这些具体問題，大家心里都沒得个底底。

嗨，就在这时候，人民公社在各地紛紛搞起来了。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我們这里开始宣传轉人民公社的时候，社員們一个个笑得来嘴都合不攏了。对于少数有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农民來說，这一回算是把那点尾巴也割掉了。他們要完全憑劳动、靠集体吃飯，不能再打自己的小算盘了，生产积极性也就可以發揮出来了。

那一向，人們一見了面总是在摆这件事。都說：“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

我們几个炊事人員，也喜欢极了。过去食堂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有些根本就不存在了，还有些也很容易就解决了。因为大家都不斤斤計較了。好象万德全，一次就拿出了一千多

斤柴；任維三有两間破房子，本来准备拆了当柴卖的，現在也投資到食堂来了；謝貴珍沒有柴，也自动地交了四元錢来；……这家摘菜，那家拿柴，搶着往食堂送；鍋瓢碗盞、桌椅板凳，硬是要啥有啥。

当然罗，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風順了。十根指拇还不一样长呢，几百个搭伙的人里头咋会沒有几个扯客？

公社成立，吃飯不要錢以后，有些覺悟不高的社員以为反正不是吃自己的，就拚命地死撑死胀，这还不說；最可惜的是乱糟蹋粮食，大碗大碗地剩，大碗大碗地倒。社委会觉得这样浪費要不得，就教育他們要愛社如家，要体念粮食来得不易。又号召大家，把自己在田边地角种的紅苕投資一部分到食堂来，粗粮細粮兼搭着吃；过去已經分給各家的粮食既不要大家退，以后吃的杂粮也由社上来种。社員們都很贊成。

有的說：“都是理家过日子的人，应该曉得精打細算。‘一頓吃光，十頓喝湯’，那不成了敗家子了？会吃，要吃个‘长流水’。”

有的說：“要想想过去‘家无隔夜粮’的日子；那陣，一到了青黃不接的时候，野菜都要拿来当頓。現在粮食虽多，也该‘积谷防荒’，存点起来。会吃，要吃个‘老来紅’。”……大家都把紅苕拿来投資了；食堂的細粮也改成了定量供应，按肚皮大小，以吃飽为原則。

有些富裕戶，本来打算“碗里留下到鍋里搶”的，这一下，鍋里既搶不到了，还要拿一部分紅苕出来，心里当然一百二十个不願意。可是，大家都贊成，自己也不好反对。于是就找机会出气。

有一回，我們蒸紅苕干飯，稍稍有点夹生。黃建章的女人就坐在廚房門坎上，扯七扯八地罵开了：“我肯信把碓窩抬上灶了，煮頓飯都煮不好！”

旁边又有个人搭腔了：“就是当掌墨师当了这么久，也该把綫弹端了嘛。”

当时，炊事員馮三娘都气哭了，不想干了。我們心里也很不痛快。后来，还是曾副社长来劝了一阵，說：“这頓沒有煮好，二頓煮好就是了嘛。只要想想集体食堂給生产上带来的好处，就不会动搖了。”

黃建章的兒媳婦刘明秀也来劝馮三娘：“我們当媳婦的，就晓得做飯菜的艰难。馱了硬了，咸了淡了，常挨公婆的罵。‘爬过高山峭，曉得平地妙’。大家都說食堂办得好，你不要为一个把人忧气。”

这样，我們才沒有消极，决心好好干下去。

那些想“碗里留下到鍋里搶”的富裕戶，过后也漸漸明白我們提倡吃“长流水”是做对了。我們附近有个別公社，由于吃粮沒计划，开头大量浪費，农闲时又吃翻了山，一到今年春夏天农忙来了，青黄不接，反而紧火了。而我們呢？农闲时多吃粗粮少吃米，农忙时就頓頓吃白米飯，比社員往年自己开伙吃得好。而且我們全耕作区（就是我們原来这个高級社）还积存下了很多粮食；为了支援灾区，今年我們就多卖了几十万斤谷子和麦子，超过国家統購任务的好几倍。

食堂一步步地改善。我們貫徹了“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則，社員們可以分回去吃，也可以把吃不完的粗、細粮拿回家去存起。最近，我們又把原来两三百人的大食堂分成了两个，

使它能办得更好一些。

食堂办好了，所有的人都高兴了。最高兴的是妇女，她们简直喜欢得升天了。

有的说：“过去‘围到锅边转，吃点锅巴饭’的日子，这一下丢到大河里去了。妇女也能安安心心出来搞生产了。”

有的说：“过去妇女真恼火，当媳妇的更受气。成天忙得要死，动不动还要听公婆的闲话，啥子‘镲靠鼓，鼓靠镲，哪有媳妇靠公婆’呀，吃饭都不准你坐一桌。所以说‘变麻雀都要变公的’嘛。这一下哪个吃哪个的？都是吃公社的，都是吃自己的。”

.....

食堂不光是解决了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贫困户的根本问题，还彻底解放了广大妇女的劳动力。不过，要不是办了人民公社，再咋个说，食堂都不容易搞好。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硬是好，好，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

我们世世代代都忘不了1958年国庆节这一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全乡四十二个高级社合并转成了新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让我们看看冯恩云老汉对于人民公社是如何的热爱吧！

冯恩云老汉

黄纪芬口述

1958年9月，我们这里开始宣传成立人民公社以后，群众的那股干劲，真是火上浇油，冲破了天！白天干活路搞忘了吃饭，夜晚还要打起火把干，照得天地通红。无论炼铁，积肥，修水利，办工业，只要社干们一开口，群众就象百鸟朝王一样，都跟上来了。特别是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想到公社化的好处更是事事在前，样样不落人后，争取这个真正的人间天堂早日建成。

这里只说我们队里的冯恩云老汉。社干部为了照顾他年岁大，不让他参加夜战，他就自动起早摸黑地去拣粪。筐筐拣满了，他就倒在社上的公粪坑里，一不让人知道，二不要工分。无论刮风下雨，他从未停止过。

有一天，副社长曾玉清碰到了他，问：“冯大爷，你咋个天

天都在拣粪呀？”

馮恩云笑嘻嘻地說：“以实际行动迎接人民公社嘛，我干不了重活路，也不能坐着等公社呀！”

曾玉清說：“可也要注意休息呀，每天不要起得太早了。”

馮恩云忙解釋說：“我年岁大了，早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筋骨痛，不如起来轉轉，倒舒服些。”說着，他就溜到別处拣粪去了，因为他怕曾副社长为了照顧他的身体，扣留他的粪筐。

有一天落雨；他出去拣粪，淋得跟落湯鷄一样，回来碰到几个青年人跟他开玩笑：“馮大爷今天洗了个淋浴，开了个洋葷。”

馮恩云不懂啥叫淋浴，又把洋葷听成了羊粪，听口气只觉他們对自己的工作不够重視，就認真地教訓起他們来：“啥子羊粪牛粪？沒得大粪，餓得你們認不到家門！”

青年人故意要逗老头子，都嘻嘻哈哈地說：“馬上就要成立公共食堂，不怕餓飯了。”

馮老汉觉得这些青年人的思想很成問題，說：“成立食堂也要鍋里有碗里才有呀。你們不重視积肥，二天粮食会从天上掉下来？”

小伙子們見老头子真的生气了，一个个都縱声大笑，指着田边地角一堆堆象小山似的堆肥，說：“我們的粮食倒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要从山上长出来。”

馮老汉知道那些青年人只用几个夜晚，就积了那么多堆肥以后，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不久，队上成立了公共食堂。他看到食堂里沒柴烧，忙把自己屋头的柴柴棒棒、破家具、烂板子找来劈开砍断，弄了三

四百斤干柴，一挑一挑地全送到食堂里去。个别思想落后点的社员还说：“这老汉真好，也不留点后路，万一二天食堂垮了，看他烧腿杆！”

馮恩云老汉一听到这些风言冷語，气得火冒三丈：“誰說食堂会垮？沒柴烧，烧我的腿杆也不能讓食堂垮！”

馮恩云这样拥护公社，爱护食堂，是有原因的。在这以前，他一天到晚，忙得了社上的，丢下了屋头的；忙了灶上的，丢了灶下的；經佑了菜园子，又沒時間去担水拣柴；另外，每隔十天半月还得亲自去赶一次場，打油、称盐……各种家务事，急得他团团轉。他带着一个过繼来的小兒子，忙得三天难吃两頓热飯。你想，公社化了，不为吃飯操心了，他怎不积极拥护呢！

公社成立以后，把他送到敬老院。一进敬老院，就发給他一床崭新的花鋪盖。他竟激动地抱着被子哭了起来。人們問他哭啥，他說：“我活了七十多岁啦，連拜堂成亲也沒盖过这样好的棉被……”的确，說起来伤心，他不但沒盖过这样好的棉被，七十几年来，連一双棉鞋也沒穿过呵！

記得解放前两年，馮恩云的兒子害了重病。俗話說：“穷人怕害病，病了就要命！”馮恩云沒錢給兒子医病，便把一些破烂家具碗盞都拿到街上卖了。但是，那又能卖得到几个錢呢？家具卖完了，沒錢請医生看病抓藥，他的兒子就活生生地被病拖死了。兒子刚死不久，媳妇和孙兒又病死了。紧接着老伴也病死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馮恩云就成了一个孤老头兒。就在这时，狼心狗肺的地主又把馮恩云佃他的二亩田的谷子連谷草一齐搶去了。那时候，他一天到晚見到人就向人哭訴：

見不到人就跑到老伴和兒子的坟上去哭；有时做着做着活路就哭起来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硬是天天用眼泪水洗脸呀！已經这样苦了，那个沒有人性的富农刘东海还要挖苦他，說：“哭啥子嘛。一根棒棒，一个筐筐，包你餓不死（当討口子的意思）！”你說混賬不混賬！

一些穷乡亲们，天天劝說馮老汉想开点，他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道：“我还有啥子活头嘛！二天看在老乡亲的份上，不讓我的肉烂在床上，我就感恩了……”

在乡亲們的帮助和劝說下，馮恩云沒有死，他熬出来了。1949年12月底，共产党、解放軍来到了川西壩子。从此，农民都翻了身，看見了太阳。在四大运动中，馮老汉因为积极工作，先后被选为农民代表和土改代表。那陣，他虽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还是和年輕人一样日夜監視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和他們进行斗争。土改结束后，他又自动把分来的果实錢拿出来購買农具，和曾玉清等六戶貧雇农在一起組織互助組，走党所指引的互助合作的道路。

現在，他进了公社的敬老院，不但吃得飽，住得好，穿上了新棉袄新棉褲，前一晌又因为他在生产上积极主动，被大伙評为五級工，每月領三元錢的工資。娃兒在食堂里吃飯，学校里讀書，啥也不用他操心。他自己也說：“过去愁吃，愁穿，愁住，愁死了沒人埋，烂在床上。現在啥子都不愁，只愁活路做的少，对不起公社，对不起毛主席。”

这老汉硬是說到做到，不放空炮。他虽然住在敬老院里，但还是想尽办法干活。一天到晚，丢了鋤头就拿起镰刀；丢了粪筐就担起粪桶；从沒見他閑起过。別的不說，光說他种的菜

园地吧。他种的蓮花白又大个又鮮嫩；他經佑的黃瓜最先爬架，开花，結瓜；別人的海椒才刚栽秧秧，他的海椒都开花花了。我們食堂里吃的凉拌嫩黃瓜、醋炒蓮花白都是他种的。

馮恩云老汉不但种菜种得好，庄稼活路也是有一手的。栽秧打谷，犁田耙土，样样得行。特别是扯秧子，全社沒有一个个人比他扯得更好的。还会編一手好夹背(类似背篋)。真是說人人勤快，說活路活路做到家，为人又公正，沒有一点歪心眼。全社的大人小孩，沒一个不說这老汉好的。所以，今年过春节时大家給他送了付对联：

年逾七旬做庄稼給劳动人民树榜样；
肩挑百斤搞建設为共产主义架金桥！

人民公社剛成立不久，社里第一個居民點的第一幢大樓也蓋好了。真是“辦公社蒸蒸日上，住大樓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王世全口述

姜太公八十三歲遇文王，我老漢八十三歲住樓房，都是老來紅。

從前，我們這川西壩子，木料少人工貴，一般地主住的房子，也不過是瓦頂泥牆；庄稼人的房子，麥草壓得緊實點，夾壁濕得不透風，就算不錯了，誰還住過這“滴水檐三丈高”的磚瓦樓房？莫說住，就是作夢也沒夢到過這三十二根大磚柱、一百六十八扇通明的玻璃窗、紅欄杆、綠門框、粉白壁頭亮又光的高大樓房！可是，去年公社一成立，我們的第一個居民點便動工了。春節前，經過社員推選，四十幾家人住進了這第一座樓房，連我這住了八十幾年爛草房的老漢，也沾上了光。

修這座大樓，磚是自己燒的，瓦是自己做的，木料是自己湊的，人工就更不用說了，社上有的是手藝人。修下來，除了窗子上的玻璃、釘椽子的釘子是買的以外，其它啥都沒花錢。

真可算得是白手起家！

这座楼原本去年八月就动工了，可是，那时候秋收很忙，社里又抽了很多人上山炼铁，只好停下来了。秋收后，劳动力松动了，才加工紧火地干起来；六十几天就修好了。腊月二十八举行了落成典礼，请县委曹书记来剪了彩，我们这些住戶就搬进来了。社員們还給每家門上貼了对联。有些对联写得真确切、真好！比如，給罗世发写的是：“一顆紅心交給党；万般辛苦为社員！”給史良成写的是：“夫唱妇随喜获庆祝丰收双胎子；男耕女織再把高产卫星放出来！”（“庆祝、丰收”是史良成的双胎子女的名字）給曾玉清写的是：“有始有終走互助合作道路；任劳任怨为社員福利操心！”給黃紀芬写的是：“带头上紅榜喜奏女兒队；永不下火綫愧煞花木兰！”給盖大楼的木工师傅写的是：“盖大楼汗珠滾滾；住新房喜气洋洋！”給泥水工写的是：“千砖万瓦盖大厦；一家四口住新房！”給漆工写的是：“工农商学兵合或五位一体；紅黃藍白黑繪出万紫千紅！”給新婚的教师写的是：“想当初白手办学经历了千辛万苦；喜今宵藍田种玉还需要細作精耕！”給幼兒園保育員写的是：“培养下一代；寬慰父母心！”横額是：“孃孃真好！”給修大楼的设计师两夫妇写的是：“設計繪圖盖好大楼人人滿意；量体裁衣縫成新装个个称心！”（女的是社里的縫紉工）給保管員馮昌义、炊事員馮三娘老两口子写的是：“三頓飯保証你吃飽吃好；万座仓管叫它无灾无虫！”給軍屬写的是：“這子參軍当仁不讓；辛勤劳动愛社如家！”給殘廢軍人写的是：“參軍赴朝为国捐肢体；务农回家向社献赤心！”給我写的是：“蒼松翠柏永不敗；白发轉青老來紅！”給客房写的是：“缺点請指正讓我們少

走彎路；經驗望介紹留同志多住几天！”另外还有很多一般的，象：“东风起預报丰收喜訊；春水来倍增新居风光！”“登高望远前途无限好；除旧迎新幸福万年长！”……一共有一百多付，抄也抄不完。

我們刚搬进来的那天晚上，說起来也笑人，不曉得是我們这些庄稼汉享不来福呢，还是恋旧詫生？好多人一夜都睡不着觉。我虽說是八十几岁的人了，但經常只要白天在地头干了点活，夜晚一上床，瞌睡就和年輕人一样香得很。搬房子那天，我也拿东抱西的忙了一下午，照說該有一觉好瞌睡的，但鬧到半夜才上床还是睡不着。不是觉着新木料和油漆的香味扑鼻子，就是閉上眼睛还觉着滿屋是白晃晃的一片。我虽是睡不着，到底有了点年紀，还是本本分分地睡在床上养神。年輕人可就不同了，睡不着就爬起来滿楼轉，这边跑了又跑那边，这家房里去打个哈哈，又到那家房里去說几句趣話。滿楼踢踢通通、嘻嘻哈哈一片响，鬧得天翻地复。都半夜过了，女兒队的队长黃紀芬、副队长陈玉芳还把曾玉清拖到她們房里去，要曾玉清給她們出主意，看該添置些什么东西才和新房子配得上。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上午社里发了双工資。陈玉芳拿到工資就往街上跑，又是买水瓶，又是选茶杯。百貨商店里，扯衣料的，买胶鞋的，真是挤得个水泄不通；光是新民大楼的住戶，那一天就从街上抱回来八床新鋪盖，六床新毯子，十几个暖水瓶……要在十年前，就是把这些东西实实在在摆在我面前，我也不敢說它是我們农民买得起的。

我們修新民大楼的这片地方，解放前是有名的万家巷子。

不过，那时不是今天的美名，是穷得有名，野得有名。“慈竹林，乱葬坟，太阳才落坡，野鬼就撵人！”这就是那个时候万家巷子的景象。住在这一带的十来户人家，沒一家的日子过得不惨道的。就說女兒队副队长徐繼英吧，她那时住在現在我們修洗澡塘那地方的一間破草房里。她的身世你也曉得，就不說了。那时候，她們两叔嫂一年四季忙得不敢閑耍一天，吃不飽、穿不好不說，到年三十晚上还要跑出去躲賬。所以社員們給她写的对联是：“住万家巷子时节年年凄风苦雨；走社会主义道路天天紅火太阳！”

曾玉清在解放前沒有分家的时候，算是稍好一点的，自己有几亩田，但是田里收的东西，也是顧了穿就顧不了吃，每到年尾，屁股后面总少不了一大群債主子。解放前一年的腊月三十那天，她家好容易弄了两个土布来卖了，买了点米，买了点肉，打算一家人吃頓团年飯。哪曉得肉还在鍋里煮着，債主子就来了，有的走后門，有的走前門，堵人逼賬，来势很凶。曾玉清的老人公得到信就穿林盪跑了，要賬的人沒堵住，就把曾玉清和她大嫂两妯娌挡着。又把鋪盖行李盘来，在她家堂屋里摆起鋪睡着收。提起这些日子，不消說，倒不完的是一个“苦”字！

解放后，虽說大家的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但要不是公社化，也还不是每家的日子都能过得舒臂伸腰的。就說住进了大楼的鍾朝金、刘紹清几家吧，人不懶，但劳力少人口多，有啥办法呐？用的置不起，穿的抖不伸，年年都得社上补助，轉公社以前，刘紹清一家就欠社上二百多元。可是轉公社后，吃飯不要錢了，一連发了几个月的工資，刘紹清在搬进大楼来的头

一天，也湊起錢置了一床全新的花鋪蓋。解放前，年年被債主逼着躲債的人，今年也不愁鹽愁米了；團年飯公共食堂办了，各家只置办过年待客的烟茶就是了。年初一那天，我們这座新民大楼才叫熱鬧吶！从早到晚沒断过客，人象牽綫一样来，有新都的、郫县的，还有好些多年不来的亲戚都恭賀我們来了。这个日子呀，真是大楼前对联上說的：

办公社蒸蒸日上；住大楼步步高升！

公社給人們帶來的好處是說不完的。就從它可以不斷地發展生產來看，公社建立後第一個小春就是一個丰收！

收 穫

陳 犀

1959年陽春3月，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到新民人民公社去過一趟。那是一個充滿理想和希望的季節。墨綠健壯的麥苗，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金燦燦的油菜花更是競芳爭艷，鵝黃色的花瓣猶如幼鵝的茸毛，鋪遍大地，芬芳流溢，染香了千里平原。我騎車疾馳在平坦的鄉村公路上，如同在碧濤滾滾、金浪翻騰的大海上航行一般。平原真象一個遼闊無邊的大海啊！任你車行如飛，大汗淋漓地跑上半天，也難跑出一望無涯的秀麥和油菜的包圍。菜花凝留在我身上的香氣，竟然引起了一群蜜蜂的誤會，它們跟在我的身後，盤旋飛繞了好幾十里地……當我聽着車輪滾動在松軟的沙地上發出“絲絲”的響聲時，我仿佛也聽到了迎着陽光亭亭玉立的麥苗和油菜，正在一寸一寸地伸展着腰肢，舒暢地發出銀鈴般的笑聲；當我站在土坡上，透過溝渠邊的檉木、楠木、翠竹從極目四望時，我看到我

脚下的土地是多么的华美和秀丽，真象是人们一针一线在大地的胸膛上绣出来的，绣得那么灿烂夺目，彩色缤纷；当我想到，这无边无际的锦绣山川，这正在孕育着丰硕果实的禾苗，这人们用心血和劳动编织起来的理想和希望，都是属于公社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激动啊！

两个月后，在这收获的季节，我又来到了新民人民公社。这里，已经是别有一番光景了。整个禾登壩，好象是用一整块黄金铸成的，丰富、饱满、结实，到处都闪烁着金光。麦穗鼓楞楞的，沉甸甸的，麦秆已经支持不了它的重量，不得不弯下腰来，一束束麦穗低着头，互相依偎着，风一吹过，涌起层层迭迭的波浪，窸窣窸窣响个不已；油菜已被扯下来，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平铺在地里，一眼看去，厚墩墩的足有两三尺高，菜秆有五尺来长，荚荚有黄豆荚那么肥大，大太阳一晒，有的荚荚裂开来了，露出一粒粒乌黑圆润的子实。人们心里明白，收获的时节到了，麦子该收割了，油菜该打场了。于是，禾登壩上立刻喧闹起来。……

公社发动了千军万马，加上省级机关下乡参加夏收夏种的九百多人，汇合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劳动大军。从清晨到黄昏，在开阔的田野上，此起彼落地飘扬着庆祝丰收的歌声。

在马路上，从地里往晒场上运送油菜的队伍络绎不绝。筛子、门板、标语牌，都被用来作为运送油菜的工具。人们把油菜一层一层地堆在上面，堆得老高老高，抬在肩上，走得风快，杠子被压得直闪。第一管理区有几个生产队的晒场就在新民大楼外面的壩子里。连枷、筛子和风车的声音混在一起，菜秆和荚荚的碎片四下飞舞，空中弥漫着一片黄色的尘雾，黑

色的子实从风车里流出来，装进了簸箕，空气中，顿时飘散开一股菜油的清香……不一会，堆在晒场上的菜秆和荚壳便成了小山，作为临时仓库的食堂里，也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山峰。

女队住的院子和罗家院子里，正在打麦。地上铺着十几张晒席，门板用长凳架着，围成一个圆圈，便成了最好的撻麦场。人们把晒得焦干的麦束高高举起，往门板上一甩，麦粒便散落下来，积成厚厚的一层。在这里，“砰砰碰碰”的声音和麦粒落地时发出的“沙沙”声，构成了一支美妙的歌曲，激励着人们越撻越快，越撻越有劲。

收获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每天天不亮，女队队长黄纪芬就起来了，她摸着黑，一家一家去喊人。她的嗓门可大呢，只要站在新民大楼的阶沿上一咋呼，大家都听见了。于是，窗户上透出了灯光，食堂的烟囱上冒出了炊烟。人们邀邀约约地下地去了……

这天，吃过早饭，在女队打油菜的场子里，大家已经干了一会了。天气不大好，据气象观测站预报说，可能要下雨，人人心里都象揣了一块铅，手里的活路也就干得更加劲了。可是，庄妈偏偏在这时候来迟了。大家有意见，都吼起来：“你来得好早呀！为啥不等出了太阳才来啊！”

“我前天泡了两件衣服，抽空洗了。”

“你洗衣服，是你的私事！”

“你明明是偷懒！”

“笑话！你们去问一下，前几年，白天黑夜我啥子不做啊！”

庄妈不服气，还极力申辩着。谁知这下可漏了黄，大家又吼起

来：“前几年，你是单干户，你当然要干嘛，但是，你干的是你自己的。”

这句话，把庄媽的嘴堵住了。她的脸涨得緋紅，坐在菜籽墩上吭气，过了片刻，才嘀嘀咕咕地说：“你们悄悄扣我两分就是了嘛，吼啥子呢！”

她这样一說，引起了人們一陣爽朗的哄笑。

这件事就这样了結了。这是我亲眼看見的。后来，在女兒队院子里的打麦場上，我又看到了一件。有个老婆婆叫她的女兒去赶禾登場，年輕的姑娘怎么說也不答应，一定要留在家里撻麦子，老婆婆便打了她两巴掌，群众一見，把这个老婆婆批評了一通，老婆婆又不敢还嘴，只得一个人坐在門槛上生悶气，隔了半晌，自知理屈，便又悄悄地起来干活了……

这两件小事，給我的印象都很深。从中，不仅讓我看到了人們为公社的丰收而进行的自觉劳动，人們为公社的利益而进行的无私斗争，而且，我还看到更重要的一点，在公社的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公社物質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人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也起了急剧的变化，变得更美、更高、更有光彩。

公社社长罗世发同志叫我去参加他們那二亩四分小麦卫星田的验收工作。我拿上镰刀，便跟他去了。

这两块麦田在罗家院子的側边，一块大些，一块小些，小的那块，棚架已經拆了，大的那块，棚架还没有拆。看到这些棚架，突然在我耳边响起了三月的暴风雨……

那时，麦子已长到一尺深了，青油油的，綠茸茸的，密密实

实的，拴住了多少人的眼睛啊。誰打这兒經過，都得美美地看上两眼，夸奖几句。誰知，有天深夜，平原上刮起了六級大风，暴雨象瓢泼一样倾泻下来，有的麦苗經受不了这样的摧残，倒了；大多数麦苗被风雨吹打得东搖西摆，处于十分危急之中。这时，第一管理区副主任兼公社卫星队队长史良成同志决定，立即进行防护和搶救。

夜很深了，到处一片漆黑，卫星队的队员們爬起来，戴上斗笠，举着火把，拿起工具，在史良成同志的率领下，冲进暴风雨里。在这样的天气，斗笠根本不頂用，一出門，全身就給打湿了，火把也給淋熄了。大家只得摸黑。沟渠边的小路已被雨水冲刷得稀烂，人們每走一步，都得把赤着的脚死死扣住泥濘的路面，但就这样，已有不少人摔了跤，何况人們肩膀上还扛着树条子、篾片片和晒垫子呢！尤育华扛着四五根树棒棒，过沟时摔倒了，但他腔都不开，摸着树棒棒，抬起来，又往前走了。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有的人下到沟里打树桩子，腿都冻青了；有的人在麦田里拴篾条子，手冻得連篾条都拿不稳；尽管如此，人們的情緒却非常高昂。雨再大，天再冷，总不能把心冻住。把嘴巴封住，大家一边工作，一边說笑，风雨里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战斗气氛。

以后，卫星队的两个副队长刘良汉和彭昌熙同志，在田边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夜夜守护着这两块麦田，整整在这里过了五十四个不眠之夜……

現在，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壩黄金。

罗世发同志跳进这片金色的海洋，开镰割下了第一束麦

子。他举起这束麦子，象举起一束庆祝丰收的鲜花一样，在空中摇曳了几下；弯着腰，一手抓着麦秆，一手紧握着镰刀等待着的人们，好象接到了信号，立刻动起手来。只听见一片清脆的“嚓嚓嚓”的响声。只看见麦垛在田里堆积起来。

为了感谢人们忠诚的劳动，经受了暴风雨考验的大地，向人们献出了丰盛的礼品……

这天黄昏时分，我又参加了卫星队油菜丰产片的验收工作。当风车风完了最后一撮菜子，当大秤称完了最后一筐菜子，当算盘算完了最后一笔数字，掌声象春雷一样在禾登场上轰响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卫星队那一壩七十四亩“胜利”油菜，每亩平均打了四百二十斤（最高的打到五百多斤），在去年每亩平均一百〇八斤的基础上，翻了三个滚！卫星队的队员们，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心里的大石头，也嘭地一声落了地。由于经历了许多艰苦斗争，最后终于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在他们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泪花。

早在这壩菜秧子刚栽下去的时候，有人曾经在背后嘀咕过，说每亩顶多打两百斤，要想丰收，除非拿“茄子当秤砣”！

他们说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光是栽这壩菜秧子，就淘了很多神。田，是晚稻田，泥巴粘扯扯的，一点都不泡；那一向又天天下雨，牛下不了田，只得用人去挖，可是，泥巴光啃锄头，一锄头下去，要费好大的劲才拔得起来。队员们就这样一锄头一锄头，熬更受夜地，把这壩田统统翻了个身。那时候，好多人吃过晚饭，一丢下碗筷，就到田里干起来，常常一干一整夜，疲倦了，腰杆痛了，只在田坎

上坐着打个盹，又猛干起来。菜秧子一栽起，要施肥，要灌水，队员們又整夜整夜的不休息，瞌睡得很了，把头浸在堰沟里冲洗一下，从来沒有人退縮，从来沒有人叫苦，大家都一鼓作气地把应该做的事做了。你想想看，他們只有三十几个人啊。

可是，由于菜秧子太矮，又栽迟了，到追肥时，有的苗苗只有三四寸长，黄焦焦的，简直难看极了。那时，新都附近的油菜，都长到半人多高了。

难怪有人要对油菜的高額产量說怪話了！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今，这每亩四百多斤油菜，毕竟不是用茄子做的秤砣称出来的！

公社党委对卫星队小伙子們的冲天干劲，給了充分的关怀和支持，因为这是一个革命呵！去年，毛主席在郫县紅光社曾經三問菜花，真是“主席一問天下应”，这里的社員們，是把毛主席的話当作战斗的命令在执行的。在大家辛勤的劳动下，油菜迅速地成长起来了，开花时节，油菜普遍长到一人高了。結荚时，密密麻麻一大片，从新都到新繁的过路行人看到了，連声称贊不已，他們說：“这样密的油菜，麻雀飞进去都鑽不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工会代表团訪問了新民人民公社，看了这壩用日本品种培植出来的油菜后，代表团团长表示十分滿意，他兴奋地說：“这种油菜在日本，从来沒有长得这么高大的！”

从这丰盛的收获，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艰苦的耕耘，那日日夜夜的劳动……

一边收获，一边耕耘。耕耘是收获的母亲。

收割完毕的油菜田和麦子田腾出来了，田里灌满了清凉的都江堰水，田土被打整得泡酥酥的，象一块块刚刚出笼的发糕。人们忙完干田活路，又挽起裤脚，下水田插秧了。

一束束秧苗，从田坎上抛过来，人们接着，用右手分出十来片秧苗，以金龙探爪之势，插进田里，一行又一行，一片又一片。顿时，一大块倒映着蓝天的明镜，变成了美好无瑕的翠玉。

平原上的五月，傍晚时仍略有寒意。按照传统的习惯，收工时要烤烤火，驱走身上的寒气。油菜秆在火中烧得毕剥直响。人们向着火，烤着背，烤着腿，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评比着庄稼活路，谈论着收成。慢慢，雾霭扩散开来，笼罩着远山、近树、茅屋、竹林……夜来了。食堂的号音响了，人走散了，只见雾中闪动着一点点火光。可是，半夜里，你又会看见一蓬一蓬通红的篝火。那里正在夜战……

“五月金，六月银，错过光阴无处寻”，为了和时间争夺粮食，公社专门组织了一次被我们称之为“百米赛跑”的栽秧比赛。这次比赛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推广先进栽秧方法；一方面是帮助卫星队把他们刚刚收完油菜的三块大田栽插下去。参加比赛的有全社三十几位栽秧能手，其中还有九位女将。比赛进行了四个小时，一共栽了二十多亩。这种速度无疑是很惊人的。我在现场参观时，只见秧苗满空飞舞，挑秧子的人来去如飞，栽秧能手的双手犹如蜻蜓点水、织女穿梭一样，一下子给大地披上了一袭绿色锦缎的大氅！

第二天，女儿队也组织了一次同样的“百米赛跑”。

队长黄纪芬跑在全队十几个栽秧能手的最前面，她差不多快栽完了一翼。这时，第一管理区副主任曾玉清同志来了，叫黄纪芬赶快上坎，说她的病还未好，下不得田。人们听说，也都放下手里的活路，过来劝她。她却说：“我腰痛，是震到了；发烧，是热到了。有啥子病嘛！”

“你昨天晚上还吐了两口血！”曾玉清顶了她一句。

“啥子吐血啊，那是牙齿痛流了一点点血，有啥来头。你们以为我想找死呀，好日子我还没有过够呢，事情我还没有做够呢！”

黄纪芬确实吐了血。曾玉清好说歹说都不行，只得回来了。

黄纪芬有肺病，我是知道的。但是，她为什么不把病放在心上，为什么不休息，一天到晚总是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为此，这天晚上，我专门访问了曾玉清同志。

曾玉清只向我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去年夏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雨，三岔河涨起了大水，全壩一千多亩谷子都有被淹没的危险，必须立即扎坝抢救。

曾玉清、黄纪芬带领着生产队全体队员，连夜冒雨赶到了那里。

河水急湍奔腾，马上就要漫过堤岸。黄纪芬不顾一切，第一个跳下水去。水淹齐她的颈项，波浪涌来，根本站不稳脚。她在水里对曾玉清说：“恐怕要糟啊。”

“你身体吃得消不？”

黄纪芬咬咬牙，坚决地说：“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牺牲了我一个人也划得来！”

这时，曾玉清也跳下水去了。

在她們的帶動下，人們在水里奮戰了一天一夜，揀了四十几方鵝卵石，担了四十几方沙子，終於扎起一條堤壩，把孽龍擋住了。

回來，黃紀芬在路上就吐了几口血。可是，當天晚上，她又幫助食堂包了一整夜的葉兒粑……

听着曾玉清的敘述，不管是黃紀芬，還是衛星隊和女兒隊的大嬸子、大嫂子、小姑娘、小伙子，都一下子涌到我的眼前，構成了一幅巨大的英雄群象。也許，在他們自己看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普通的、很平常的，而且都是自自然然，毫不勉強就做了的，絲毫也沒有值得夸耀之處；但是，他們在平凡的勞動中，如果沒有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於自己作為公社社員的自豪感和責任感，要想做到上面我說的那一切，是可能的嗎？

想着這一切，我感到，我在思想上也獲得了丰收！

從曾玉清同志家裏出來，已經是夜里九點鐘了。

月光如水，蛙聲如潮。新民大樓走廊上吊着的兩盞大紅燈籠，放射着耀眼的紅光。在菜籽垛上嬉戲的兒童回家睡覺去了。參加夏收夏種的機關幹部還在電燈下讀着“紅旗”。這時公社會議室里的鋼琴聲又響了，廖正發開始了他的夜課。這個十二歲的農村孩子，慢慢地、一遍又一遍地彈奏着“東方紅”……

（原載1959年6月號“草地”，題名“五月的川西壩”）

編 后 記

这部社史暂时編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社史概括地記述了新民公社十年来的成长过程。由于時間是那么长、成員是那么多、事情是那么丰富多采，在編写时，我們真感到千头万緒，不知如何下手，特別是在后一部分。現在写出来的这一部分只能說是一个初稿，一个序幕，它还很不成熟，很不完整，远远沒有把新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全部介紹出来，更談不上通过这一个公社的成长来反映我国农村日新月异的面貌了。这些，只有留待讀者給我們提出宝贵意見和社員們提供更丰富的資料以后，我們再尽心尽力地一遍又一遍地来訂正、修改和充实它。这部社史，除去署名記錄整理者外，其余均是社史編写小組記錄整理。

当我們和全体社員共同編写这部社史时，我們深深感到新民公社之所以能如此逐步地成长壮大起来，完全应该归功于哺育我們的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归功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伟大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

当此国庆十周年即将到来的前夕，我們謹以此書敬献給亲爱的共产党、毛主席和全国人民！

編 者 1959年7月

